



《记忆》123 期
2014 年 12 月 31 日

目 录

【专 稿】

辛 逸 “新瓶装旧酒”——评《乡村中国记事》

【清华文革】

小 鹰 清华文革反思——红卫兵运动的三个时期

小 鹰 清华文革的七·二七之谜

【随 笔】

李南央 从保尔与冬妮娅谈起——活法儿的自由

【述 往】

朱 特 插队的那些事（六）——分家的故事

安希孟 安希孟回忆录（五）——我与文革

【资 料】

关于右派分子戴煌的材料——1962年戴煌的十万言书（四）

2014年《记忆》总目录

【读者来信】

1. 冯翔谈华新民之问与宋彬彬之答
2. 秋山枫叶赞余汝信的《钱壮飞》一文
3. 汪春劼谈感想

【版权声明】

【专稿】



辛逸，山东章丘县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与理论研究院副院长，中共党史研究学会特约研究员。

主要著作：《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制度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5月版；《中国共产党与和谐社会构建》，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2月版；《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5月版。另发表专业论文数十篇。现独立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人民公社制度史稿》（10ADJ002）。

“新瓶装旧酒”

——评《乡村中国记事》

辛逸

近年，结论先行、文件梳理、自上而下的党史诉说，渐被史学界中一些中青年学者自觉地疏离甚至摒弃。这些“非主流”学人坚信，史学的魅力乃至使命不是发现和证明人类社会有一条亘古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而是呈现和揭示历史的偶然性、多样性和复杂性。他们遵循无原始史料即无史学的治史原则，“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以部门或地方的档案材料，诉说基层社会的兴衰变迁和“无声”百姓的情感诉求，企图在重新演绎个人或基层故事的基础上，自下而上地证伪既有的某些结论，重新建构所谓“新历史”。应该承认，新生代史学家开拓的这一研究范式与路径，尚在拓荒与探讨之中，其研究理念的芜杂、分析工具的纷繁和叙事模式的多样，自是难免。更有甚者，有些标榜为“新史学”的硕博论文，仍难以完全摆脱传统党史的观念与范式，只是用地方性的原始材料填充传统的叙事逻辑和框架，论证已经被证明了无数遍的既有定论。对这类著述，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校区李怀印教授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它们“并没有致力于理论创新，也没有在实证研究基础上追求真正的自主性，而是日

益依赖一套借自西方的理论框架，加诸自身的研究。”¹

遗憾的是，李怀印的《乡村中国记事：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史》（以下简称李著），²其基本观点和叙事模式，恰恰属于李怀印先生自己批评的这类作品。李著虽在个别问题上提出了一些给人启迪的见解，但总体而言，看不到贯穿全文的独创性观点；虽使用了一些地方性档案，但基本上是以苏中地区的材料填充传统史学的研究框架和叙事逻辑，得出了几十年前就已经写入教科书的众所周知的结论。笔者以为，历史学家在讲述历史故事时，不应该忘记卡尔的忠告：“历史的本质在于以当下的眼光看待过去，根据当前的问题看待过去，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不在于记录，而在于评价。因为，假如历史学家不评价的话，他又如何知道哪些东西值得记录呢？”³的确，没有独创性“评价”的历史著作，难窥历史学之堂奥。

—

李著虽以江苏松江、东台县及其所属镇两级档案和秦村的文书台账及口述史料为支撑，但其大部分章节大都以官方文件和主流观点预设结论，再以自己家乡的材料进行证明或补充。李著凡14章，除第8、9、10三章外，其余各章基本上按照从中央决策到地方执行的叙述模式，分别陈述了土地改革、农业集体化、人民公社化运动、“四清”、“文革”、家庭承包制的推行等历史事件在当地的演变过程，得出了与主流党史基本一致的结论。以第4章“大跃进及其后果”为例，该章中的各节都是按照“中央决策的背景和内容—全国各地传达贯彻—东台、松江两县及秦村落实”这样的模式展开铺叙的。而且，在“中央文件”和“全国各地推行”两部分中引用的材料，除一本比较老旧的文件集外，均转引自非学术作品。⁴该章的第一节“人民公社”，先谈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的普及和大公社

¹ 李怀印：《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中华书局，2013，第263-264页。

² 本书最初为英文版。获第三世界研究协会2009年度最佳图书奖和中国留美历史学会2009年度杰出学术贡献奖。以下引用此书只在引文后标注页码。对李著的评论文章有二，赞者认为，李著“是既有研究积累中具有开创性的成果，在知识增量和理论开拓上都值得赞誉”（陈靖：《集体主义时期研究的微观视角及方法——读李怀印〈乡村中国纪事〉》，《中国农大学报》2011年第3期）。批评者指责作者没有“善用”资料，“只是一味牵强附会地强套他预设的理念，其所举例证甚至经常还成为自身论点的反证”（陈耀煌：《李怀印两本中国农村史研究的商榷》，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0期，229页）。

³ E·H·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04-105页。

⁴ 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委员会：《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宋连生：《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

“一大二公”的制度特征；继而揭露“共产风”、“瞎指挥”的荒诞不经，以及“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对河南、上海、山东等地和秦村生产和生活的破坏。第二节“收成分配”，谈“浮夸风”在全国各地以及在东台县、秦村的泛滥。“秦村干部已经学会了其他社队放卫星的伎俩——‘并田’”。在公社书记的压力下，秦村被迫上报亩产为4000斤（第78页）。第三节为“集体食堂”。¹肇始于湖南、河南等地的“集体食堂”在全国普及后，秦村在1958年10月也建起了自己的公共食堂。在短暂的“吃饭不要钱”之后，该村食堂很快难以为继，被迫采用过减少每人的粮食定量、按年龄段配给口粮、采用“食物增量法”、分给社员极少的自留地等措施。尽管如此，秦村还是有一百多人患浮肿病，十人左右非正常死亡（第84页）。第四节为“收入分配”。陈述各地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由公社（或大队）下沉到生产队，社员分配由供给制到按劳分配的演变过程。秦村在核算单位和收入分配方面也经历了类似的制度变迁。上述四节，姑且不说其题目、内容、行文等的逻辑和层次比较混乱，关键是其框架结构和观点均似曾相识、了无新意。这种以传统的观点和叙事模式为标准来安排结构、取舍史料的研究模式，被法国社会学家列维-布留尔批评为：“他们不是在事实本身中去找解释，而是用现成的解释去套事实。”²

“中央决策—地方传达—乡村落实”三段式的写法，近年在国内尤其是博士论文中颇为流行，甚至还被许多学人推崇和模仿。依笔者之见，其对党史研究的推动仅有尺寸之功，不可高估。其一，这种三段式的写法限制了作者思想的表达。笔者以为，一流的史学作品最要紧的，“是其应该具有一个清晰明确、贯穿论文始终并具有独创性的中心论点，文章所有的章节安排与材料取舍都要围绕着中心论点来展开，这一中心论点就是所谓的‘命题’（Thesis）。欧美许多名牌大学都要求研究生论文尤其是博士论文应该有明确的命题，因为这是衡量研究生论文是否具有独创性的最主要标志。”³史学著作无论其史料多么全面和丰赡，毕竟是史学家建构的历史。“历史一旦进入研究领域，就只能以言说和文本的形式出现，在这个过程中，真实的历史无一幸免地被各种动机所过滤，变成主观认识的

失败》，人民出版社，1996年。康健：《辉煌的幻灭——人民公社警示录》，社会出版社，1998年。宋海庆：《人民公社兴亡录》，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0年。

¹ 事实上，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将各地的农村食堂统一叫做公共食堂后，集体食堂的称谓即基本消失。李著却在这之后仍然坚持“集体食堂”之谓。

²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9页。

³ 拙文：《文科研究生学术精神的培养——以研究生毕业论文为例》，《中国高教研究》，2008年第7期。

一部分。”¹规范的史学研究无论是“宏大叙事”式的概述还是以史料串编的故事，最终展示的是作者的思想。以新史料填充旧有的研究框架，难以摆脱和冲破既有的结论和研究范式，很难说是史学的真正进步。近年，史学界挖掘和使用第一手资料尤其是民间史料已蔚然成风，这是值得称赞的新气象。但一些史学作品将研究对象的新颖与观点的创新混为一谈，把新材料的使用误认为史学创新的全部。这种以新材料证明老结论的“学术创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史学研究表面的繁荣，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史学家思想的进步。这是值得史学界同人警惕和反省的。李著将一手材料放进上述三段式的论证模式中，没有真正证伪传统史学的既有观点和逻辑结构，没有跳出主流史学的话语体系及论证框架。这可能就是台湾学者指责该书没有“善用”秦村的宝贵资料，“只是一味牵强附会地强套他预设的理念”的原因吧。

历史著述的第一要义是什么？许多史学家前辈认为是史料。此论近年声誉日隆，崇信者日众。持此论者主张，中国当代史的研究最好以作者亲自搜集的第一手资料，讲述既有历史著述未曾讲过的故事；或者以新材料重新解读被“宏大叙事”反复论述过的历史过程和事件。诚然，史学研究当以史料为基础。然而，史料的不可能穷尽和史学作品的主观性，决定了按照史学家的观点和逻辑串联起来的历史故事，只能接近而不可能复原历史的真相。由此就引出了史学研究中与史料同样重要甚至是更重要的另一个要素，这就是历史作品的命题即独创性观点。史学作品的思想性有时会被一般读者所忽略，甚至还会被一些业内人士视为无关紧要，后者主张史学著述“只要把历史事实说清楚就可以了”。问题是历史学家选择什么样的历史研究对象和怎么诉说它们，其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是史学家的思想倾向和价值追求。正是史学家独自的思想和视角，将浩如烟海、凌乱纷繁的史料串联、构建成一个个引人入胜的历史故事，使读者能够在往昔和今日之间自如穿越，在对历史的阅读中获得愉悦和教益；正是史学作品的思想性，才使久远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在人们“需要”的时候，被史学家及时地“发现”和推介，在其被不断地挖掘、梳理和书写中历久弥新；正是隐含在历史著述中的独创性观点，不断赋予史学研究以新的生命力，将历史书写变成当下的利益表达，从而使史学成为显学。所以，第一手的史料和独创性的观点这两个要素在史学研究中同样重

¹ 杨念群：《中层理论与新社会史观的兴起》，《开放时代》，2002年第2期。

要、缺一不可。一流的史学作品应该是以前人未曾使用过的材料，在生动地诉说历史故事的过程中表达作者的独创性思想。¹

当下中国当代史的写作形式大致有两种：一曰在文章的题目上或导言中就鲜明地表达文章的观点，文章的结构和材料的取舍均以合理地论证命题为主臬；一曰文章通篇都在讲故事，文章的终极目标是讲述故事的完整与生动，通篇没有明确的观点，或者是其观点隐晦地藏在故事的叙述之中。有时候，一般读者很难猜透作者的用意，对文章的命题更是如坠五里雾中。目下，后一种写法日渐流行。²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初学者既无讲故事所需的完备史料，³又无讲一个完整、生动且寓意深刻故事的功力，一味地模仿史学大家讲故事，结果却是画虎不成反类犬。毕竟，讲好一个历史故事尤其是有深刻命题的故事，比完成一篇命题鲜明、结构完整的历史学论文难多了。

其二，上述三段式的写法限制了李著对秦村历史完整、流畅和生动地表达，使其故事性和生动性大打折扣。史学的魅力，在于史学家凭借其对研究对象及其史料的深刻理解和透彻地参悟，以历史逻辑和想象力把各种史料串联组合起来，在讲述生动鲜活、妙趣横生的历史故事中展示历史的偶然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并或明或暗地阐发前人未发之论。《乡村中国记事》的作者虽掌握了相对完整的地方材料，在书中也讲述了一两个不太完整和生动的乡村故事⁴，但整体而言，李著把丰富的民间史料硬塞进了作者预设的固化的叙事模式之中，这就使苏中两县丰富多样的历史以及秦村曾经发生过的生动故事都成为证明其预设结论的佐

1 依笔者之见，如孔飞力著，陈兼、刘昶译：《叫魂：1768 中国妖术大恐慌》，北京三联书店，2012 年；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三联书店，2010 年；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著，许明龙、马胜利译：《蒙塔尤》，商务印书馆，1997 年；史景迁著，温洽溢、吴家恒译：《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广西师大出版社，2011 年；萧邦奇著，周武彪译：《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江苏人民，2010 年，可视为这方面的佳作。

² 窃以为，史学论文的这两种写作形式，本质上并无高下、优劣之别，选取哪种形式，最好依据作者的研究能力和志趣，以及不同的研究对象和已有史料的类别与丰赡程度等因素来决定。

³ 余十分赞同高王凌教授的说法，史学家应该有自己的资料库。

⁴ 通观李著，只有两个故事生动鲜活，让人印象深刻。一是集体化在秦村强力推行的 1957 年 7 月，秦村自发组织的青苗会。该会向每一农户募捐 1 块钱。7 月 20 日，在村北搭台唱戏。戏台上摆放着从庙中请来的菩萨和土地爷的塑像、一头宰过的猪和堆放烛香达 3 米多高的宝塔。村民们燃放鞭炮，吸引了本村和邻村数百观众。秦村合作社长（兼区政治指导员）在警告无果的情况下，上台强拆帐篷，被青苗会的张某拦腰抱住摔下戏台。当夜，区委书记周伯寿佩带手枪，率 35 人来到秦村。在村民大会上，周书记劝说要“团结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最后捎带提醒大家“别再搞青苗会了”。之后，青苗会不听劝阻，在村内游行示威，连闹两天，方才罢休（第 47-49 页）。一是 1978 年夏天，秦村棉田里棉铃虫泛滥。在棉铃虫已有抗药性的情况下，生产队发动社员突击逮虫子。一开始实行计时工分制，干一个早晨和上午，大人 5 分，青少年 4 分，儿童 3 分，结果很多小孩抓四五百只，大人却只有百余只。次日，生产队改计件工分制，每抓一百条一工分。社员抓虫人均增至六七百，生产队干部数虫却数到了下午 3 点。第三天，要求社员 30 条一堆摆放，按堆数计算工分；若抽查任意一堆少于 30，则按此数计算该社员的全部工分。此法实行二周，基本消灭虫害（第 165-166 页）。

料；最终没有跳出以模式化的史料铺陈去证明既有结论的窠臼。这就把丰富多彩的历史简单化和模型化了。这种填空式的写作模式相对简单和容易，看上去也“结构完整、条理清晰”，但在其中却很难找到原本丰富多彩、复杂多样和生动鲜活的历史故事。稍有经验的历史写作者都知晓，三段式的叙述模式与历史诉说的生动性和故事性是很难兼顾甚至可以说是不相容的；因为两者有着迥然不同的学术志趣、叙事逻辑和话语体系。李怀印在一本著作中交叉使用上述两种表达模式的尝试显然是不成功的。

其三，三段式的叙事模式虽然在全面呈现中央、地方、村落三者之间的关系方面用力甚多，但其对三者间关系的描述却过于简单甚至有点模式化。在国家与乡村关系的探讨中，李著顺着J·斯科特“弱者的武器”和高王凌“农民反行为”的思路，虽然注意到了当秦村的境况与上级指示产生抵牾时，当地百姓的惯常行为会销蚀文件的部分规定甚至使其消融于无形之中；但总体而言，李著仅是将上级文本与地方的贯彻落实分别进行了程式化的铺叙和勾勒，没有深入探究中央、地方与村落间实际上存在着的既相互顺应、包容与妥协又互相推诿、销蚀甚至抵制的互动关系。这就把复杂多样、立体多维的国家与地方的关系简单化和程式化了。无须讳言，《乡村中国记事》对国家与乡村关系的概括与描述，较之作者之前的《华北村治》¹，不仅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甚至还有所倒退。

其四，李著中三段式的叙事模式，还是作者试图打破党史研究领域“宏大叙事”和“民族志”相互隔绝、互不兼容甚至互相排斥的现状，将两种研究范式融于一体的有益尝试；然而，李著在这方面的探索并未超越前人，只不过是形式上将上述两种写作模式捏合在了一起，其在历史诉说方法上的探索并不成功。如上所述，李著在记述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和“去集体化”等重大事件时，对中央决策及其在各省、市的落实，使用了传统的“宏大叙事”；而对中央文件在东台、松江两县和秦村的实践，则试图以“民族志”的方法加以“深描”。这种已流行多年的历史表述模式对党史研究方法改进的实际功效，并不如其倡导和实践者鼓吹得那般神奇和显著，近年已呈停滞和式微之势。

试图将“宏大叙事”与“民族志”融为一体的史学表述，其流行初期确曾给“宏大叙事”占绝对优势的党史界带来一股清风。笔者多年前也曾设想将上述两

¹ 李怀印：《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中华书局，2008年。

种研究模式的优点融于一体，既发挥“宏大叙事”的优势，完整而系统地表述中央的决策及其传达过程；又展示“民族志”的学术魅力，把上级指示在基层的落实演绎成一个个妙趣横生的民间历史故事，实现所谓将“中央决策与地方实践‘上下打通’的学术研究理想”¹。然而，近些年学界在这方面的不懈努力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很多这方面的著述没有跳出“以地方材料证明既有结论”的窠臼，充其量只是党史研究多了一些“弘扬主旋律”的地方性案例而已。也许，史学表述的内容及其形式是相互规定与制约的。“宏大叙事”有利于重大历史事件的完整叙述，适合于领导人的语录汇编以及会议、文件的梳理；而“民族志”显然比较适合于具体的历史事件、人物以及基层社会的生动表达。由于两者的研究理念与志趣、研究对象与表达方式等差异甚巨甚至相互对立，在没有出现颠覆性的研究理念与创新方法的情况下，只是在诉说方式上强行将两者机械地、牵强地捏合在一起，难免流于形式，结果往往是在一部作品中两种诉说方式的相互迁就甚至相互抵消，甚至是扬各自之“短”，弃各自之“长”。所谓“上下打通”的学术设想，由于没有将两种研究范式兼容的学理的和方法论的基础，也许是永远打不通”的。

在笔者看来，“宏大叙事”的进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中央文件的不断挖掘与披露。在中央文件的披露难有突破的情况下²，传统党史的使命似乎就是反复论证既有的结论，“宏大叙事”难免俗套和式微。而引入“民族志”的研究理念与方法之后，党史学家开始眼睛向下，去发掘多样性的、取之不尽的地方材料；在“深描”基层社会、讲述生动个案的基础上，发现新的研究课题与路径，揭示传统史学未曾发现的历史故事和道理。在当前的学术生态中，“民族志”显然能更有效地推动党史的进步与发展。现在的问题是，鼓吹和践行“民族志”的党史学者中（当然也包括笔者），多数人没有受过人类学的学术训练，甚至对“民族志”的基本概念与方法多有误解，认为只要到地方档案馆收集些材料，访谈若干当事人，将第一手的资料按照自己的逻辑串联起来，就可以写出所谓“历史人类学”的作品。目下，这类“四不像”的作品正大量涌现，而真正能与《林村的故事》、《私人生活的变革》、《神堂记忆》、《叫魂》、《大河移民》、《天安

¹ 拙文：《人民公社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

² 党史界期盼多年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煌煌六大册，600余万言，并未披露实质性新材料，即是一例。

门》、《告别理想》¹等比肩的作品少之又少；而且，上述佳作均不是出自从事党史研究的史家之手。

总之，《乡村中国记事》在历史诉说方式上的探索，尤其是对秦村地方性知识的“深描”，得到了史学同仁的称道。但毋庸回避的是，李著既没有一个贯穿全书的独创性观点即命题，也没有讲一个完整的妙趣横生的乡土历史故事，只是一味地迁就、强套自己预设的叙事模式和旧有的结论，不可避免地落入了传统党史的窠臼。数年后，李怀印已经意识到自己曾经乐此不疲的这种历史诉说，“很大程度上是各类问题实证研究在数量上的显著增长，而不是概念和理论建构上的实质性进步。”²

笔者与台湾学者陈耀煌对《乡村中国记事》有一个相同的判断，就是李著中大胆提出的主要假设，没有得到合理、充分的论证，难以自圆其说，甚至书中罗列的某些材料和案例竟成为推翻其预设结论的反证。李著中的文气不通、逻辑与思路的混乱，在陈先生看来，“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³李著提出的一个重要假设，是乡土社会的文化传统与农民日常的或激进的抵抗，对国家农村政策的形成与调整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他指出：“1949年后的中国农民，在国家的农业政策形成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的日常抵抗和公开抗拒，比起上级的意愿或基层干部的热情来，更能影响那些政策的最终形式及其在农村的运行方式。”（第291页）在说到农民对高级社抵制的作用时，李怀印将农民的这种“举足轻重的作用”推到了极致，认为“农民通过执著和坚定的抵抗，能够对国家乡村政策的制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并“促使国家在乡村政策上作出了实质性调整”（第4页）。所以，“在集体制形成过程中，农民对中共的农业政策起到了关键性的影响作用，并非如某些学者所说，共产党革命后，中国农民面对国家‘几无还手之力’”（第70页）。在本书的结论部分（第14章），李怀印认为大饥荒之后确立的生产队基本核算制，“甚至在‘包产到户’政策下允许搞家

1 黄树民著，素兰、纳日碧力戈译：《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三联书店，2002年。阎云翔著，龚小夏译：《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景军著，吴飞译：《神堂记忆：一个中国乡村的历史、权力与道德》，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年。孔飞力著，陈兼、刘昶译：《叫魂：1768中国妖术大恐慌》，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从“讨个说法”到“摆平理顺”》，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史景迁著，尹庆军译：《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

² 李怀印：《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第270页。

³ 陈耀煌：《李怀印两本中国农村史研究的商榷》，《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0期，第228页。

庭单干”，以及“文革”时期“农户仍允许保留自留地和其他‘资本主义尾巴’”等，“都揭示了村民在形塑国家农村政策的最终形态上所起的关键作用”（第295页）。类似的结论书中还有很多。上述假设不能不说“大胆”，但李著却没有完成由足够证据支撑的合理的“小心求证”。

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民，在各种自上而下、强制推行的政策与政治运动面前，基本上是逆来顺受的，其零星、无序与无力的抵制对决策层的影响十分有限，充其量迫使决策者在不改变其根本制度和原则的前提下做一些政策调整。把这一时期农民的抵抗提升到对“国家乡村政策的制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的程度，是缺少史实根据的。

第一，中共建政后出台的对农民生活影响最大的制度安排像土地改革、统购统销、集体化、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即使是其给农民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也未出现足以改变全国农村政策的抵抗。在李著中，农民有组织的最激烈的反抗发生在高级社的初建时期。秦村农民的抵抗不仅没有阻止高级社的成立和巩固，反而却招致几名带头闹事农民被拘留和被判数年的劳改。“此举震慑了所有村民。随后公开的反抗消失了”（第49页）。在秦村所在的东台县，当地政府对群众不满高级社作出的最大让步，不过是派工作组进村安抚、召开群众大会要求农民“相互团结”、清查合作社账目、重新选举合作社干部等（第57-58页）。当地农民的抵抗虽如火如荼，颇具声势，但看不到其“促使国家在乡村政策上作出了实质性调整”。

第二，在集体化时期，农民有组织的激烈抵抗极为罕见，且日渐衰减；其更多更普遍的是集体劳动和日常生活中被动的、消极的“反行为”或者那些被称为“弱者的武器”的不合作表现。近来，农民“反行为”在坊间颇为流行并备受关注，但对其作用不能高估。笔者以为，它至多迫使政府对既定的制度和方针作出一些调整或者妥协，但它不是也不可能是推动国家农村政策改弦更张的主要力量。改革开放后“包产到户”最终在全国的推广，与其说是农民几十年不懈反抗和努力的结果，不如是说国家根本制度与政策在1970年代末发生遽变之使然。

“包产到户”的推广有着更为根本、深刻、广泛的原因和背景，绝非农民的“反行为”所能概括和道明。李著最终得出“正是村民的持久和普遍的抵抗压力，使国家不得不最终放弃或大幅调整了其不切实际的措施”（第291页）的结论，实

在是过于“大胆的假设”。

第三，应该承认，农民的抵抗虽不可能触及集体制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原则，但对基层政府折腾老百姓的“瞎指挥”有时却十分有效，常常把基层干部不合时宜的临时性冲动化解于无声无形之中。1970年代初，溱东公社在全社推广新式炉灶，秦村所有农户被迫按照公社要求改建了炉灶。新式炉灶虽然省柴草但比老式炉子更浪费时间。所以，“当推广省草灶的运动结束时，大多数农户还是恢复了旧式炉灶。”再如，溱东公社要求社员养鸡由放养改为圈养，由于圈养鸡更加费饲料、鸡下蛋更少，“所以风潮结束后，大多数农户再次将鸡放养”（第146-147页）。这个时期，公社还要求各生产队改二熟制为三熟制。但实施的结果是“三熟制的实际回报率仅与双熟制持平，甚至略低。所以，尽管公社一再要求推广三熟制，秦村第十一生产队也只在20%的稻田里实施。……到压力减缓的70年代末，生产队普遍抛弃了三熟制，回归到传统的双熟制”（第210-211页）。由此看来，农村基层的“反行为”和农民“弱者的武器”，对制约、限制甚至终止那些与“地方性知识”抵牾的政策措施，有时还是极为有效的。

集体化时代国家与乡村的关系，一直为学界所热议并存争议。笔者很难接受“农民通过执著和坚定的抵抗，能够对国家乡村政策的制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的意见，认为集体制下的乡村社会已经高度行政化，农村基层既是生产、核算单位，也是附属于上级的行政下属，其政治制度、经济运行乃至社会生活几乎都听命于上级的安排，处于完全无权的地位。1975年9月19日，山西省阳城县下孔大队给其上级町店公社革命委员会呈交了一个报告：“为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为了高高兴兴欢度国庆，经研究每人吃腌肉0.1斤，猪肉0.1斤（杀羊10只，猪5头），特向公社呈请。”公社拖到国庆节的前一天才批复：“只准杀猪5头，不准杀羊。”这年初，下孔大队接到上级要其无偿上缴粮食的通知：“下孔大队：经公社研究决定，由你大队付给社办工业生产专用粮七千一百斤。希你们按规定品种付给无措（错）。规定品种：小麦15%，1100斤；谷子30%，2100斤；玉子20%，1400斤；高粱35%，2500斤。衷心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町店公社革命委员会。1975年元月14日。”¹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与干预，不仅限于对农村基层财产的控制和支取，还深入到了农民的精神世界。郭

¹ 下孔档案，编号：E-28-00144；E-31-2-000024，转引自吴双娜：《“社员都是向阳花”——论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层的行政化》，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于华教授指出：“农民生活世界的现象表明，国家权力和国家意识形态已前所未有地深入到农民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农民日常生活的各方面内容——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无一不与国家发生了关联。原有的宗族制度与文化已处于无可挽回的瓦解状态，国家意识形态日益消解着传统的伦理思想和道德逻辑。这一时期国家的正统思想不仅与原有的传统规范和意识形态相抵，而且作为一种强加的力量影响和改变着传统的地方性知识。”¹

二

学术的基本属性是学人各自意见的表达，无须也不可能达成意见的统一，自然也就无所谓绝对的对错；其所要求统一者，是观点的表述必须符合学术规范。任何人只要遵守基本的学术规范，就有自由参与学术研究、发表意见的权利；亦唯有保障和维护这种权利，学术才能进步，思想才有发展。宣传的定义是通过“说明讲解，使群众相信并跟着行动”²，其基本属性自然是要求且必须辨明是非与对错，以达意见与思想的统一。然而，对错之辩以思想和价值取向的统一为主臬，学术则以规范地表达不同意见为宗旨。在宣传与学术表达发生抵牾时，宣传者常常习惯于以“对错”统领学术，将“是非”凌驾于学术规范之上，这就难以避免逾越学术规范及其道德底线，自然就不利于甚至是阻碍学术的进步与思想的发展。此为常识。

当下的党史研究，最大的困惑与困境是学术与宣传的混淆，两者相互渗透甚至相互替代，都没有完全的独立，各自没有独立发展的空间，也就难以取得健康的发展。超越乃至摆脱此困境的出路，笔者以为，是界定两者各自的内涵与边界，明晰各自的权力边界与规则，彼此互不越界、互不越权并相互尊重与理解，最终允许各自在自己所属的空间内经营与成长。这恐怕是当下能够使宣传畅通无阻、学术繁荣进步的可行之径和基本前提。就学术共同体及其成员而言，目下最要紧的，是坚守学者的本分和学术底线，自觉遵守起码的学术规范，让学术回归学术的本色，让学者守住学者的道德底线。具体到党史的规范，笔者以为，最好放弃

¹ 郭于华：《代际关系中的公平逻辑及其变迁——对河北农村养老事件的分析》，《中国学术》，2001年第4期。

²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473页。

将党史视为具有特殊政治和宣传功能的传统定位，让党史回归一门普通断代史的属性与本位，按照一般历史学的规范和基本要求，开展中共党史的史学教学与研究。

据笔者观察，党史学界大多数同人对本学科为普通断代史学的定位早有共识；对党史研究的基本学术规范亦心知肚明。因此，唯有坚持和宣扬上述共识，坚守史学研究的基本规范，党史研究才能摆脱其被“赋予”过多宣传功能的定位，走向学术研究的繁荣与发展。令党史学人尴尬的是，多年对党史宣传功能的过分强调，已使其研究规则中掺杂进太多的非学术因素。这些因素常使党史的初学者甚至一些从业人员将它们视作不同于其他历史学科的主要依据，并以此为自豪。然学术发展史的常识告诉我们，若党史研究中的非学术因素不除，被国际同行所认可、被国内历史学科所接纳的期望，终将是一厢情愿。笔者以为，当下党史学人急需坚守与践行者，除史家应力求价值中立、一手资料应为史学作品的材料主体、史学著作应该有贯穿全书的独创性观点、“近三十年不入史”等众所周知的要求之外，还有若干在党史领域中不那么明确，很多同仁尤其是初学者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需要重申与强调。

其一，任何学者不可站在所谓“真理”或“正确”的制高点上去训斥他人。对于自己不同意的观点，最多只批评其书写得如何不规范，而不是以自己的尤其是官方的评判标准随意批判张三错误、李四不对、王五不科学；更不要以为真理只在自己一边，将与自己不合的观点钉在意识形态的“耻辱柱”上，甚至将一些不同看法推至“亡党灭国”的凶险境地。事实上，学术观点只是符合学术规范的不同说法而已；而功利化的、意识形态的所谓“研究”则要求表达的统一，其与学术追求自由表达的境界，完全是南辕北辙。因为，真正的学术“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¹。所以，以功利化的或意识形态的标准来衡量、统一学术，从来不是学术的进步而是学术的倒退甚至灾难。中国近现代史上以宣传为标准钳制、统领学术研究的悲剧从未停演过，结果从未真正推动过学术的进步，自然也不可能带来党史研究的繁荣。

由上观之，唯有符合学术规范的自由的书写才是真学术；同理，言论亦唯有自由的表达才能促进社会的真正进步。一个世纪前，中共创建人陈独秀对此有极

¹ 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8页。

深刻的表述：“法律是为保守现在的文明，言论自由是为创造将来的文明；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也都是从前的言论自由，对于他同时的法律文明批评反抗创造出来的；言论自由是父母，法律文明是儿子，历代相传。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因为言论要有逾越现行法律以外的绝对自由，才能够发现现在的文明的弊端，现在法律的缺点。”¹

其二，党史著作应该有完整而规范的学术史梳理，唯如此，本作品才能在与前人作品中的观点、材料、论证等的对比中，在与前辈学人的对话中凸显自己的学术地位与贡献。和其他学科的发展史一样，党史研究的进步是建立在前人研究成果不断“层累”的基础之上的。每一项史学研究既是其所属时代的一种声音和表达，也是对前人同一领域研究的某种深化，更是与前辈学人的交流与对话，这就构成了学术史中的“一层”。所谓学术史，其实就是这么一层一层地累积起来的（因此，从学术史的角度而言，没有所谓超越时代、绝对正确、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历史规律”和“真理”）。任何一项史学研究，最终它会融入学术演进史的谱系之中，在学术史中占据其应有的位置。如果不做学术史的梳理，不与前人的成果进行对接和对比，其学术贡献与学术地位自然就无从谈起。由此，没有规范的学术史梳理也就没有真正的史学作品。现在令人担忧的是，党史研究领域中的许多作者，只是在形式上做学术史梳理，在“中国知网”上搜索有关研究成果，将其全部或大部抄录为“参考书目”；或者仅仅在注释中罗列若干主要的研究成果；或者对既有研究成果不屑一顾甚至大加指责，空洞地诘难前人的研究“不深入”，“不全面、不系统”。整篇文章基本上还是自说自话，与既有的研究成果几乎没有对话与交流。坦言之，这样的学术史梳理，不是无知就是无能力对前人的成果进行学术上的评析；这种学术史梳理不合格的史学作品，自然也就不可能融入学术史的谱系之中。它们可以发表在所谓“核心期刊”，可以获得各种甚至是国家级的资助和奖项，但是不可能获得同行的认可，也不可能在党史研究的学术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对于这类近乎非学术的所谓史学著述，党史界同仁最好在自己的学术史梳理中不评价、不罗列，以使其在学术史上留不下什么痕迹，以维护党史学术研究的规范及其学术共同体的尊严。

其三，学术研究当然可以而且应该“大胆假设”，但更需要“小心求证”。

¹ 陈独秀：《法律与言论自由》，《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

前者允许作者的思想自由驰骋甚至凭空想象,很多伟大的历史作品就产生于作者最初的奇思妙想;而后者却需要脚踏实地,谨小慎微,严格遵守学术规范,这包括资料的搜集、甄别与整理,论证的符合逻辑与命题的一以贯之等等。现在党史研究中,因宣传的强势与诱惑,使研究者的思想日渐枯竭且渐趋统一;除了大量非学术、重复性的题目之外,已越来越难见具有颠覆意义的“假设”了。对此窘状之成因及其对学术的戕害,笔者不便也无力评说。就“小心求证”而言,党史作品中,非学术规范的论证也并不罕见。其表现之一,就是将一些宣传性题目和结论作为文章的“假设”,或者提出一些根本不可能求证的所谓“重大问题”,随意抽取几条与题目有关的材料进行“抽样作证”¹。从史学研究规范的角度言之,此类问题基本上属于所谓“伪问题”。在这方面,70多年前胡适之先生对其学生罗尔纲的严厉批评仍有振聋发聩之效。

1936年夏,胡适致信罗尔纲:“我在《史学》(《中央日报》)第十一期上看见你的《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很想写几句话给你。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这个题目根本就不能成立。管同、郭嵩焘诸人可以随口乱道,他们是旧式文人,可以‘西汉务利,东汉务名;唐人务利,宋人务名’一类的胡说,我们做新式史学的人,切不可这样胡乱作概括论断。西汉务利,有何根据?东汉务名,有何根据?前人但见东汉有党锢清议等风气,就妄下断语以为东汉重气节。然卖官鬻爵之制,东汉何尝没有?‘铜臭’之故事,岂就忘之?名利之求,何代无之?”胡先生在讲了一番史学研究不可妄作难以论证大题目的道理之后,语重心长地写下了这段有名的文字:“你常作文字,固是好训练,但文字不可轻作,太轻易了就流为‘滑’,流为‘苟且’。我近年教人,只有一句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说三分话。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²

多年后,余英时教授对胡适先生的这段话仍念念不忘,评论道:“试看胡适先生连这样一个局部性的概括论断(generalization)都不肯随便下,他怎么会轻易提出‘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这样全面性的论断呢?……罗尔纲的题目不能成立,因为除非我们能先证明清代士大夫比其他各代都更要‘好利’,也比其他

¹ “不能只留意有利于自己意见的史料,更不能任意的抽出几条有利于自己意见的史料。有些问题,史料很丰富,若只留意有利于自己意见的史料,那么几乎任何问题都可以照自己意见的方向去证明,那可说是抽样作证”(严耕望著:《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9页)。

² 罗尔纲著:《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第56-57页。

各代都更不‘好名’。我们又必须进一步证明清代所有或至少多数的‘士大夫’都‘好利’，而不‘好名’。最后我们还得建立‘好利’和‘好名’的严格标准。如果士大夫‘好名’、‘好利’的现象无代无之，又不能加以量化，那么这个题目当然是没有意义的了。……科学方法的本质限定它只能解决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但是它不能承担全面判断的任务。即使在专门学科的范围之内也不例外。……科学方法的训练可以使人谨严而不流于武断，正因为如此，严守这种方法的人才不敢不负责任地放言高论，更不必说提出任何涉及整个社会行动的确切纲领了。”

1

当下党史研究，充斥着过多的不可能进行学术论证的“大问题”，其“大胆假设”有余但“小心求证”却明显有欠规范。上文批评的现在流行的所谓“三段式”叙述框架即是一例。李著虽然全书没有围绕着一个核心的“大胆假设”来展开论述，却也提出了若干像是“农民通过执著和坚定的抵抗，能够对国家乡村政策的制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样比较大胆的结论。然而，比“大胆假设”更重要的，却是严格按照学术规范的、符合逻辑的、一以贯之的“小心求证”。《乡村中国记事》的作者，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掌握了非常丰富、完整的乡土材料；也试图提出自己的一些设想。但就结果来看，李著无论是其论证的逻辑与文气贯通，还是求证的材料运用等，都与规范的“小心求证”尚有不小的距离。

¹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转引自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第221、223页。

【清华文革】

清华文革反思

——“红卫兵运动”的兴、盛、衰

小 鹰

从大尺度上来看，清华人在文革中只干了三件事：赶走工作组、打倒刘少奇以及用一种奇特的方式终结了全国的武斗。这三件大事也标志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鼎盛与衰亡的三个阶段。注意，我们这里所说的“红卫兵”并非特指某个组织，它既包括早期的“老兵”和“联动”，也包括后来自称“红卫兵”的各种造反派组织，例如“清华井冈山”、“新北大公社”等。

从表面上看，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似乎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或“给社会以民主与自由”等美好宣称的具体体现，实质上，它不过是专制独裁者在政治斗争中的木偶与炮灰而已。清华的文革，也可以说就是这样一个缩影。

一、赶走工作组——红卫兵兴起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充满杀气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晚毛泽东又批发广播了北大聂元梓的那张大字报。此后，清华经历了“反蒋”与“保蒋”，“反工作组”与“保工作组”的争夺战。平心而论，到七月中，清华园里“反工作组”的势头已被压制住，不再有什么影响力了。

七月下旬，中央文革小组陆续出面介入，传来“工作组压制革命群众，阻碍运动”的话，要撤销工作组。于是又有人，受“高”人指点，赶快给“工作组”、给王光美贴大字报。到八月初，入驻清华的“工作组”在部分“革命群众”的锣鼓声中，体面地撤离了清华园。

实际上，七月中毛泽东返回北京后，于7月24日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正式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做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仅靠后来校园中的几张大字报，工作组哪里就会自动离去呢？

有的同学认为，“毛泽东和刘少奇把清华当作一个角斗场。在这场角斗中，

刘少奇先出招，毛泽东后发制人，置刘少奇于死地。”

我觉得这种看法有点简单化和表面化。

事实上，自从6月1日批发了由康生暗地鼓动北大聂元梓写的大字报之后，毛泽东便把刘少奇推到第一线来领导他的文化大革命。问题是，既然毛早已蓄意要打倒刘，毛自己发动的文革为什么还要让刘来领导？现在看来，这显然是“工于心计”的毛给刘设的一个局。毛把文革之火点燃之后，便躲到“西方的一个山洞里”（指其老家韶山的“滴水洞”），在幕后观察。他实行的还是“反右”时的“欲擒故纵，以逸待劳，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老策略。

的确，工作组是刘而不是毛派的，不过毛已算好刘的“棋路”，知道他会怎样“出牌”。毛间或以社论或通过文革小组成员讲话来煽风、干预，诱导、鼓动、教唆、挑逗并激化矛盾，搅乱局势，以至无论刘怎样动作——“放手不管”也好，“压制群众”也好——毛都可以抓住辫子，将他逼上绝路。最后终于给毛等到了机会和借口，凭借多年来“造神运动”给自己树立的威望，把群众的怒火一举烧向刘少奇。毛抓住聂和蒯这两块石头，在1966年8月5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期间，以其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揭示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目的，新账和老账一起算，在全国掀起了打倒刘少奇的高潮。

现在来回顾，可以说，以聂来“投石问路”，在北大布阵，诱敌深入，原是在毛的设计之中；而蒯大富和王光美在清华的纠缠，对毛而言，则是一个意外之财。没有后者，毛照样会在派工作组的事情上收拾刘少奇，这一点可以从北大率先驱逐工作组看出。至少从7月15日起，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已受到来自“上面”的批评。随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有计划、按步骤先后四次云集北大，名为“听取不同意见”，实为“踢开工作组”定调子。江青开始打出了毛的旗号：“我是代表毛主席来看你们的”。北大同学曾来清华点火赶工作组，遭到驱逐，故清华驱赶工作组的波峰比北大要滞后一个位相。

无论如何，燕园和清华园里这场自上而下精心导演的，急上、急下、急转弯的过山车游戏已告一段落。当真相被揭示出来之后，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不免总有一种被作弄、被演戏的感觉，这就是毛运动群众的手法；或者说，是“无产阶级专政之下的社会主义大民主”。

与工作组被赶走的同时，毛泽东于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当天，

亲笔撰写了《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作为会议第二个文件下发，并附有清华附中关于“造反有理”的几份大字报内容。毛泽东对之的“热烈支持”，使“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像瘟疫一般地迅速爆发，矛头直指信中所说的“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也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红八月”的“红卫兵”以血腥和暴力的方式，拉开了“文化大革命”舞台沉重的帷幕。

二、打倒刘少奇——红卫兵鼎盛

自从1966年8月“炮打司令部”以来，毛泽东更是八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毛意识到，挑动由狂热的青年学生组成的“红卫兵”团体去“批斗走资派”，可使他的政治对手即刻“土崩瓦解”。你想，面对狂怒群众的文武暴力，谁敢且谁又能有任何招架之功？如稍有反抗，便加以“镇压革命群众运动”之罪名，予以“肉体消灭”。至于谁是“走资派”？斗谁？保谁？一切都由毛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人说了算，“革命群众”只有揣摩、紧跟的份儿，若有任何“非分之想”，敢越雷池一步，定遭同类的“砸烂狗头”——此即“大民主”。“红卫兵”所有的“革命行动”都不受“宪法”与“党章”的约束，更无所谓对“人权”和“人格”的尊重，一切都可以“无法无天”地干——此即“大自由”。

1966年12月18日，在毛泽东的授意之下，中央文革的张春桥单独召见蒯大富，讲“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蒯衔命而去，旋即率领“井冈山兵团”搞了个“12·25”大行动，把打倒“刘、邓”的口号响遍北京城，颇得毛泽东的赏识。

在这样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或简称“毛刘之争”——中，在毛派的授意和操纵之下，清华“井冈山兵团”冲锋陷阵，为毛泽东立下了辉煌的“汗马功劳”。从“批斗王光美”到“打倒刘少狗”，从“革命串联”到“揪刘火线”，这一类活动“层出不穷”，可以说是把“红卫兵运动”推到了最高潮。至此，“破四旧”的“红卫兵”已晋级成为毛氏文革之“御林军”。

《孙子兵法》曰：“攻心为上，攻城为下”。毛泽东通过“红卫兵”“无孔

不入”的造舆论、造声势，的确在全国把他“久攻不下”的刘少奇搞臭了，同时自己也变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红太阳“神”。

惯性的力量是可怕的。现在，几乎半个世纪过去了，虽然对毛泽东的评价仍是争议不断，有趣的是，对刘少奇的看法却多是负面的。似乎，无论文革成败，刘都是个历史的千古罪人。毛派人士不必说，就连现在一些主张政治改革的开明人士中，也普遍流行这样一种看法：毛泽东固然不好，但刘少奇也不怎么样。他们主要的理由，都是在“刘捧毛上台”和“毛刘都一样”上做文章。

一些“造反派”认为刘少奇捧毛上台，是其人品所致，他只是垂涎那“山寨”的二把交椅，嘲笑刘是“被他自己抬起来的神砸死的”，自作自受。但“红卫兵”和“造反派”也忘了，文革中正是自己把毛泽东捧上了天，只是后来抱怨遭到抛弃和整肃，才明白是受了毛的蒙蔽。如果结合自己的感受，回顾四十年代的情形，我们又比刘少奇高明多少？

中共“七大”时，毛显示的“政治才干”和“领袖魅力”，的确迷惑了党内外的一大批人；那会儿，不只是刘一个人捧毛。一直到文革时，“三忠于”、“四无限”、“誓死保卫红太阳”等口号满天飞，这又是从哪里来的？即使是现在，对“领袖”的肉麻吹捧不也还是一样吗？中国历史上人们喊“吾皇万岁”喊惯了，真是听着极舒服，喊的更起劲。这是源于中国浓厚的封建文化的一种劣根性，是长期生活在“君王制度”下人们的一种陋习。我们的社会，自上而下，似乎很难接受“公仆”和“民主”等“公民主仆关系”的概念，相反，奴隶心理、奴才习性却刚好与“帝王思想”、“个人迷信”配为一对。这也是一种“中国特色”吧？

另一些人认为“毛刘都一样”，因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陈毅等，他们都为中国共产党打天下、坐天下立下了丰功伟绩。他们全都信仰共产主义，全都迷信无产阶级专政，在保卫共产党政权这一基本点是共同的，本质上没有差异。

是的，他们都是共产党，但共产党并不是铁板一块。其中每个人的经历、教育、品质、性格、悟性并不都一样，我们要看到这方面的差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聂荣臻、李富春等是见过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从总体言行来看，他们更体察民情民心，更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对人对事更包容，更“通情达理”，更“实事求是”，更有世界和人类的眼光。不错，他们都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各

人的理解完全不同。刘少奇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坚持在中国要先发展“资本主义”。毛泽东没有读懂马克思，他信的更多是秦始皇，是他自己。毛泽东不是管彭德怀叫做“革命的同路人”吗？就是从民主革命走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就不再跟他走了。质朴的彭德怀未必读了马克思，但他关心民间疾苦，即使跟着毛打了天下，彭德怀也是反对毛搞他的那套“社会主义”的共产党人。更不用说党内还有过像胡耀邦与赵紫阳那样开明的领袖，还有过许多所谓的“走资派”干部，这些人有文化、有教养，坚持“独立思考”，接受民主自由的人文思想和人道主义；他们认同和欣赏刘少奇的方针和路线，一贯以不同方式顽强地抵制毛的那条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路线。

当年红军拒绝十九路军抗日的蔡廷锴将军，只因为“哪有猫儿不吃油，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这样的一句话。解放后斗地主，根据“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生物界现象，就论定所有地主都是坏的。如果现在认为“只要是共产党，那就一定都姓毛”，这种“左”派逻辑貌似“洞察一切”的深刻，实在是太简单化了。当前的重点是要批毛，如果看不到差异，看不到路线斗争，一概而论，把水搅混，倒轻易放过了毛泽东。和指责“刘捧毛上台”一样，说“毛刘都一样”也是一种偏见。偏见的一个特点，就是不能“换位思考”。

说来好笑，前些日子有位电视节目主持人谈起文革时，说清华大学的二校门是被蒯大富的“红卫兵”拉倒的，云云。这事乱扣在老蒯头上，他肯定觉得很冤枉。可是，不要说事隔几十年，就是在文革当中，许多被抄家批斗的老头、老太太，哪里分得清什么“清华井冈山”和“西城纠察队”的区别？又如何懂得什么天派、地派，团派、四派的复杂性？他们只知道来人戴着红袖章就是“红卫兵”，就是“都一样”地跟着毛主席来要革他们的命了，不是吗？

如果把上面说毛刘“都一样”的话改换稍许，说“红卫兵”和“造反派”都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立下了丰功伟绩，他们全都信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全都迷信毛主席，全都搞“打砸抢”、搞“武斗”，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一基本点是共同的，本质上没有差异！他们自己会有什么感觉？——天大的冤枉啊！我是受蒙蔽的，我没有“打砸抢”，没有参加过“武斗”，我很讲“政策”，和另一派不一样！要区别对待呀！——是不是？

又有些人说，搞文革是因为刘威胁到毛的权力！但掌握权力，归根结底，还

是为了推行自己的治国理念。权力之争的背后还是政治路线之争，如果权力之争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就说明，这两条路线的差异有多大，怎么能说是“都一样”？

让我们先撇开政治，不谈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要是六十年代的“困难时期”按刘少奇的主张做，能够“少死几千万人”，就很了不起！毕竟那是几千万条性命啊，这就是巨大的差异。这里包含执政是否有“以人为本”和“人道主义”的观念。当年刘少奇讲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造成的，怒斥毛泽东说“人相食，你我是上(史)书的！”——“在乎生命”，仅此一点，刘少奇就是很不错了；更何况他的“走资派”路线在中国是完全合乎社会发展规律，合乎马克思主义的道理。

现在的一些反思舆论往往只是谴责文革中“打人”的人不能忏悔道歉，但文革中跟着毛泽东以文武暴力去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批斗各种“反动学术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今天有没有想过，自己是不是和延安肃反时一样，也跟错了领袖，斗错了人？有没有自责狂热地把毛捧成“红太阳”？有没有为文革时“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痛悔？有没有追究为什么自己受蒙蔽？有没有考察国人为什么难能“独立思考”？很少。多数仍旧停留在指斥早期“红卫兵”打人的行为，嘲笑“刘少奇捧毛，自食其果”的浅层次。自己呢？还是一段“造反有理”的光荣历史，或只承认“受了蒙蔽”……

如果今天认真反思文革的话，我们不能不回答：这场你死我活的“毛刘之争”，到底是谁该死？谁该活？那两条路线的斗争，究竟哪条路线是反动的？哪条是正确的？这里没有中间路线可言，因为两个相反的矢量无法构成一个有合力对角线的“平行四边形”。

三、工宣队进校——红卫兵衰亡

“红卫兵运动”是一把双刃的剑。它的文武暴力，固然为毛泽东打下“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天下，但同时也深深地种下了“无政府主义”的祸根。恰如同“飞去来器”一般，它最终又打回到这位文革“始作俑者”自己的头上。

“红卫兵”从一开始就分有不同派别，双方辩论不过，往往就老拳相见。自1967年始，全国各地的“革命群众组织”又面临着夺权的诱惑，在中央文革“文

攻武卫”的指示下，更爆发了大规模的“武斗”。1967年7月20日在武汉，连毛泽东自己也几乎为“革命群众”围困挟持，险些成了“瓮中之鳖”。这是毛泽东所不希望看到的事。

1966年12月26日，73岁生日那天，毛泽东曾兴致盎然地祝酒说：“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后来的他却不得不三令五申地下指示、发通告要制止武斗。但“潘多拉”的盒子既已打开，“造反派”们为自身的存亡计，各以“情况特殊”为由对之“置若罔闻”，使毛的“大联合”计划成了泡影。

清华也不例外。1967年中“井冈山兵团”分裂出来个414派，双方都宣称自己“无限忠于毛主席”，“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经过一年多唇枪舌剑的“语录仗”，“批判的武器”终于变为“武器的批判”，清华园的武斗开始了。在两派心目中都把对方的同学看作是些反对毛泽东的十恶不赦的“魔鬼”，因此一定要消灭掉。加之毛以最新语录“火上加油”，曰“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既然是打国民党，那自然是你死我活了，在手段上就更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双方攻城略地，构筑工事，武器很快地从长矛、弹弓等冷兵器升级为步枪、手榴弹，也有土坦克、燃烧瓶。攻击性更强的老团围困老四据点时，采取停水、停电、火攻、投毒等手段，甚至以狙击步枪封锁道路，猎杀无辜，以致困守“科学馆”和主楼的老四处于极端艰难的状况。此后团派不断制造事端，使武斗升级，除了想要压垮414之外，还想压中央表态。414则几次在京城抬尸游行，抗议团派杀人，亦是希望上边出手解救。

武斗中处于劣势的414顽强的坚持，终于让毛泽东坐不住了，他必须结束全国这种失控的状况。于是毛重施“运动群众”的故技，请工宣队、军宣队来“领导”清华的“革命运动”。真不知和刘少奇派的工作组有什么不同？

制止武斗是件好事，可是，毛泽东为什么事先不打招呼，让毫无准备的工人们领命前往武斗地区送死？学生领袖们对此百思不得一解（见本刊另文，小鹰：《“七·二七”之谜》）。现在看来，这显然是毛故意给学生们的一个局。你想，学生们如果识相缴械便罢，如若不依，打死打伤无辜工人，他们自然理亏嘴软，不由得听任摆布，而吃了亏的工人们则更记恨这些“臭老九”，伟大领袖便可以从中渔利。

1968年7月27日上午，入驻的几万工人，不明就里，手持毛语录，懵懵懂

懂地来到清华。414自是盼来了“救星”，立即放下武器，配合行动。工宣队却受到团派的武力抵抗，结果死五人，伤731人。那时狂傲的老蒯，自恃是毛泽东的文革宠儿，眼见得眼中钉414即将被压垮，岂肯就范于半路杀出的什么工宣队？他向毛告状，要抓黑手，不料正抓到了毛的头上，自讨了一个没有趣。在入驻的工人死伤多人之后，7月28日凌晨3点半，毛才出面接见了五位学生领袖，“英明地”指出，他所倚重的“小将”们没有按照他的方向去搞文化大革命，“犯了错误”，文革要由工人阶级来领导了。

这样的表态实出乎两派意料，团派尤甚。“狡兔尽、走狗烹”，小将们的历史任务完成，该是下乡上山，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时候了。

那些死伤的工人们呢？后来似再未见有人提起过。现在想来，他们实在有点冤枉。既然伟大领袖的话是“一句顶一万句”，如果老人家早点出面，工人死伤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不过，这样一来，就不易拿住小将们的短处而一举镇住他们，亦不能突显领袖的英明。况且领袖也讲过：“要革命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为了及时抛弃鸡肋、顺利完成文革换马之大计，区区几个工人的性命，又何足挂齿？毛后来只用几顶高帽和转赠几个外国芒果便抚平了工人怨气，可谓既周到又经济。

学生们下台了，除了迷茫和失落之外，他们是否还有什么东西值得自慰呢？或更一般地问，如何看待文革中两派的斗争呢？

多年来，和许多人一样，我一直认为，文革中两派都是毛手中的棋子，半斤八两，互斗毫无意义。现在细想之下，也不尽然。特别是造反派之间旷日持久的明争暗斗，破了毛的如意算盘，让他的“七八年来一次文革”的美梦，变成“来一次七八年”的尴尬。看到他后来“骑虎难下”、“众叛亲离”、“枪法大乱”的狼狈相，着实也有些快意。试想，如果当时人们对他百依百顺，诸事都遂了他老人家的意，让“四人帮”顺利接掌江山，那中国还不知要倒退到什么黑暗的地步去了！在这个意义上，414坚持信念、殊死抵抗是令人感佩的。他们和所有不合毛意派别的存在一样，阻挠了毛尽早结束文革的计划，尽管他们还都自以为是在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从毛7月28日召见五大学生领袖时的讲话来看，毛泽东是明显地痛恨414坏了他的计划，而偏袒心仪的蒯大富团派。对后者，毛只是大骂他们“愚蠢”，

而且去而复返，再次特别交代：“‘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毛主席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

这很令人感动，是吗？

毛泽东枭雄一世，整人无数，在政治斗争中，只有“其乐无穷”，哪里有过什么恻隐之心？他这样嘱咐，不过是表达其“投鼠忌器”的隐忧，器者即他自己，“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他晓得，若是否定他所依仗的“红卫兵造反派”，那下一步就是要否定他自己了；恰如1959年的“庐山会议”，若是否定了“三面红旗”，那就意味着否定他自己一样。在7月28日那次召见中，毛泽东和造反派都流了眼泪。那天北京阴天，正下着小雨，毛似乎预感到“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的凄凉和恐怖。毛泽东运动群众、算尽机关，撒下怨恨与分裂的种子，最终自食其果，活该！

通过“七·二七”事件，毛泽东公开出面，总算是摆平了他仰仗的“红卫兵”造反派与全国无政府主义“武斗”的矛盾。此后“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红卫兵”开始淡出历史舞台。1968年11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决议，以“头号走资派，叛徒、内奸、工贼”等恶谥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其肉体亦按需要及时地“病故”消灭，蒯大富等则毕业分配，黯然离开了北京。两年后，在毛泽东的默许下，全国大规模开展清查所谓“五一六”分子的“X色恐怖”，自此，喧嚣显赫一时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即已“声名狼藉”、“荡然无存”矣。而毛泽东悄悄地完成了这个政治切割，抽身而退，他和他的文革依然“神圣”，不容否定。

人间的悲剧，往往由真诚与欺骗、梦幻与现实、良善与邪恶、忠贞与背叛、爱情与仇恨、坦荡与暗算、南辕与北辙、希望与绝望等元素构成。尽管大多数文革参与者都是些真心追求美好理想、希望社会进步的无辜青年，他们不惜为之付出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然而，“红卫兵运动”在整体上，却是一场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群体盲动。加之过程充满如上诸矛盾要素，因而，这绝对是一场国人不可忘却的历史大悲剧。

历时两年多的“红卫兵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独特的现象，它发源于清华，也终结于清华。“红卫兵”与毛泽东的关系及其教训，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文化课题。

【清华文革】

清华文革的“七·二七”之谜

小 鹰

1968年7月27日上午，在毛泽东亲自部署之下，北京地区几万工人，手持毛语录突然开进清华园，去制止那里两个红卫兵造反派组织持续了百日的武斗。然而，手无寸铁的工宣队却受到了蒯大富团派的武力抵抗，结果死5人，伤731人。这样的惨剧，为什么竟会发生在毛泽东支持的工人和红卫兵之间？它难道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吗？文革三大学生领袖蒯、韩、聂在回忆中，对此“七·二七”之谜均有较多的议论。例如：

蒯大富口述《岁月流沙》时抱怨道：“我后来几次批评当时的组织者，你们为什么不和我们打招呼啊？那次实际上是杨德中指挥的，吴德、谢富治他们都应该知道啊，但是他们为什么不通知、不打招呼？我始终没弄清楚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聂元梓在回忆录中也写道：“但我始终困惑的是，为什么不直接先跟蒯大富说一声呢？他不仅是清华学生组织的头头，他还是北京市革委会的常委，我还是副主任呢，为什么就不告诉我们呢？”

这件事的确是个谜。

韩爱晶在《清华蒯大富》一书里曾探讨了“事先不通知的原因”。他主要是指迟群、谢静宜等人“办事水平不高”，“以为尚方宝剑在手，自以为能”，或归结于谢富治“文化水准不高”，“他也不方便通知蒯大富”，等等。

然而，笔者注意到，在7月28日凌晨毛召见之后，谢富治立即要求5位学生领袖“整理一个简单的统一稿，一齐整理，一齐备案，一齐签名”，以便向下传达。当时，他特别交代了一句：“工人阶级是毛主席派的，对外先不讲”。“对外先不讲”——这究竟是谢的意思，还是毛自己的指示？笔者以为，如果不是毛自己有此令在先，谢富治恐怕是不敢这样“越俎代庖”、“画蛇添足”的。韩在书中写道：“谢富治说过，开一万人的会都要请示毛主席”。召见时毛自己也讲，“你们想想，几万人去，什么事情，没有中央的命令，他们敢？”谢深知主子是个“刚愎自用”的人，尽管在召见之后，“对外先不讲”的时效已过，但没有毛

的再指示，他又哪里敢轻易违背？——那是个令所有官员“恐惧战兢”的年代啊！对于“最高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再有，在决定派出工宣队时，毛不是只说一句话，就让下边去办事的人。相反，“毛泽东亲自听取了准备工作汇报，毛泽东蹲在地上，俯视清华平面图，他用大手在图上指示工人从南门、西门、东门分别开进清华”。这些事实表明，毛定此事是经过深思熟虑，并亲自做了周密的部署。“事先不打招呼”，这不大可能只是一个疏忽或“没有想到”团派会开枪抵抗的结果。

事发当天，蒯大富是见到过吴德、迟群和谢静宜的，迟、谢二人肯定知道是毛派出的“工宣队”。即使事先来不及“打招呼”，当已发生严重的流血死人事件时，迟、谢为何仍然“秘而不宣”这“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还在同蒯大富没完没了地“谈判”？这里的隐情恐怕是领袖另有“对外先不讲”的口谕。

蒯大富后来“分析”，为什么所有的人都“没有说出工宣队是毛主席派来的”，认为那是别人故意对他“封锁消息”。韩爱晶则对蒯大富讲：“人家就是幸灾乐祸，看你的笑话，盼你倒霉。”

然而，笔者以为，众人“不约而同”地“封锁消息”，恰好表明：派工宣队进校一事，根本是毛有意不让预先通知，他一定要等事后由自己来讲这件事。这或许是个更合逻辑和情理的解释。

韩爱晶批评“毛主席布置方法不规范。应通过周总理中央碰头会，再由谢富治、吴德、黄作珍及李钟奇在市革命委员会布置几万工人进清华”。但是，毛正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历来喜欢搞“奇袭”。他知道，那样一来，将很难保密，结果就难奏奇效。

有的同学认为，“毛泽东对蒯大富等人说：‘没有打招呼，是我的错误，间接打了招呼。’什么叫‘间接打了招呼’？应当是通过一个中间人打招呼。这个中间人是谁？我猜想周恩来的可能性较大。”事实上，毛在此事上最不想通过的人，大概就是同情414的周恩来。因此毛绕过中央，直接指示可靠的“身边人”动作，搞突然袭击。但结果却“出乎意料”，令毛扼腕叹息——不是因为死伤了工人，而是他不争气的宠儿掉入了陷阱。毛泽东恨恨地说：“蒯大富，你真蠢哪，我们搭梯子让你下来，你不下来。……在这个时候，414也没有通知，为什么他

们欢迎？这一次你们很蠢，让 414 欢迎工人。”

近年来，蒯大富仍为自己辩解说：“当时不要说是毛主席派的，只要中央文革派的，我也不可能跟他们打起了。其实不用说那么多，那怕透露几个字，我也不会抵抗的。”

是这样吗？

中央多次发布“制止武斗”的告示，谢富治、吴德也做了告诫，都可以说是“间接打了招呼”。而那时团派却强调：“七·三”布告不适用于清华，团派与四派的武斗有特殊性。即便 7·27 那天迟、谢二人“奉旨宣诏”，蒯大富就肯附首“接旨”吗？未必！在毛“大权独揽”的年代，在毛之文革宠儿们看来，中央算什么？谢富治、吴德又是老几？更何况是“名不见经传”的迟群、谢静宜了。没有毛亲自发话，谁又能不怀疑这“间接的招呼”不是“黑手”在背后操纵呢？文革中“无政府主义”泛滥，“怀疑一切”、“打到一切”之风盛行，正是毛自己专权独裁种下的苦果。

后果呢？“惨剧发生在毛泽东支持的工人和红卫兵之间”，这令韩爱晶难以理解。殊不知，这惨剧恰恰是毛所期待的拿住红卫兵小将们的代价；唯有至此，“布告天下，咸使闻知”才最有震撼的威力。毛在召见时说，“我说这蒯司令的井冈山打死四个人，打伤针织总厂五十个，就是如果不考虑这个社会影响，我也不是看一个人，实际损失最小、最小。”林彪立即响应道：“值得，损失最小”。周恩来接过话茬，重复林对文化革命的总体评价，巧妙地说：“林副主席说得好，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这是奉承还是“语义双关”的讽刺？不得而知，反正毛挑不出他的毛病来。和往常一样，毛泽东则用他自己的“检讨”惯用语，轻松地调侃道：“我是罪魁祸首，罪责难逃啊！”一句空话，完了。

【随 笔】

从保尔与冬妮娅谈起

——活法儿的自由

李南央

1997年12月号的香港《开放》杂志刊登了我那篇关于母亲的文章后，我曾给编辑金钟先生写过一封信，希望他能发表在紧接着的下一期上。可能因为新闻焦点的转变，《开放》并没有如金钟先生告诉我的那样，在接下的一期对我的文章展开讨论，故我的信也就没有登出来。我还是觉得那封信里的意见其实很重要的一面，摘选几段放在这里。

金钟先生：

承蒙贵刊看中本人拙作，并作为特稿发表在十二月号上，实有受宠若惊之感。

昨晚通话，得知贵刊在下期要刊登几篇对拙作评论的稿件，不知能否同时发表我的这封信。

我的文章的标题是《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刊出时改成了《六十年恩怨情仇》——记我的父亲李锐，母亲范元甄。这种适应香港市场运作的改动，虽然与我的文章风格大相径庭，但并不一定要反对。整篇文章除了增加了段落标题和删去了某些话外，基本遵照了我的原文，只是结尾的最后一小段几乎完全是编辑加的了。实在对不起，我得坦率地说，我不喜欢编辑的处理。我把原文结尾和编辑改动的结尾抄录如下，让读者有个比较，也说明一下我不喜欢编辑处理的诸原因之一。

我的原文：

作为女儿，恨我妈伤害了很多，甚至毁了她亲人的一生。但有时也深切地同情她，记得她对我的一切好处。我少儿时期，妈妈曾付昂贵的学费让我学习钢琴。在我进厂的第一天她告诉我：“即使做一个工人，也要有大学的知识才能当个好工人。”那正是“知识无用论”最盛行的年代。这话我一直记着，终于学了出来。尽管我们没有拿那块怀表，但是我记得妈妈曾要送外孙女一块毛主席头像的怀表作纪念。这些记忆是不能磨灭的。妈妈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不多了，我多

么希望她能够回首平生，公允地认识自己给他人带来的伤害，认识到是自己害了自己。我希望她不后悔自己曾在这个世界生活过，不论好坏。

上述文字经《开放》的编辑修改，成了如下模样：

……这些记忆是不能磨灭的。我今年四十七岁，也算见过世面成家立业了。我不知道由一位女儿写还健在的父母长达半个世纪的恩怨情仇故事，在当代中国有无先例？但这写作无论如何沉重甚至痛苦，却也是一种解脱。妈妈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不多了，我多么希望她也能像保尔柯察金坐在海边回首往事一样，看看自己一生是如何伤害了他人，也伤害了自己。这篇文章是一个女儿对母亲的最后倾诉。我最大的愿望是母亲能看到这篇文章。许多当面她不容我讲，因而她永远听不到的话，我都写在这儿了。（这段基本是我原文开头的话，放在这里甚好）
女儿在母亲面前是可以毫无保留的。”

保尔确实是我们这一代人都崇拜过的偶像。他的“生命是宝贵的，生命对人只有一次，当我们临终前回首往事时，不应为自己的碌碌无为而感到羞愧，也不应为自己的浪费时光而感到后悔。我们应无愧地对自己说：‘我没有虚度年华’。”（一时查不到原文，记忆与原文可能有出入）曾是很多五六十年代青年的座右铭。但是我现在逐渐悟出了，保尔固然伟大，但大可不必人人都要按他的模式生活。毛泽东治下的社会主义的最大弊病就是封杀个性，强制每一个人都要按党所指定的框框生活。如果不学雷锋、王杰、刘英俊，就是落后，就应为社会所不容。我自己就写过墙报稿，讽刺同宿舍的女工一天到晚庸庸碌碌，吃饱了混天黑，弄得人家抬不起头来。

到了美国，看到不大求上进的人，中学毕业在餐馆做个招待，或在加油站做个收款员，要不当个擦车的，也生活得其乐融融。没人说他们落后，也没人看不起他们的胸无大志。每个不同志向的人、每个不同能力的人，都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没有那么多失落感，不平衡感，因而就多了一份幸福感。我想大多数美国人评论自己一生是否虚度年华的标准不是能否成就一番伟业，而是这一辈子是不是干了自己想干的事，是不是找到了自己信赖一生的终生伴侣，是不是要了自己想要的足够数量的孩子。我一点也不想让我的母亲以保尔的思维方式回首平生。保尔在乌克兰的酷寒中筑路，毕竟是遥远过去的事情，我们太不希望人类再

有那种残酷的自我牺牲。我只希望我的母亲能以公允平和的心境回忆往事，她的一生太不幸。她没有干成自己想干的事，她没有爱成自己想爱的人，甚至她所有的儿女都不能跟她同居一室。我希望她认识到这所有的不幸，绝不是我父亲带给她的。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共产党害了她，不过她自己确实是最大的祸首，认识到这一点，一切还来得及补救。因为你无法控制别人，却可掌握自己。她一生极大的悲剧色彩是很奇特的，就冲这一点，她不应后悔自己曾活过。她应该把它写出来，让世人了解她的痛苦，让世人知道那个党，那个制度是如何扭曲了人性。如果现在的当政者能从她的故事中悟出共产党是要改造自己，是要改造自己所建立的制度，那她真是作了一件好事，被她伤害过的人是会因此而原谅她的。不过我太了解我的母亲了，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奢望罢了。

戏剧性的是，这封信里提到的墙报稿，居然让我找到了。那是我当年在代号为“93信箱”的三线工厂当工人时的“杰作”。我也把它抄录在这里：

如此一天

往往我们都上班了，她还没有起床。八点多钟甚至九点才在车间露面。倘若天气好，那她是绝不会让太阳白白落山的，一定要跑回宿舍，把被褥晒上一番，甚至再洗上一条床单。机床可一月、半年地不动，宿舍的地却是常常扫上数遍的，甚至还要用抹布擦洗一遍。技术书、政治书几乎从来不看（也有心血来潮的几次例外），台布却是要天天勾出几朵小花，甚至干上它整整几个小时。晚上进被窝前，照例是那句话：“又是一天”。如释重负，谢天谢地，总算又“熬”过来了。

起先，我们觉得好笑，进而习以为常，久而久之也认为此话是她一天恰如其分的日记了。只有一天例外了，‘哎，又是一年！’我们不禁震动了。抬头一看，时针正指着73年0时0分。啊！青春就这样一天天地消去，生命就这样一年年地逝去。73年的最后时刻，一片寂静，只有夜晚为成为清晨在急急地奔走。无论何时，光阴是从不知停歇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金石玉言又在耳边响起，震撼着我的心：“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人只有一次，因此……”

二十几岁的青年，正直一生精力最充沛、体力最健壮、血气方刚之时。若不

赶紧生活，在这宝贵的年华中多学些东西，扎稳工人阶级的思想根基，掌握为人民服务的真正本领，像她这样混下去是多么可悲可耻啊！台布、枕套勾了一条又一条，扑克打了一盘又一盘，克郎棋技艺不断提高，这些占去全部的时间，有什么用呢？我们当初不是抱着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终生的理想来到三线的吗？祖国的汽车制造业是绝不会下马的，祖国急需大量汽车。同志，让我们一起为了将来的工作，珍惜现在的时光，让短暂的生命，成为陈岱山那样助起革命熊熊火焰的一根火柴。

信和墙报稿整整相隔了27年，可是都提到了保尔的那句为我们这一代人所遵循的生活的哲理名言，只不过要想说明的问题却是南辕北辙了。

当年，我是厂里小有名气的一杆笔，写过无数篇黑板报稿。虽然因为出身不好，没有上台发言的机会，但总是为车间的先进班组、先进个人抓刀代笔写“誓师大会”、“批判会”、“讲用会”的发言稿。都写了些什么，一点儿也记不住了，偏偏就这一篇二十多年都没忘，而且保留了当年的底稿。我之所以记住了这篇稿子，是因为这是我在工厂那些年里，唯一的一篇以身边人为对象的批判文章，当时就多少感到有些于心不忍。稿子中被我嘲讽的对象，是我单身宿舍的舍友，这些年我常常想起她，也曾打听她，很想当面向她道一声“对不起”。不是因为我改变了初衷，认同了她的生活方式，而是为我那时对她和她为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的不尊重。

我的父亲在他的“八十自述”一诗中有这样一句：“堪慰一生未左偏”，我这个女儿可是无法这么骄傲地自诩。年青的时候，我是非常真诚地希望自己是“左派”的，并且非常自以为是，以为只有自己是正确的，对一切和自己行为方式不同的事和人都嗤之以鼻，认为那不是俗气，就是“小市民”。稿子中提到的陈岱山是个什么人，他的英雄事迹是什么，我竟是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文革”年代英雄人物太多，报纸上天天号召人们学英雄当英雄，我那时真的以为只有像英雄那样生活才是人生。十亿中国人民只有一个活法儿：“向英雄学习，做无名英雄”。天知道有多少刘英俊根本就是宣传机器造出来的；天知道有多少人成了英雄之后，有多痛苦，根本无法“活人”了。

我先生最近突然有些感慨，问我：“你说人活一辈子，到底为什么？”我毫

不犹豫地回答：“享受人生！”

在中国和美国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下生活过了，到了知天命的年龄，我自觉得是悟出了人生的真谛：“享受人生”。生命只有一次，而且又那么短暂，是得抓紧生活，抓紧享受。正因为是“享受”，所以它一定是多元的，一定是因人而异的，而不是不“如此”既“非”也。所谓“非”，在过去曰“资产阶级人生观”，现在是“没出息”。

其实每个人由于性格，家庭背景，受教育程度，所在社会阶层，甚至遗传基因的不同，生活的能力和生活的志向是十分不同的。保尔认为冰天雪地，铺轨修路是一种历练，是为无产阶级造福，而从苦之至极中品尝到甘甜；冬妮亚则以为讲究的衣装，温暖如春的住宅，贵妇人的生活是她的满足。在这里很难说谁对谁错，只是个人对生活有不同的认同。一定要说冬妮亚不对，那又为什么那么多共产党员在有了权力以后，会比冬妮亚还冬妮亚一万倍不止呢？

在美国，有一点很使人感到舒服，就是大多数人生活的平和与心态的恬静。去餐馆吃饭，服务生的喜兴儿极劲儿让你觉得坐在那儿就是一种享受。特别是那些漂亮姑娘，忙前忙后，跟每个她所服务的餐桌的客人开开不伤大雅的玩笑，会使你觉得她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接受她的服务，也是你的幸福。加油站看钱摊儿的，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挣那几个辛苦钱，养家糊口，也兴趣盎然。特别是跑长途中在某个高速路边的小加油站连加油带歇脚，售货员的淳朴的笑脸和热热的咖啡，再加几句道辛苦的寒暄，能让你再上路时人也像加足了油的车，又精神抖擞了。

在美国生活的大多数平民百姓并不十分地眼馋比尔·盖兹的财富，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那个本事，也下不了那个苦功夫。都说美国竞争激烈，但是生活在这里感到的是要保持一份好工作在知识上的压力，要不断学习，人与人之间的倾轧，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不能说没有，比之中国可是少多了。因而并没有什么心累得让人受不了，浮躁得让人难受的感觉。究其原因，每个人尽己所能，按自己的方式享受人生，大概是最大的造福者。父母不会因为儿女没上名牌大学丢脸，孩子也不因自己只是个“跑堂”的觉得寒碜。想多挣钱，出人头地，那你就活得累点。否则钱虽不多，可轻松。各有个的活法儿，没什么“先进”、“落后”之分；没什么“贵族”、“贫民”的自傲或自卑。

相比之下，中国过去是“霸道”，就像我自己，钻技术、学政治、忧国忧民；碰到了舍友，喜好闺楼之事，对其他没有兴趣，我就看不惯了，横加指责，还在黑板报上写文章损人家，弄得人家灰头土脸，抬不起头。现在是“不平衡”，看油田的看“大款”进出高级饭店，西服轿车，不平衡。想的不是凭本事吃饭，有多大能耐干多大事，活得不挺好？干嘛非跟别人较劲儿，和自己过不去。搞古典高雅音乐的看歌星、大腕，一场出场费比自己一辈子挣的都多，可他们的付出有多大？不平衡。可就不想，歌星、大腕们走的是“商品艺术”之路，你进的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殿堂，各有一好，干嘛非跟不是一股道上跑的车比试。

其实归根结蒂，过去的一个标准，今天的一个活法儿(进外企，当白领，甚至金领)都是传统的“一元化”宣传方式闹腾的，都是“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非做人尖子的思维方式搅和的。今昔不同的只是人尖子的定义变了。其实天地那么大，人群那么杂，干嘛非照着一个标准、一个方向奔？累不累？可怕不可怕呀？宽松点儿，自己想干点儿什么就干点儿什么，能干点儿什么就干点儿什么；找着点儿什么，就干点儿什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在自己创造的条件下“享受人生”，活的轻松点儿，也让周围的人感染点儿自己的快乐；弥漫在大陆空气中的“气不忿儿”能稀薄许多。社会也就平衡了，安定了，国家也就好治理多了。不是这个理儿吗？

2002.9.30.

【述 往】

插队的那些事（六）

——分家的故事

朱 特

雨村与知青分组

雨村分大小两个自然村落，大的叫大营子，是大队部的所在地，村民分属二、三、四生产小队；小的叫小营子，是第一生产小队，两个村落相距2里地。这个村当时共有人口近千，人均土地8亩多。

从京城出发之前，学校把知青编成10人左右的小组。我所在的10人男生组在离京时被告知到了农村是在一起的，不再分开。到土左旗后之后，我们男生组又和京城名校女十中的10人女生组（她们都初中生）合在一起分配到了雨村。

在雨村大队部吃完欢迎宴后，大队又把20名男女知青改编成每组5男5女的两个小组分到一、三两个生产小队插队。留在大营子三队的为知青一组，我们去小营子一队的为知青二组。后来我悟出，大队这样分主要是为了工分平衡，因为国家规定男女知青必须与强劳力同酬，在雨村男强劳力为10分，女为8分。说实话，雨村人在执行国家知青劳动报酬的规定方面没有打折扣。

黄河百害唯富一套。雨村就坐落在前套平原上。雨村当年是“天苍苍，野茫茫”的敕勒川，是水草丰茂之地，千百年过去，依然是“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的雄浑气象。但经过几百年的移民开发，已不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风貌，而是成了阡陌相连良田沃野的农业区。生活在这里的汉人祖籍多是从山西迁来，这和我的先人是同乡。我的先人也是明朝那时节从山西移民到冀中平原的。

我刚到雨村的时候就感觉到了它的富庶——这种感觉，一是从与我的家乡冀中平原上的那个小村比较而来的。家乡平原上的那个小村是我“猫冬”的地方，每年冬天离开雨村后就到小村与祖父母过春节。再是同晋北、陕北的插队同学比出来的，听他们描述插队的村庄，我心里还真有点庆幸我比他们早走了一步。

雨村在我们去之前就用上了电，不仅有电还很少停电。因为有了电，大队

办起了粮食加工作坊，全村人就不必像我冀中小村的人那样推碾子拉磨了。冀中的小村家家户户虽然早就安上了电灯，但停电的时候比送电的时间还长，晚上多半时间都要点煤油灯。而雨村在印象里就好像从来没有停过电。有了电生活方便了许多，离现代化就不远了。列宁不是说过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嘛。雨村离共产主义比我的家乡要近。

富庶的直接体现就是工值。去雨村的第一年，我所在的一队每个工值一块二，知青们只劳动了3个多月，年底每个人就分了几十元，我分得最多有百多元。这和当年知青没有实物分红不扣除现金有关。10个知青生生地从小营子的贫下中农手中分走了近千元之多！我冀中家乡的工值就远远达不到雨村的水平。

与冀中家乡最大的不同是，雨村社员的自留地由小队统一耕种。这样做的好处是秋后分口粮时可单列一项，亩产自定，这对社员吃粮有好处。对知青的好处更大：不必为自留地忙活。人民公社曾被称为通往共产主义的“金桥”，但这座“金桥”走的是下坡路，工值逐年递减。10年后，当三哥最后离开雨村时，工值也就是两三角钱了。“金桥”离共产主义越来越远了。

当时并不知道我得到是从雨村人手里争过来的。知青的到来并没有给雨村增加一寸土地也不可能让地里多打出粮食，但我们要吃要喝要生活，这些从哪里来？只能从雨村人的饭碗里往外后择。后来，一位老人告诉我，没有毛主席我们不会叫你们来的，他打发你们来，我们咋敢说不要？我明白了，农民不欢迎知青。

贫下中农想平均分配知青

小营子的一位贫下中农对知青的到来有如下的精彩比喻：一块肉本来10个人分吃，知青来了，肉还是这么大，人却多了一个，所以原本的那10个人就要少吃。老乡的话很朴实也很到位。其实就是这么个理儿。

在这个道理的支配下，我们到雨村小营子的第二个秋天里的某一天，当我们还像往常那样到小队部等待分配活计的时候，小营子的掌门人突然对我们下达了命令：你们去大队要活吧。我们立时成了丈二和尚不明就里，小队长和颜悦色地对我们解释了他下这道命令的初衷。他说我们已经负担你们一年了，今年应该由没有知青的小队来负担你们。我们这时才明白知青到农村去，被农民视为包袱。

我们没有和小队长争吵，但心里不免悲哀，我们成了“负担”，也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产生了疑惑。不知道大营子那边的哥们怎样了？

果然三队的队长也停止了知青的农活。看来这是两个小队长商量好的统一行动。这样，雨村 20 名知青成了下岗人员。我们也许是全国最早的下岗工人吧。

下了岗的 20 个知青一同找大队。大队长和支书对知青们说解决的办法也有，就是把你们知青平均分到四个小队，每个小队五个人，这样四个小队的负担就平均了。这个分配方案立即遭到知青们的反对，理由是：知青是集体下来的，应该保留集体的完整性。刚到雨村时已经把大集体变成了两个小集体，现在不能再分拆了。

大队干部在小队长们的压力下坚持要分拆知青，知青在维护集体的名义下坚决反对，于是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小营子的知青天天跑上 2 里路到大队部开会。在大队部里，大队干部讲一通分队的大道理，知青们就讲一通不分队的大道理，如此这般三四天后仍然没有结果。

无意中的偷听

说来也巧，那天傍晚没有任何结果的会议结束后，10 个男知青都聚在大营子男知青宿舍中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我那时刚学会吸烟。口袋里没有烟了，就回到与大队部一墙之隔的小卖部买烟。出来之后，听见大队部里嘻嘻哈哈的挺热闹，仔细一听里面有我们一队女同胞的声音。我好奇心重，竖起耳朵，只听她们说的是分队的事。我就听到女生组长说，我们同意分队，但我们必须留在一队，让男生来大营子。其他人也鸡一嘴鸭一嘴地说这说那，无非是同意分队但要留在一队的车轱辘话。大队书记小块乐得连声答应。女同胞们看来对男生怨气颇深，向书记抱怨说，我们早不想和他们过了，他们吃得那么多。有人接口举例，是呀，那天他们收工回来得早把一锅饭都吃了，害得我们重做了一锅。真是脸皮薄吃不着，脸皮厚吃个够。她们的话让我这个偷听者面红耳赤，却也不敢进去分辩。我也不敢再继续偷听下去了，赶快向同伴们报告这惊人的发现。

听了我的汇报，哥几个全都来了气，哇，这还得了，怎么能在背后搞小动

作呢？既然同意分队也应该和大家商量一下，为何不事先打个招呼？男生们在宿舍里发出了一连串的问号，但并没有立刻采取行动。堡垒从内部垮了，所幸大营子的女同胞没有采取相同的立场，维护集体的人还是多数。

突如其来的变故，使三哥二饼子和力兄必须想出对策来应对。高人自有高见，他们想出了先发制人之计。

晚饭时男生没有任何表示，女同胞自然也不动声色，大家和往常一样相顾无言吃了一顿各怀鬼胎的晚餐。

先发制人

第二天继续到大队部开昨天没有开完的会。念完毛主席语录，支书小块讲完话后会议又陷入沉默。当大队长敦促知青们都“咯吵咯吵”时，三哥说了石破天惊的话：我们同意分队，但我们要留在第一小队。三哥的话就像引爆了一颗原子弹，大队部里立刻翻了天。

我们在小营子生活了一年，既和老乡混熟了，也习惯了小营子的生活环境。虽然老乡把知青的到来看作是包袱，但纯朴的村民并不歧视和欺负知青。我们和老乡的关系处得也非常好，在小营子里我还有了一个“结拜”，在生活和劳动中都受到这位结拜哥的照顾（插队30周年我和阿生重返雨村，就有和我的这位结拜哥好好喝上一盅的想法。但他们全家都迁到了千里之外的城市，面对人去屋空的老宅，我深感遗憾，唯把记忆深藏）。所以当时知道女同胞的意思后，一方面是生气，一方面也觉得既然要分，那么就要争取留在小营子。这点我们和女同胞们想的都一样。故此要在女生没有说出她们的意见之前，出其不意先下手为强，也是为了争取主动。

三哥的一句话，把在场不知底细的大小队干部说得高兴了，纷纷说这个可以的，他们觉得让人头痛的分队事终于柳暗花明。大营子的五个哥们在旁边敲打着边鼓，另外五个女同胞不明就里只作壁上观，不发表任何意见，这实际上也是对我们的一种支持。我们小营子的五个男生心中窃笑，那边五个女同胞却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我们一个个做表态秀时，女同胞们经过短暂沉默之后终于忍无可忍发出了怒吼：我们决不离开小营子！

男生反诘：凭什么你们不离开？（问话含隐隐的窃笑）

女生回答：要离开的是你们，因为你们先提出同意分队的。（有点急了）

男生：就依你们的提法，也是你们离开小营子，因为是你先提出同意分队的。此话一出，男生们都笑。

女生：好呀，你们偷听！你们脸红不脸红？（我有点脸红但面黑且无人注意）

男生：没有偷说的，哪里有偷听的。（我的脸立刻恢复原色）

接下来就是唇枪舌剑你来我往的一场嘴仗。原本支持女同胞留在一队的书记小块这时再也无法控制会议，任凭知青们吵翻了天也拿不出个主意，这样的辩论会他也许从未遇到过呢。

最后恼羞成怒的女生拿出杀手锏：分组——再也不和男生一个锅里起伙了！

男女分家

分组实质上就是分家。知青内部的横出枝节，使分队的会议再也开不下去了。经过协商，分队的会议暂停，先解决小营子知青分家的事。知青的活还要继续安排，分队的事还要从长计议。大队之所以这么安排，也是因为在这个期间我们曾到旗安办上访，旗安办明确指示要大队照顾和尊重知青的意见，不要强行分队。故此知青又重新“上岗”，不过改成了我们每隔五天轮流在一队二队“上班”；大营子的知青则是在三队四队“上班”。不过这又带来诸多不便。

在大队书记小块的主持下，分家的会议改在了小营子女同胞的宿舍也就是我们的“食堂”召开。会议参加人员也只限于小营子的知青和一两个大小队干部。女同胞坐在炕上，男生坐在炕下，阵线分明。女同胞一脸的同仇敌忾，男生则是一脸的严肃认真。

说实话，男生本心不想分家。虽然一年来男女知青之间始终保持着没事不过话的传统，但也说不上有多大的矛盾，私下里男生也的确想到了在吃饭上还是占了便宜的，在家务活上也自觉地担负起了多数的重体力活。如果分了家，男生的粮食够不够吃也是个问题，男生还是想和女同胞们共同维持着这个集体，出门在外的大家互相帮助帮助嘛。

男生的主要发言人是三哥，这个家伙脑子好嘴也好，来得快。二饼子和力兄

在一旁及时帮衬，我是笨嘴拙舌倒想白活白活？但没有那个文化水儿，只有听的份儿。包四兄生就是个不爱说道的人，他也是听会。

第一天的会上，三哥做出一副诚恳状代表男生作了一番检讨，然后又说，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般齐呢，有什么事大家还是都担待些，希望能保持这个集体的完整性。

他的话刚说完，女同胞们就群起而攻。新国同学说话慢条斯理有板有眼，她也是女同胞方面的主要发言人。她说，分家不是不要这个集体，我们还是一个集体呀。她说的最经典的话是：两口子还要打离婚呢，我们分家也算不得什么。女生组长说话一针见血：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如何分家，不是让谁作检讨来了。女同胞大约真是伤透了心，和解的大门关得死死的，一点通融的余地都不给男生留下。

和解的希望破灭了，男生只好接受分家的现实。

三哥又从口袋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分家声明”，字正腔圆地念了起来：雨村知识青年第二小组，括号，原，括号，关于分组的声明。鉴于某某等到五名女生坚决要求脱离第二小组的意见，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表示同意。提出分组方案如下……在这个声明中，包含着把女生养的小鸡和小狗一家一半分掉。这个声明是三哥头天晚上在九和的炕头和二饼子力兄共同创作完成的。几位仁兄想出这么个“声明”，玩外交辞令的目的就是想气气人。

三哥把声明念完，郑重地交给了女同胞。她们根本没有想到高中生们还会有这样的一手，立刻吵翻了天。她们大声抗议：按你们这么一说，合着我们不是知青了？谁是“原”第二小组呀，我们才是呢。我们坚决不同意你们是“原”第二小组。小鸡是我们养的，凭什么给你们一半？小狗也是我们找老乡要的，你们凭什么也要？你们可真狠呐，那小狗还能分成两半！……

第二天的会上，女同胞针对男生的声明也宣读了她们的声明。声明的宣读人是新国同学，念完也把声明交给了男生。女同胞的这份声明，三哥就一直把它保留到了现在（2012年2月12日，雨村人聚会上，三哥把保留了40多年的女同胞写的声明，进行了宣读。这一举动无疑令聚会掀起一个小小的高潮。它的出现再次促动了我写当年事的想法。可惜的是男生的声明没有保存下来）。女同胞的声明因非首创，它对男生的情绪“杀伤力”大大减弱。

分家的会好像开了两三天，其间把公社一级的领导也惊动了，曾派人与会协

调。在为了第二知青小组“原”与“非原”的争争吵吵中，小营子知青了达成了分家协议。在整个分家的过程中好像都是男生在占着上风，但最后失败却是我们。被女生撵出了“饭团”，是不争的事实，那是1969年10月份的事。

虽然分了家，但小营子的男女知青之间似乎也并没有结怨。本来在一起吃饭的时候，男女知青之间就是公事公办外加“相敬如宾”似的无话可说，从来就没热络过，分了家除了不在一个锅里搅马勺外，和平常没有任何不一样的地方。这也算是为后来的合灶奠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基础吧。

关于合灶的几句话

1970年初春，雨村的积雪还没有完全融化时，我和二子先行回到了小营子。这年冬天女同胞有三个人没有回京猫冬，我把从冀中老家带来的白薯和花生，让小营子的后生给先我回村的女同胞们送过去了一点儿以示心意，得到的回报是，她们把做好的饭菜给我送了来。

接着就听到盛芬同学要结婚的喜事，作为“娘家人”，我和二子义不容辞地代表男知青参加了盛芬同学热闹的婚礼。这两件事或许为不久之后的合灶起了点催化作用。当小营子的高中生们回来后，女生主动找上门来说我们还是一块起伙吧，这当然是男生求之不得的事（本来就不想分），便欣然答应。这样知青第二小组又破镜重圆，回到一个锅里搅马勺。后来问女同胞怎么想起合了。她们说回北京后家长和同学们都反对，说是合在一起好，能互相帮助。看来这个世界还是要和谐的。

于是，每到开饭的时候，和以前一样，一位女同胞站到面对九和小院的矮房上叫一声：吃饭了——。男生就会：噢——应一声。5个人鱼贯而行，绕过小队部去女同胞的宿舍兼食堂吃饭。不过再次成为“饭团”的知青只有9个人了。

【述 往】

安希孟回忆录（五）

——我与文革

安希孟

文化革命是一个不知宽容包容为何物的时代。那时所继承的政治学说，是关于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国家学说、政权专政、政府理念。文化革命起初想用公社代替国家。北师大新思潮派提出公社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The commune is not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state）。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公社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马克思国家学说的一个重要问题——“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马克思赞赏的巴黎公社那些摧毁旧国家机器的措施，主要都是弱化强制手段的措施，包括废除常备军而只保留民兵。马克思决不是废除资产阶级常备军而建立无产阶级常备军。《法兰西内战》的核心思想是无产阶级不能“借用”而只能“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巴黎公社在人类历史上作了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废除常备军的第一次尝试。全面内战的口号激荡着青年人的心扉，后来成为我的好朋友的中三郑艳芬，因为认为资产阶级法权下仍然存在剥削，被打成反革命，同窗同学向她扔石头。至今我不会赞成这些激进观念，但我佩服学生的大胆理念。打倒新思潮，郑艳芬（金猴）受到不公正待遇。她的同伴对她落井下石。相信她不会热衷于校庆系庆班级聚会。可是你自己当初砸烂校级机关，造北京新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不也是无“政府”主义吗？郑君究竟有什么弥天大罪，犯了天条吗？她说国家干部也有剥削。可是1975年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评资产阶级法权，张春桥鼓动批判按劳付酬商品市场经济，打掉土围子，批评干部级别制度。这位朋友究竟有何错误呢。这思考的一代，勤奋的一代，不该承担任何责任。1975年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不就印证了她的见地吗？多么的“先知先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法权，顾名思义当然就包含剥削的含义啦。我不是翻旧账，也不是重温过时理论，我是说，那时候缺乏宽容。青年勤于思考，又不是坏事。郑君后来成翼城中学临汾一中出色语文教师！

红卫兵同学有才，抓捕郑艳芬的大字报大号标题是“拉开序幕看好戏，蛛丝马迹歼顽敌”。顽敌？中文的刀笔！蛛丝马迹，对同学布下天罗地网，除恶务尽。歼灭一个弱女，勇士呀。当时抓捕的是“变色龙”“小爬虫”。人不被当人。人格尊严荡然无存。罗列罪状之多，用了七八张粉红的大字报纸；笔墨纸砚原也是夺命利器飞刀！才华用到这哈儿了？弱女何辜，遭此诛伐！我们和同窗同学也都有过过节，唇枪舌战，面红耳赤，但从来没想到把人打成反革命，置人于死地而后快。那可是不同性质的矛盾呀。郑君是坚强的女子，从容应对，表面淡定，但她心上的石头该多沉重呀！她没有哀怜的目光，她很坚毅。斗争哲学时代的人必须有坚毅的气质。适者生存，这动物的法则应用于天之骄子人类？派性斗争，面红耳赤，唾沫飞扬，可也；但把人送进地狱，仁人君子所不为也。

郑艳芬后来被分配到了翼城。在她处于逆境的时候，我没有施以援手。她在小河口水库工地劳动，后来到了南梁中学，倒是有书信往还。这可以约略抚慰我的内心愧疚。她在南梁中学住瓦房，出门土路，生土炉子，倒煤灰，擀面条，蒸馒头，三大差别消失了，脑力劳动变体力劳动，劳心者治于人，劳力者治人，把过去的是非颠倒过来，是我们的贡献。北师大还有蒋仁凤也同期抵达翼城。蒋仁芬的父亲是北师大数学系名教授。

李文博说“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无非是鼓吹一种大民主和国家体制改革的新思潮。我相信他一腔热血无处喷洒，以为效命输忠的时刻到了。“弟兄们，给我上”。也不知哪儿来的这股疯劲儿。他是受到“改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改进社会主义制度”思想影响的。不过非常奇怪，当年自己率先造反、目无校长校党委校行政北平市政府的井冈山集团，却把李文博当做无政府主义巴库宁克鲁泡特金批判了起来。有个学生叫蒲寿章，不知怎地就被叫做普鲁东。政教系的老师学问大，把我们弄得丈二和尚。不过从今天来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起义，起初的确是砸烂资产阶级公检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就有些儿无“政府”主义，目无旧政府。“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一点儿也不是谣言。那个和国务院对立的新文革派，就与总理的内阁政府格格不入。我这里没有纠缠于历史，我无意回归动乱岁月。我只是决然要厘清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来观念。如此而已。我不赞成在观念争持中把他人打入地牢。

北师大第三势力中间派名曰《大海航行靠舵手联合编辑部》大联盟，非实体组织，这冗长的名字谁构思的？真有想象力——中文系张梦阳（如今是名流学者）也。1967年冬一次“首长接见”（戚本禹？），造反兵团（人数少，却号称兵团，比井冈山战斗团还壮实）蒲寿公慌不择言说张梦阳是“林杰的乏走狗”，结局很尴尬。蒲寿章本人后被兵团踢出，成为漂零的孤魂野鬼和个体户。不过从做人的道德标准看，执掌大权的革委会大员得意洋洋把“首长接见时”蒲寿章不经意间从嘴角溜达出的一句话“XXX是林杰的乏走狗”在大喇叭里传达，手段就有些齷齪——政治斗争中不为人齿。这个第三势力“大海航行靠舵手联合编辑部”就蔫儿了，从此不能扬帆远航——没有联合，也没有部阵。说实话，井冈山造反兵团赖以起家重出江湖的思想武库是无政府主义。造反兵团类似于当前伊斯兰世界的极端组织——当然还不是恐怖主义。北外红旗对立面造反团、联动、516、北大井红飘、清华414，都是极端组织。当然据今视之，五大领袖以及王关戚不过都是暂时被利用的极端分子。但后期的梁效罗斯鼎黄帅张铁生谢静宜王海容唐闻生也莫不如是。他们提倡“乱，乱，乱到底，乱到人自为战，组自为战，乱到一个人一个战斗队”。平心而论，这是当初为数众多的青年人的信条：“砸烂各级政府”——可实际上不正是如此吗？北师大批判“新思潮派”无政府主义，大批判材料《言论摘编》，纵横对照排列比对，发到每一个人。原来他们还有个欧罗巴祖师爷洋祖宗国际户口！可是批判者们厚兰谭自己又何尝不是无政府主义呢？其实我们谁人不是“跋扈犷”（巴库宁）呢？

为避开学校内斗，郑君后来大串联到了翼城，支持了造反派（然而被斗垮的对立面，其实何尝不是造反派呢）。那时的情形是这样的：北京的大中学生到了外地，立马就成为毛主席派来的人或毛主席身边的人。天哪，我们怎能被说成在他身边呀，其实毛主席也不认得我们。不论在北京是哪一派，到了外地，都个个英姿飒爽煽风点火。人都有虚荣心。人性的弱点呀。郑艳芬的对立面是山西大学的刁立德，回翼城被对立面活活打死。这消息是我弟弟写信说的，显然他是有偏向的。我给舅舅写信用了“嗜血魔王”几个惨痛的字眼！郑君后来成了翼城媳妇。我们是朋友。郑君也到过南常村，支持了造反派联队，那是我哥哥一派，于是有人猜测郑君是我友。我知道，共产风，大跃进，干部得罪了人，群众有气。

当初批判新思潮的扼杀青年创新的大字报，其实是以较保守的学说代替马克思。理科学生李文博在图书馆抱着厚厚的马恩著作阅读，他居然成为无政府主义思潮鼻

祖。给他扣无政府主义帽子的是出于维护刚刚夺权的一派——公社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乃是告诫，井冈山公社的勤务员（当时不叫团长、司令，而另有称呼：勤务员。类似于小小老百姓，就是公仆，仆人，公务员），不应该当官做老爷。现在知道，西欧之马克思更亲近西方理念，而非东方专制集权主义！井冈山公社同巴黎公社不可同日而语，落后分散的农村部落，同都市产业工人不在同一起跑线上，这里是分散愚昧文盲不卫生无法制蛮干武打的地方。按巴黎公社，是要取消货币和资产阶级法权的。但在落后农业国，一个小农国度，只能占山为王，虎头山威虎山。

北师大井冈山的造反履历上应有曲阜讨孔、武汉串连支持三钢（此乃后来7·20陈再道事件先声）。北师大曲阜讨孔，大约是奉关锋、林杰旨意，因为据说1962年祭孔，关锋大骂孔子。我不是孔门的孝子贤孙，但也不会对孔庙孔林大动干戈。我不讨孔，但对于尊孔读经，危难时刻拉出孔子祭奠一番，对于国人出尔反尔毫无操守不讲信义，就有些儿反感。狐死首丘，兔子死时，要遥拜遥祭孔子土丘。最近有人撰文：“拒绝扭曲历史的1962年孔子讨论会”，“牛鬼蛇神跪孔大黑会”。1962年山东曲阜孔子讨论会，称孔子至圣至贤。五四运动拥抱德先生和赛先生，“打倒孔家店”。李大钊称孔子为“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

造大庆展览的反，我们盲从，被指派每晚到国家经委静坐闲坐打盹占领华尔街，反正让你不得安生。惊动戚本禹、原山西都督陶鲁笏、独臂将军余秋里大驾光临，因为农展馆里分明有工业展览，里面有刘公少奇照片。这原不是大事，大事在于1966年10月了，为何还悬挂着——展览馆举办方又没接获通知说不得悬挂刘公像呀！后来结局是搅局者红卫兵造反有理胜出，戚本禹训斥陶鲁笏，陶公唯唯诺诺忙不迭地请罪道歉。陶公去职去势后，1967年春，有一次我乘13路公交车，已经“出无车”的陶公和我挤在一起打成一片。唉，那个造反全是鸡蛋骨头！我与我们山西省都督同行了一次却彼此无语！1967年奉命到武汉串联，住在武汉大学附近，因为觉着自己毛主席派来的，或者是毛主席“身边”的人（哈哈），就不把武汉大学放在眼里。那真是钦差大臣满天飞，指手画脚，不把自个当外人。可是我到现在也记不得支持了哪一派。总之是目空一切。武汉地区主要组织三钢三新，没有武汉大学的份，我就纳闷，你这个名牌大学是怎么当的？金猴奋起千钧棒嘛。

1967年，夏日炎炎似火烧，首都百万大军日日游行，揪刘火线发誓揪出刘少奇，他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是特洛伊木马。不过我们打心眼里并不真的仇视刘少奇（我

和他没冤仇，再说，搞资本主义对我也没害处）。相信比我们更激进更贴近上层的人们未必真的对刘邓陶切齿痛恨，又没有杀父之仇呀。许多人很大程度是觉着政治游戏好玩，较上层人物从中渔利得着好处。北师大旗帜飘扬，在首都红卫兵中是翘楚，也使我们有几分自豪。青年人的热情被绑架。1967年夏一次瓢泼大雨游行，揪刘火线遭遇“雨淋淋”，淅沥沥哗啦啦。我身上出荨麻疹，冻得打哆嗦。北师大革委会谢天德部长接获新华门8341禁军兵弁通知，用摩托车把我“托”（拖）回。谢部长是我们那一代人中自觉自为的阶层，非吾曹阿斗辈稀里糊涂随大潮裹挟而下一日千里。1967年初北师大去武汉串连支左，在我们，是“目盲”“无的”，他却知道谁敌谁友这个根本问题的。

1967年8月王关戚穆欣林杰倒台，北师大大受打击，连续去红旗杂志社游行三天，当然也难以挽狂澜于既倒。看到被毛泽东戏称为女皇的谭厚兰失势失宠，革委内樊、黄、李宣布一举推翻革委会，成立“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7日揪斗井冈山公社领导谭厚兰。全校雪花般声明纷纷，“从即日起退出井冈山”。不料屁股没坐热，中央文革和北京革委会、北京卫戍区三道金牌急急如律令降圣旨。大家如梦初醒。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派员去北师大宣布这一政变无效，并将有关责任人员逮捕。

“九七事件”，樊黄李推翻了革委会，按照游戏规则被捕吃八两窝头。不过若说他们犯了弥天大罪，那也不见得。您推翻各级政府和党委，一月夺权夺印，红色风暴，也是推翻合法正统政权，不是嘛！何以人家推翻你，就遭囹圄之苦！中央文革和北京卫戍区已经荡然，我们今天和空气对话！不过我觉得把几个心血来潮的娃娃抓起来，吓唬吓唬就行了，别来真格的。王颂平等当初井冈山的开山鼻祖为对抗谭厚兰成立井冈山造反兵团，十来个人七八条枪，成为最大反对派，当时就叫派性，和共性对立。不过若依照最高指示，一派掌权不好，两派掌权才好。我觉得一个学校，有异样的声音，有杂音，有干扰，有反对的意见，有人抨击发难唱对台戏（亏得我们的祖宗想出这个妙招），挑毛病，鸡蛋里挑骨头，让你不得安生，就好。社会公正来自于各种利益集团的激荡澎湃掣肘制衡。所以我义无反顾地赞成大联合，赞成给对立面一席之地，而不赞成吞并。每次开会，造反兵团冲击会场，我自然不赞成，但觉得革委会旁边有一个对立面，动不动挑你的刺，叫你谨言慎行，也未尝不是好事。长官威风，鸣锣开道，汉官威仪，回避肃静，现在真的不多见了。这就

是进步。我反对盛气凌人的家天下，不盲目加入在朝派。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这口号很动听，因为全世界无产者都要联合起来——可这哪儿跟哪儿呀！

我从思想上是介于造反兵团和井冈山之间的，取中间派立场。您别以为我是滑头，恰恰相反，这是厚道诚实的表示，因为我们一无所获，不求功利名誉。任何一派消灭另一派，我们都没有好果子吃。我的思想是这样的：希望多元共生相得益彰求同存异，反对一元独断，这就是后现代混杂模糊非驴非马观念，不主张非此即彼你死我活。这个中间派搞过一次“大海航行靠舵手联合编辑部”，谁的主意？这么长的名字！这么能创新！不过也就是个松散联盟，不具实体法人资质。发起人张梦阳先生现在是学术达人。我不赞成逍遥派，表面不选边，但不承诺责任担当。我无意挑动派性。但逍遥派中没有出人才——文科尤其如此。

一九六八年春发生号称“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右倾翻案风——倒谢。北京红卫兵中一派打倒谢富治的标语贴满京城大街。三军造反派所向披靡。谢当然是江青一派的。师大井冈山造反兵团冲锋陷阵。后来杨余傅被当作倒谢主力军的后台逮捕，算平息风波，称“反击右倾翻案风”。林彪讲话，局势得以掌控。参与倒谢的“造反兵团”树倒猢猻散，于是有了打倒王颂平李先华一幕出现。包围工五楼断水断电——至今不知家属工五楼是如何被占领的。北师大原武装部长在革委会武斗动员大会上叫嚷“踏平工五楼，不要啦”，说他心情沉重，中午只吃了五个饺子，引起哄笑。革委副主任做誓师动员演说。攻坚战，云梯是木梯。强力弹弓，劲弩连发。不过强弩之末势不能穿玻璃。小平车当战车。食堂工人杜某打兵团学生当游戏好玩！所以工宣队进驻算解救了兵团。兵团同胞在工五楼挖掘地下水解渴——真不知道怎么这么执着，一腔热血要为真理而斗争，用鲜血和生命捍卫，可真理在什么地方，我们也没摸着门呀。

北师大革委会对同是“井冈山”一个山头且都三忠于四无限的同胞“造反兵团”武装割据的工五楼实行断水断电断粮（没有断气）的三断政策。这个巴黎公社式组织如今成包围公社消灭公社的“梯也尔”政府，掌权者们手中的权力原是由于镇压的呀。晚上工五楼一片漆黑，偶有烛影摇曳，从里面传出悲凉歌声“抬头望见——北斗星，黑夜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你有方向”，哀婉凄切的歌声飘洋过河透迤到了中国南海。据说新北大公社给他们送过馒头榨菜。现在想起来真不知哪来的这股劲。饭厅一位姓杜的大师傅同样执着坚韧，时常对一位兵团“战

士”（当时就这么称呼）拳脚相加。大家实在看不下去，但谁也不敢吱声。工宣队进驻后对他实行隔审查！北师大的三种人后来得到审查。

“揪刘火线”把刘少奇钉在十字架上，高喊“打死他”的人群中就有我的身影。但如果不知省思，至今仍陶醉在花荫中，就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在北师大召开批斗彭德怀余秋里彭真李雪峰大会，全市数万民众扔石头，全民迷狂，愚蠢得可以。那些用巨手在大卡车上使劲摁住彭德怀光秃秃脑袋又不时掰起他的亮晶晶脑门的人，自己后来似乎也坐了土飞机。我想，我们应该知道比我们委屈的大有人在。也许我们自己应该省思才对。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当年文革风云人物，有的在76年四五运动中又积极反对四人帮；然而在这些四五斗士中，又有不少人现在开始怀恋文革岁月风光无限。不断否定昨天，无一定操守，实繁有徒。当年破四旧焚烧书籍，拆毁城墙寺庙，打烂城隍佛祖泥塑木雕的人，如今又以恢弘气度办私塾祭孔子朗读神童诗墓前树碑念祭文，也未可知。

一九六九年国庆节，北师大方队彩旗方阵练正步走，要在天安门前经受检阅。操场上画白线，步距要以白线为准，多少cm，我忘记了。脚要践踏白线。指挥长（原师大宣传部长）徐鸿儒说，不要眼睛死盯地上白线，心中有线而目无白线，画白线是为了在天安门前不画白线。这就是辩证法。大家齐齐哈尔笑，小声嘀咕：“辩证法”（他外号叫辩证法）。那年国庆，旌旗蔽日，反而看不到天安门上首长。大概这个国庆广场狂欢夜，北师大和北大新北大公社比邻，这两校分别是天派和地派的头。北师大和北大两个比邻方队从语录战发展为语录操战：每方边唱语录歌边跳舞，唱“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叠罗汉的师大学生便居高临下手指北大方阵，大家“哈哈”，着实乐了一把。北师大红卫兵组织叫井冈山战斗团，所以唱“井冈山”歌曲就理直气壮。战斗团，所以能战斗。新北大公社，社员们向阳花斗不过战斗团。觉得北航红旗战斗“队”就仿佛是小股武装了。“队”比“团”小。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级别上又低于清华井冈山“兵团”。这才顺理成章。有说谭厚兰是“有保姆的左旅”。蒯大富，大家戏称朋大富。聂元梓，故意说成聂元辛。

【资料】

关于右派分子戴煌的材料（四）

——1962年戴煌的十万言书

新华社党委办公室印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

九、无可奈何中的坚定

十二月初，考察团返京了，留下来的人们的希望与幻想也随之破灭。悲观、惆怅的暗影笼罩着每一个人，虽然每个人的嘴上都在说着：“不灰心，不泄气，争取下一次。”我本人整天难得说一句话，也不和任何人往来。我怕“言多再失”，也怕牵害他人，我只全神贯注于劳动，时而也帮助帮助别人。

那是隆冬腊月，大雪遍野，我们摸黑起床，摸黑回家，营养是入不敷出的。这时的定量是拾柒两，早、午各两个窝窝头（比我们食堂的一两五的稍大些）和一勺萝卜汤；晚上是三小桶（罐头盒做的）照见人影子的稀粥，饭碗一丢就要尿尿，菜几乎是没有的。一个月当中可能吃到几条泥鳅或蛤蟆（注：这就蛤士蟆，红肚皮，冬眠时全身尽是脂肪，是高级补品，北京饭店要数十元一盘，在东北很多）。这是抽人搞的副业，我们也有打猎组，由工副业队鲍队长率领。他们每天吃野鸡野兔，打到大玩意（如狍子等）又要上交场部，因而我们很少吃到额外的什么东西。浮肿、夜盲、晕倒等症此伏彼起，枯干瘦弱是普通现象。晚上，没有灯（开会作记录才有灯），完全靠炭火的微光写信和缝缀破烂，视力受到很大伤害。火炕有一定的限量，主要用于取暖和烤鞋袜（注：每天必烤，不烤则上冻），不能经常化雪水洗脸擦澡。因此，大家的脸是黑的，手是黑的，饭碗也黑得出奇（注：也是每餐必烤，而且从来水洗）。

突击是经常的，深更半夜，我们在大雪没胫的山林中锯树，运料（一段大木头有一百至二百斤重），或装运炭包。开始还有三两野餐——是从白天的口粮中

抽出来的，而不是额外照顾，以后干脆取消掉了。又冷、又饿、又累，精神上又得不到激励与安慰，“右派帽子”可以强迫大家去劳动，但不能阻止大家的情绪消沉下去。每次有人从场部或别的队回来，都说人家有劳有逸，吃得相当好，独有我们例外，这就使得我们在消沉苦闷中又增加了愤懑与疑忌。

精神压抑，生活痛苦，前途渺茫，使得人人心情烦躁，常常为了碰了一下脚，挪动了烤鞋的位置，睡觉翻身时挤了旁边的人，或因其他芝麻大点小事，就会争吵得难解难分，互相帮助的气氛越来越淡薄了，谅解更是少有的，人人都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如果有谁调皮捣蛋，打双份饭，少干点活或偷了别人的东西（主要是吃的），那就成了不可饶恕的罪犯，所有的人都把他们当作发泄怨气的对象，捆打，侮辱，扣饭，绑在门外的大树上受冻，无奇不有。

在这当中，我抱着“独善其身”的态度，我行得端、坐得正，别人不敢欺侮我；但是我也懒得为这些事去打抱不平，触犯那些惹不起的人。我的身体也不好，常常头昏眼花，腰酸腿疼。我内中忧心如焚，外表则是“鞠躬尽瘁”，不管和谁在一起劳动，我都主动拣大断（端）头扛，拣危险事做；有一次扛着小脸盆粗的木头，不幸晕倒，木头压在脖子上，喘不过气来，幸被“锯友”（两人一盘锯，故称锯友）发觉，未酿成惨祸；又一次，往山下拖树头，用力过猛，脸朝下地跌在山坡上，鲜血直流。别人都回家吃饭去了，我独自在雪窝中躺了半天才清醒过来。入窑出炭时，常常烧毁衣服，烫伤手臂，中毒（一氧化碳），晕倒的次数没法计算。成绩是很优良的。我和中国新闻社的杨明同志（注：杨明，广西百色人，原是党内同志，在我们的广东分社和华侨部工作多年。六零年夏天，就被调回北京，随后就摘了帽子。）和拉一盘锯，成了全排的标兵。别的锯往往要一天半或两三天才能备好一窑炭的木料，我们一天一窑，有时还能超过三分之一。过年过节，家里吃好的，我们不完成任务也不收工；到家时，好吃的都没有了，我们也无愠色与怨言。我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像过去的那种豪迈和政治热情，而是在遭受连连打击下的无可奈何的自救行动。除此而外，我别无道路可走。向（原文如此）我的经历和当时的物质条件，我是不应该这样做的；但是在政治上受到曲解之际，如果在生活上和劳动上再不能自立，那我将会成为人人可践踏的可怜虫了。当时，这种自甘沉沦的人是很多的，他们是逃避了一些艰险苦累，而精神上 and 人格上的损失则更大。

经过这种迫不得已的将近两个月的努力，领导上对我的看法改变了。隋指导员不再批评我，而是屡屡表扬我。他常对大家说：“当时相信大家会改变的。戴煌同志就是个明显的例子。他这两个月来十分努力，进步很大。大家应该向他学习。”

我终于没有因为惨重的打击而自己倒下去。但是我知道“路必有弯，事必多变”，好景不会长久。我不能够在忍辱含羞的气氛中平静无事地生活下去。我们对这个小天地中的黑暗、愚昧、欺诈、冷酷、堕落、混乱的现象忍无可忍，我怕得罪人，尤其是那些班排长；而我的良心又不可能使我永远沉默。

十、与盛桂林的斗争及第四次被否定

六零年春节除夕，我为全排包蒸饺，熬了一个通宵。初一上午正在蒙头大睡，一班副班长盛桂林（注：盛桂林，原一机部某单位团支部书记。在北大荒有血债，却被摘了帽子，下面将谈到。此人现在山西，地址不详）叫醒我，说队部指定由他负责，率领杨川林（二班）、徐月清（注：徐月清，一机部的俄文翻译。他属三班）和我（四班）到五分厂的火车站去整理炭包。因为我们的炭包质量很不好，总厂转运部门不接受，这就意味着不给钱；云山就发不下工资，故问题很严重。

此去，我是既高兴，又扫兴的。领导上派我到外地工作，说明对我有了一定程度的信任，同时我也可以出外见见世面，一扫“深山野人”之闭塞；遗憾的是和这些人远走共事，肯定不会有好结果。盛桂林和徐月清都在生产三队和基建大队呆过，他们是好朋友，他们善于欺上压下，狼狈为奸。在领导人面前，花言巧语；背着领导和大众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平常，我对这种人莫说张嘴说话，连看也不看一眼的。举例说，过去在三队，突击除草时，领导上明明要求两点半起床，他们偏偏要在一点来钟就把大家赶下地，表示自己是“更好地执行了任务”和“坚决带领群众力争上游”的。下地后，天还墨黑，莫说动锄，连走两步也会伤苗。大家只好坐下来抽烟，坐等天亮。早饭后，领导人来了，问他们几时来的，他们大言不惭地回答：“一点来钟。”领导遂夸赞他们“积极”和“有办法”。他们就是这样取得领导的喜爱的。现在要和他们在一道，我很勉强。

在五分厂车站工作了十天，果然搞得十分不愉快，我有一定的责任。首先，

对他们有一种格格不入的“孺子不可教”的情绪；其次，因为有病等等，对自己要求不严，迁就了自己的不健康的一面。一到那里，我就从头到脚地浮肿起来，五分场门诊部的韩主任亲自给我诊断，说问题不简单，吃药也只是暂时减轻些痛苦，我增加了思想负担。再加上手脚都肿得不能自如地伸屈，动作更加笨拙起来，工作量少了些。在北大荒的那种普遍缺少同情与谅解的气氛中，别人为此而对我挑挑剔剔，是不奇怪的，这是我自己要负责的第一点事实。

第二点事实是，因为女朋友陈敏凡对我情意缠绵，也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我们到车站的第二天，总场各队由别处演出归来，路过这里休息了两天，陈敏凡也在里面。她看我脏得太不像话，特地向招待所的主人讨了点热水（我们是搞不到的），逼着我和杨川林洗一洗。她不认识盛桂林和徐月清，所以没叫；杨川林和我们很熟，也知道我们的关系，所以简单地洗了洗，很快就走了。这样只留下我一个人，陈敏凡帮助我洗擦得干干净净——因为我肿得厉害，举手洗脖子都不方便，因而走得最晚。当天晚上，按照盛桂林的说法，我们本应去“突击”，就是到车站溜一转，花半个来小时，把几十个破烂了的空包归并归并，以后就好向家里汇报：我们在外也突击和在家一样（其实差远了）。陈敏凡留我洗脸，他们是同意的，只是叫“快点赶上”。结果去迟了，他们说我藉故拖延，不想“突击”。

第二天晚上，五分场食堂放电影，陈敏凡要我看，盛等也想看，因为我们在云山难得看到的。结果票不够，只有我和陈敏凡以及文工队的一些同志去了。盛、徐对我很不满，杨川林也翻脸，说陈敏凡故意甩脱他。以后他们说我因为看电影而阻挠了大家去“突击”。

当时我未能虚心地检查自己，认为我的事情应该被原谅；即使不能原谅，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而他们却故意地扩大歪曲，无事生非。于是对他们许多错误行为也就缺乏容忍和耐心说服的态度，使成见越来越深。虽然，就许多具体的分歧来说，我是站在正确方面的。

他们有哪些错误行为呢？第一，老毛病：弄虚作假，阳奉阴违，像上面提到的那种“突击”、“加班”，完全是一种欺骗。某天晚上，他又带领我们去突击，偷车站菜窖子里的茅草，做封包之用。我不能大声抗拒，怕人家听见，事后对他进行了批评。清理炭包时，我发现里面有很多炭头——这是没有烧透的次品，烤火时，炭如冒烟，就是这种东西在捣蛋，我主张把它们都挑出去，转运站也是这

样要求的（注：炭质不纯，买主会不要：如果买主糊里糊涂地收下了，也无异于欺骗人家，这是第一；第二，把次品和废品运来运去，等于直接浪费国家的运输力）。可是他们说这会影晌速度，完不成任务，同时炭产量也会因此而降低。在向队部写保证书时，盛桂林和徐月清提出每天每人修理六十包，我不同意，因为根据实践，每天只能修理二十到三十包，而其质量一般：从家里到车站不到百里，只经一次手（上车、下车），就被撞得破破烂烂，返工不算，散失掉的木炭再也收不回来。经这次修理后，要装运到北京、上海等地，不知要经过多少次手，如果再马马虎虎，损失将更大。因此我提出质量第一，保证炭包被运到天涯海角，也不会破烂不堪，这样，定额暂以三十包为宜；以后如能多搞则更好，避免说空话。杨川林支持我的意见，但盛、徐认为我们“右倾保守”。他们说，谁能保证路上不出事？只要转运站认可就行。我坚决未同意。在执行中我按我的主张做去，数量事比他们少了点，他们遂说我不执行“决议”。可是，他们粗制滥造也没有达到定额，只好恬不知耻地说：“我们已尽了最大的努力，贯彻了保证书的精神。”

第二，假公济私，仗势欺人。十天当中，盛桂林先后回去三次，每次耽搁一天半到两天，实际上他没干什么事。在外工作，请示报告是必要的，但不必亲自回去，只要请司机带张条子就行了。可是他一定要来回逛，游手好闲。不仅如此，他每次由家里回来，不是先到工地，而是先到小馆子里吃喝一顿，然后到招待所去躺一会，再到商店中去遛遛，最后才光临工地。这时也日暮寒风起，快回家吃晚饭了。晚饭后，他的“精神”来了，硬要我们在劳累一天之后跟他去“突击”。以他的这种真面目对照他对别人的一本正经的虚伪作风以及在工作方面的虚求其表，敷衍塞责的举动，我是十分鄙视他的，杨川林也敌视他。我们常常发生争执。可是，就凭他的三寸不烂之舌，队部居然完全听信于他。隋指导员给我们写了一封信，要我们“尊重”和“服从”盛桂林，因为他代表队部。的确，我没有被这封信束缚住，我觉得，如果事事都服从这样的“领导”，无异于犯罪。当时我负责生活，经多次交涉，五分场食堂才准予我们搭伙。盛、徐不干，借口路远，耽误工作，而要整天吃小馆子。从他们的各方面情况来看，他们远非是“热爱”工作的人，实际上是想解馋吃个痛快。我和杨川林当时都骨瘦如柴，谁也想多吃点油和肉，但我们都是二类处分，钱很少，因而坚决反对在外面吃。他们没办法，就说我不服从统一指挥，不为工作着想，是个人主义。最后几天，我们不得不离

开大食堂，跟他们去吃小馆子，赔了很多钱。

第三，为一己私利，挑拨领导关系。在车站上，云山供销组的李（？）组长带着一批人转运拨给云山的物资。人力不足时，他常常叫我们协助卸火车或装汽车，影响了我们本身的工作。盛桂林对他却讨好卖情，惟命是听，并主动争取任务：“有啥事，就听（给）我们干吧，都是一家人。”可是每次回烧炭队汇报工作，鲍队长嫌我们任务完成得不快时，他又怪李组长抓我们的差，气得鲍队长暴跳如雷。以后在云山全场的干部大会上，鲍、李二人大吵一顿。

盛桂林每次回去，都由他的心腹徐月清代理组长职务。徐和他一模一样，对这种人，我是恨之入骨。我认为，如果是在旧社会，他们可以干出任何一种坏事来。最后，要离开五分场时，盛桂林受队部委托，去宝东医院探望伤员病号，本来当天就可返回，他竟向我领了三天的粮票，借口说要到虎林（县城）去有事，实际上是去散散心。可是他却不让我们在云山下车，要我们一下就回到山里。而我们在云山恰恰就有正事要办，比如取补好了的衣服等等。我看他对人对己一贯是这种两面派，极为愤怒，大骂他无耻。我说：“你越是不让我们停留，我非停留不可！你叫我们只停一小时，我非要停两小时以上。”

回队后，他和徐月清把我们在外面的情况，按照他们的意图向队部作了汇报。杨川林对他们本有对立情绪，但是当隋指导员向他打听我的情况时，他也顺水推舟，以求脱身。比如，我们在五分场食堂代饭时，往往是八个人一桌，其中有些医生和女同志，她们从未领受过饥饿之苦，一人一个的窝窝头都吃不了，而喜欢吃稀饭。她们看我的肚子大，就把她们的窝头给了我们。也有没主动给的，只是把半拉的窝窝头搁在桌上，等他们走了，我们再拿起来吃。一直生活在北京的人们在看到这段描述时，也许有人会暗自讥笑我们没有人格。但是在那样情况下很多人已饿得重病在身、濒于死亡的情况下，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同时是值得同情的。我们虽饿，但未偷未抢。饱汉们把厌于下咽的东西扔在桌上，我们这些饿汉把它们捡了起来，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我们四个人都这样做过。徐月清不仅在自己的桌上捡，还扫遍过所有的桌子。可是，杨川林——这个过去及以后都得到过我的许多帮助的所谓朋友——居然会向隋指导员这样说：“老戴到处捡人家的碎窝头吃，简直有失军人风度！”因为我一直穿着旧军服。

我知道他们在捣我的鬼，遂在他们之后向隋指导员汇报了在外工作的情况，

主要是说明我们之间的矛盾点以及各方面应负的责任。隋左右不定，未置可否。

事也凑巧，焦勇夫的妻子远道来访（注），¹当时只有我和杨川林在家。焦永夫为人虽坏，但是对她，我们还是觉得应该尊重的。遂待之以礼。她问长问短，尤其关怀我们的生活、劳动营养、健康等等，我均照实回答。过了几天，她走了。当晚，全队开会，隋指导员顺便批评了我，说我在家里很好，一到外面就变了样，不好好劳动，反对高定额，可是对看电影和捡人家的碎窝头却很积极，对领导也极不尊重。焦勇夫同志的爱人来了以后，他又向她乱谈北大荒的情况，使人家感到很难过，很恐怖。所谈虽是真实的，但对不能理解的人来说，影响极不好。

对这种说法我是不能赞同的。一散会，我就找指导员申诉。他同意把焦勇夫、徐、杨等人找来核对事实，澄清是非。这时我才知道他们把许多事情都给歪曲或夸大了；即使事实是对的，结论也不对头。我和他们争辩了很久，但他们人多势大，矛盾始终未能统一。他们做的记录和整理的材料也未给我看。

这样我在高恒事件之后，经过舍死忘生般的努力，一下子被否定掉了。不仅如此，我对烧炭工作又发表了许多不同的意见，又被扣上继续反党的帽子，真是祸不单行。

工作方面的意见分歧是：

第一，我不同意乱伐树。开始时领导上说得很好，诸如山林是国家财富，要精心爱护，烧炭只能利用过去伐木时留下的树头、树枝、树桩，必要时，可以伐些不成材的杂树等等。一句话，利用废物为农场创造财富。可是，指标又定得太高，要求我们一百多人在一个冬季中烧炭三千吨，解决全场一千六百多名职工的全年工资（约六七十万元）。鲍队长甚至这样说：“农场只管要钱。如果你们能拿出这笔钱来，就算完成了任务，整个冬天都可以在家烤火睡大觉。谁觉得闷得慌，可以跟我们去打猎”（注）²。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收拾残枝朽木，速度慢，质量差，根本完不成任务；到头来，只好叫大家见树就伐，怎么快怎么好。因此，无数的制造武器用的黄菠萝、制造地板木用的水曲柳、优良家具材料赤桦、白桦、山核桃以及又高又直的建筑材料，无一幸免。许多山头不是被推了光头，就是被砍得乱七八糟，完全违背了烧炭的原则——废物利用。本来这些珍贵的木

¹ 她是共产党员，原在北京图书馆工作，后调到哈尔滨新华书店。当时她就是从哈尔滨来的。六〇年冬，焦勇夫被摘掉帽子留在 850 总厂工作，她也被调到农场党委办公室工作。

² 此人是蒙古族，当过骑兵连长，枪法极准。

材的价格就远远超过木炭成品的价格，烧出的炭既轻又杂，毫不耐烧；杂会迸发火花，真是双倍的“得不偿失”！而农场领导却一点儿也不心疼。他们认为山林很快就要上交给国家，在上交之前，好歹捞一把。

第二，我反对那些并非窍门的“窍门”。尽管乱伐林木，加快了备料的速度，可是你不能叫他们立即变成炭，于是就提出缩短炭窑周转期的口号。本来从点火到封窑至少要三天，现在改成一天到一天半，放大火，把窑内的料首先毁灭了一半，这就减少了产量；从封窑到出炭，至少要四天到六天，现在改成两天到三天，以致很多木头没烧透、没闷透，这又降低了质量。如是，周转期是加快了，得失相抵，不上算。可是问题不仅如此。闷炭的时间缩短了，炭并不能按照人们的主观愿望迅速地停止燃烧与冷却；窑门一打开，氧气冲入，余火立即旺盛起来。这时，领导上一律迅速地叫抢（特别严重者例外），否则就给你扣上“右倾”的帽子。于是大家就是窑内与火焰搏斗，与毒气搏斗，每出一次窑，几乎都有人中毒晕倒。本来规定出窑时只派两个人，一上一下地轮换着。由于抢火或中毒，后增至四人、六人，有一次支援到九个人，全部被毒倒。这真可谓赴汤蹈火！木炭本来就容易碎，经过这一抢一踏，不是烧毁了，也被踏碎了，完整者无几。这是名符其实的“人财两空”的做法，是反科学的，害死人的！！

第三，我反对谎报成绩。原来规定的一窑炭——大约一立方为一吨，稍有常识的人就会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水的密度大，单位重量重，实实在在的一立方也不过是一吨重。而一立方木炭，其中的空隙很多很大，单位重量又很轻，绝不可能超过一千斤。可是人们照样向场部报为一吨。后来采用了“赴汤蹈火”法，每窑炭去了碎末，剩下二三百斤就算好的了，然而依旧上报为一吨。

第四，我反对不精打细算的经营管理办法。开始运炭时，我建议尽可能地把车道修到每一个窑边或者修爬犁支道，以一劳永逸，既加快了运输速度，也可节约人力。可是队部认为：场部只准用工烧炭运炭，而不能抽人修路。于是，我们只得动用大批的人力，以最原始的方式，把分散在四面八方的窑点上的炭包，一包一包地背到公路边，再装上卡车。这种人力的耗费，比起修路的人工不知要多多少倍。由于在这方面用人过多，迫使许多窑提前停止生产，严重地影响炭产量的增长。作为诚实的劳动者，眼看自己费了很大的力气，而不能为社会创造出相应的财富，是十分痛心气愤的。

对于这些意见，我不知提过多少次。在班里提，向排里提，和队领导谈话时也屡屡提及，一概置之不理。到头来，给了我一顶“自作聪明”和“反对领导”的帽子。有一天，850总场副业科的负责人到工地视察，走到我和杨明同志拉锯的地方，他批评我们整个烧炭队把山林搞得乱七八糟，糟蹋了无数有用之材。我想上去向他申述一切，杨明把我劝止了。他说：“你说有什么用？你有理，他也许会向你点点头；而他一走，你可受不了！”

直到烧炭工作快结束时，场部才发觉我们根本没有烧出一千五百吨炭（上报数），而只是三百吨，并且有一多半上未运出去。甭说全年工资了，连一个月的工资也不够。在农场党委扩大会上，隋指导员做了检讨，并被撤职了。紧接着又把右派分子中的不负责任、谎报成绩的一些人整了一顿。一个叫杨治安的副排长也被撤了职，几乎被绑起来送走。

平心静气地说一句话，隋指导员的为人还是不错的，尽管他对我有误解，好几次批评我和否定我。首先他没有打人骂人，说话是讲理的，虽然他所依据的事实有时是片面的，论点是不够确切的。其次，对我们生活之艰苦、劳动之紧张是深表同情的。他多方设法为我们去买饼干、代乳粉等物。问其心，他并不主张我们拼死拼活地干。他亲自对我说过：“人心都是肉长的。谁无父母，谁无妻儿，谁不希望劳动时愉快的，生活是正常的？每当你们披风裹雪，在黑夜中苦战的时候，我就为你们的健康担心。老实说，晚上三小勺稀粥，两泡尿就光了。我们在家坐在火炕边上，还饥肠辘辘，莫说你们早起贪黑地劳累了。可是任务压在头上，不抓紧又不行啊！”第三，他是真心希望我们进步，希望我们早入解决问题与家人团聚。他快离开烧炭队时和我又长谈了一次。他说：“直到现在，我才了解了你。可惜我现在无能为力了。过去因为你说了某一句话，做了某一件事，我就听信别人的传言，全部否定了你，是亏心的。实际上，你的很多做法和很多观点是正确的。只希望你做到这一点：对自己要克制再克制，不要得理不饶人。不仅要劳动好，还要搞好上下左右的关系。切记，切记！”第四，在场部追究责任时，他把全部责任都拉到自己头上。这种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值得惋惜的是：他还比较年轻，过去是空军部队的中尉机要秘书，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他不懂得深入群众和深入实际。在四个多月中，我就没有看见他和鲍队长到窑上去看过几次。他们连哪些窑在哪些地方都不知道。除非开晚会，他们

很少和大家在一起闲聊，而专门依靠班排长的汇报。如此，生产与思想工作都做不好是不奇怪的。当然，我这只是从表面现象来分析的。如再深入一步说：他们内心中也很苦闷，他们对农场的思想领导和经营管理也很有意见。他们对农场的前途缺乏信心，不安心以农场为家，因而缺乏踏实、苦干的劲头。

十一、在浪头上挣扎着，不甘心沉没

六〇年三月烧炭的行当结束了。焦勇夫的一排人被拨归电锯厂领导，搞木材运输。我和另外几个人被抽了出来，留在工副业队。这时工副业队只有一个排，驻在老电锯（原文如此——编者）。排长叫王连一。他原是首都公安师的文化教员，中尉，已在五九年底摘了帽子。他改任队部的统计后，推荐盛桂林当排长。他们在三队时就是好朋友。队部指导员叫刘恩，少尉，原在基建队任副指导员。

我们的任务是刨木板（建筑或制作家具用的），给农场卖钱，解决工资困难。

这时，大家的情绪更消沉了。整天拉大锯（十二个小时），定量只有四十二斤，后来又减少到卅六斤，副食几乎没有。有些人饿得常常走不动路。雪地上已出现“苦海无边，何日是岸”的悲观绝望的字句。有一位青年画家，叫王统纲？

（原文如此——编者）的，老婆和他离了婚，哀伤到极点。他说：“讲错了几句话，就失去了自由、幸福和人的尊严，还要这条命干什么？！以后如果有幸再娶到老婆生了孩子，我留给他们的教训只有一条：宁可男盗女娼，也不要说错一句话！”因此，有一阵子，他拼了命地苦干，故意往要倒下来的大树底下跑。

我瘦弱得连几十斤重的木头也扛不动了，拉血、头晕是经常的，腰酸和腿痛日甚一日。家庭的困苦、个人的安危、人民生活之日益窘困，不断地苦恼着我。我外表沉默，内心忧愁而急躁。我曾对人说过：“战犯和刑事犯还能得到特赦，许多被判刑五年的罪犯只劳动一年多到两年，也被放出去了。而我们却迟迟不能恢复自由（注）¹。另外就拿劳动教养的人来说，按照国家劳动教养法，最多也不过两年，而我们已经两年了，还茫茫无归期。不知何故？！”

当时，我对党是有怀疑的。我以为国家困难重重，对我们的政策也随之而变了。当然我这是指劳动时间之长短而言的。而不是说党对我们的态度（一视同仁）

¹ “大跃进”后，农场对我们采取了过左的、歧视的政策，我们都认为我们的生活是不自由的。

有何变化。我知道：农场对我们的这种无异于侮辱与折磨的做法，是违背了党的初衷的。可是，我也知道一时无法改变这种局面。漂泊在这种惊涛骇浪之中，被迫也罢，不愉快也罢，如要不沉入海底，就要拼命挣扎。尽管思想上疙瘩累累，也不管前途如何，劳动好总比劳动坏强得多。“人生在世，不能白吃饭”的思想也支持着我。我和冀虎虎（注）¹一把锯，几乎每天都名列前茅；每次突击比赛，我们都是第一。我们先后得了“火箭锯手”和“标兵锯手”的称号，多次上过光荣榜并获得物质奖励。

这些好的表现，大概不会在我的“改造档案”中留下痕迹。相反，一切有失检点的言行则可能被歪曲、夸大并以最恶劣、最反动的结论载入我的历史材料中。有这样的事实可以证明：

冀虎虎在转业时得到一笔转业费，加上平时的积蓄约一千多元，于五八年秋存入云山水库临时代办所。五九年秋上山烧炭时，存单及手表和一部分现款被窃。这时，水库代办所已撤销，扫尾业务由虎林县银行经管。冀虎虎立即请农场领导代为挂失，并准备取款（已一年到期）。队领导及云山派出所只准挂失而不让取款。到六〇年春，冀虎虎有先后请求数次，答复如旧，不言原因。冀虎虎怀疑农场领导可能从中作弊（农场经济困难，常常不让大家到银行提款）。我们也常常碰到这种现象：刚到一个队，这个队突然大兴渔猎，要我们捐钱借款，购办渔网、鱼钩、猎枪和套兽铁丝等物，美其名曰改善大家的生活或盈利时偿还。然而我们调动频繁，等于“白送”。我们在打草队时，利用伙食结余款项买了八口小猪，养肥后也都被充公了。我们利用业余时间制作的扁担、锹把等工具往往也被生产队扣下。这一切行为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很多领导人把我们当做“小财神”。冀虎虎为此而生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也跟着鸣不平。有一天拉锯时，他请我再给他写一份报告，要求取款，如果领导上再不准而不说明原因，他就准备旷工三天，亲自到虎林银行去一趟，以后随领导处罚或扣工资。我说：“好，我支持你。”这是一句气愤话。影响是不好的，但是冀虎虎如果真的要溜走，我也不会放他。这句话被我的“仇人”辛若平（注）²听到了，向排长王连一报告说，我鼓动冀虎虎旷工，反对领导，怀疑领导。王连一和我也有矛盾，遂依此上报。

¹ 冀虎虎，山西人，原在部队中做副指导员，中尉衔。转业到北大荒后，因讲怪话、发牢骚，被划为右派分子。六一年冬被摘掉帽子，现仍在 850 农场劳动。

² 他利用高恒事件做了排长以后，由于作威作福和懒惰贪食，被降为班长、副班长以致班员，最后因偷别人的代乳粉而信誉扫地，不得不开小差。但又顾虑重重，半途而返。此人现在太原。

当时我们也是奉命大搞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很多人乱设计、乱施工，糟蹋了很多人力物力。我说：我们刚刚学习刨木板，知识经验均有限，最好派人到密山等地制版厂去参观取经，在人家的基础上再做进一步地钻研探索，免得费时费力，走弯路。他们说我这“拖后腿”和“右倾保守”，反对别人“敢想敢干”和“大胆创造”。我认为他们的这种态度是“假积极”，为了“风格”而“风格”（共产主义风格），至少也是愚昧可笑的。我遂向“革新园地”写了一篇稿子，阐明我的观点。有个姓郭的（王连一的心腹，一贯观颜察色，逢迎领导）竟写了一首诗，指名骂我是反对革新、反对进步的“鬼”。我不反对别人公开骂我，因为这是人家的自由。但我反对这种歪曲事实的做法。我遂向王连一提出责问。他无言以对，但又不收回稿件。后来因为场部文工队来参观和演出，我要求王连一处理此事，避免以讹传讹，他也只是将指名道姓的地方涂去了事。

这一段的情况说明：我的处境越来越不好，可以说是危机四伏。上至农场党组织，下至队领导和我们内部的班、排长，都对我怀有戒心和恶意。和我平辈的一些不善之徒也想利用这种形势，为他们自己窃谋政治上的利益。在他们认为，只要向领导上多说几句有关我的坏话，哪怕是添油加醋的，只要公开坑我一下或骂我一句，哪怕只是极端无理的，领导上就会认为他们是“接近领导”和“向左转”。我，苦闷烦恼，悲观失望，但又不甘心自此被人踩在脚下。一方面我继续积极劳动，待人公正；另一方面也决不容许别人无理无故地加害于我。我要活下去，而且要活得像个人样。我不想欺别人，也不让别人欺我。不管别人将会如何地打击我，对一切不仁不义和错误的东西，我照样要勇于进行斗争。尤里乌斯·伏契克在《绞索架下的报告》中说得很对：“生活历史没有旁观者的！”德国的大诗人歌德也说过：真正的人“所要求的最先和最后的条件都是对真理的热爱”。我们的党，也一直是教育自己的成员要有这种品德的。但是，在北大荒，在我们当时所处的这个狭小的天地里，我们看不到党给那些勇于干预生活的热爱真理的人们有何支持与鼓舞的力量。相反，党的威严和信誉被人们用来助长虚伪和冷酷之风无止境地发展。个人失去了党的领导与支持，也只能独自进行挣扎了。痛苦异常！¹

……（此处从原稿第105页直接转到第108页。中间两页阙如。整理者注）

¹ 此处之后，原稿第106至第107页阙如。（整理者注）

同意我的看法，而在正式会议上，却只敢说我的坏，不敢说我的好。那些假“积极”分子，更利用刘恩和盛桂林对我的敌视态度，常常无事生非地挑剔和诬害我。

在这种气氛中生活，要极大的坚毅力。你只能“老老实实”地听人摆布，不能有思想，不能有尊严，更不能抱打不平，仗义执言。回想在离开北京的时候，戴邦同志曾经告诫过我两件事：第一件事：要警惕暗藏特务分子对我进行“反间”，因为在我的问题公开宣传之后，敌人对我很注意；第二、要百般地克制自己，再也不要一时冲动，勇于为他人代言。在这当中有时也会受敌人的利用的。

对这一好心的劝告，我是牢记在心的。可惜的是，我对第一类的事一次也没碰到过。如果碰到，倒是我的万幸了。那时倒可以来明我是个革命者还是个叛徒。而第二类的事，却数不胜数。不论对工作、对生活、对人事关系，都有很多问题迫使我不能不讲。从我这接连五次被否定的事实中也可看出，真正属于我个人利益的事有多少？我觉得在这些事实面前保持沉默，也就是说，做一个生活的旁观者是十分可耻的，对人对事、对社会是不负责任的。当然，我的修养很差，少于考虑言行的效果，这是我的悲剧。但是，能因此说全面地否定我，把我说成是个顽固不化、坚持反党立场的大坏蛋么？我认为不应当这样说。另有很多人也不是这样看。但是，对于刘恩、朱麻子这类的领导人，以至于像云山这样的党组织，是不可把这些道理说清楚的。

十三¹、死亡现象的开始

五月十五日，场部决定我们到“小云山”第四队去拖田间排水网。由原驻地到小云山，只须走七八里地。但领导上不是要我们直接去，而是要我们拐到云山去再干一天活，然后利用夜晚的所谓“非工作时间”再转移——好像只有劳动时才需要付出热量，而负重远行则是休息。这样，我们这一天在“非工作时间”里背着大行李走十多里地。试问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可以用来休息？！在农场领导这看来，此法绝妙：不管调动如何频繁，从来也不耽误干活。可以说，这是云山畜牧场在两年当中专门对付我们这批人的“传统”做法。如果坐在办公室，也许会认为这是一种高尚的举动，正如我们加班加点、开个夜车一样；但是，在那种饥

¹ 原手稿第106至107页阙如。无法确认编号“十二”是否在缺页中，故按原稿编号排序。

寒劳累、瘦骨嶙峋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无异于叫大家更快地向黄泉走去。

晨二时，我们挑着行李和工具走了十五六里，赶到云山，任务是挑沙子铺路。指导员刘恩说：早修完早转移，早转移早休息。这种类似的话，我们听过千百遍，没有一次是兑现的。领导上交下来的任务，没有一次会让你早早干完的。沙石在远远的小山上，来回一趟四里来地。我们从早挑到中午，从中午又挑到下午五点。中午饭后也没有休息——因为要早干完早休息。任务完成后，又立刻挑起行李和工具，向十六七里以外的小云山进发。走了不久，就下起雨来了，我们在黑暗中淋着雨，通过泥泞淤陷的草原。大家又饿又累，可又不愿休息，因为只有到那里，才有晚饭吃。夜十二点左右，人们才陆续到齐。

为革命而忍饥受苦、奋斗牺牲，本是悲壮而昂扬的行动；体壮力强、衣食无忧之际，利用一些机会到郊外去跋涉游泳，虽然劳累，倒也是紧张愉快的。但是此时此地则完全是另一种味道了。战争中的艰苦，有时比这更甚，但那时周期性的苦了一阵子之后，可以整体改善；而我们成年累月均如此，情况就显得特别了。再说，过去的艰苦是迫不得已，敌人常常迫使我们无法喘息从容；而我们当时处境之艰险，则完全是自己人给制造成的，简直有苦更难说。

早上临出发时，就发现一个叫佟霭成的不见了。他原是一机部子弟小学的校长，到东北后，妻子和他离婚了，留下来几个孩子。他思前想后，悲伤得很，早在山上剖木板时，就曾自杀过一次，未遂，被撤去副班长职务。这次又不见了，排长盛桂林和副班长孙汝飞进林中寻找，找了半天未找到人，反而采了一大捆野菜和山韭菜回来。我怀疑他们是否真地去找人了。老佟不见了的消息震动了每一个人的心，在共同修路的其他单位的右派中也立即传开了。

临向小云山进发时，基建队右派中的一个班长陈其勇偷偷地向我说：“在你们排里，还能坚持干活的人不多。尤其是你、赵琪和石铁生三个人身体最瘦弱，脸色最难看。可不要倒下去啊！在这种地方是没有人同情与关怀的。想关怀的人没有力量，有力量的人有不想关怀。望自重！”

经他这一说，我更加担心了。我本人如何，自己当然无法看得到；然而别人，尤其是赵琪，我是观察得比较细致的。他原是交通部的干部，年约四十，脸上有几颗麻子。他原来也是党内同志，他犯的是什么错误，我不大清楚。只知道他的妻子也离开他了。早在半年前，他就不能干活，然而班排长们说他落后，经常强

迫他“苦战”。这一天，我见他一直面无血色，耷拉着脑袋，有气无力地挑着担子，沙子漏光了，他也不知道，到了需要倒沙子的地方，把空簸箕抖一抖，刘恩与盛桂林有目共睹了。他们并不是一叶知秋，叫他休息，而是骂他“没有干劲”，“装疯卖傻”。我根据自己的情况判断：“他快不行了”。临出发时，我想建议叫他留下来，明天再去。我们班内的罗相成（注）¹叫我不要说。他说：“难道你头上的‘拉拢’和‘假同情’的帽子还少吗？”结果，这个人在半路上死去了。

四队尹队长（注）²和我们的指导员刘恩假惺惺地惋惜了一番。接着，他们不是从根本方面汲取教训，反而说我们日常缺乏相互的关怀与体贴，情况发生时又抢救不力。为安定人心，他们布置大家讨论事件的根源。在讨论时，有些人彷徨盼顾，欲言又止；有些人则怪抢救者迟缓乏力，贻误时机，甚至有人骂起赵琪“自己找死”。而对于领导者，则“丽唱仍添锦上花”，说他们对我们的关怀与体贴是如何地无微不至。听来令人作呕。

我觉得根本的原因是，农场领导者一贯对我们采取歧视和冷漠的态度。赵琪之死，绝非出于偶然。关怀我们的领导人不是没有，可惜太少，其主要作用、占据统治地位时间最长的则是与此相反的人。否则，我们这些人绝不可能被搞到“风烛残年”的地步，在小雨和泥泞中即倒放死于途。发现赵琪倒卧途中的情况后，又不叫医生跟随抢救者前往急救；对抢救者畏难而退的现象，也未予以有力的制止。其它原因都是次要的。对于这样的问题，我讲不讲，是经过斗争的。我觉得，动之于衷，出之于口，比起那些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为人只说三分话，未肯抛却一片心”的人，要胜百倍。我知道，我一旦直言而出，势必会使当权的人们感到逆耳，但是比起混淆是非的顺耳之言，不是有益得多吗？我也想到，我自己有着“出口为快”的老毛病，这一次会不会也是只见到一点情况，不分青红皂白，就胡说八道、乱抡板斧？我想来想去，觉得不是。于是我就老实地把心里话说了出来。并且建议：应该一叶知秋，汲取教训，提出有效的措施，改善我们的处境。有关的人员应该检讨和接受处分。

第二天，刘恩不得不公开承认，在这一次具体事件中，领导上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话锋一转，就把主要责任推给大家和死者本人，并且坚决不承认农场长时期以来违背过党的政策。他说：“有人想乘机煽动大家对支部领导不满，对整

¹ 罗相成，清华毕业生，高教部留学生司的干部。六〇年十月底惨然死去。家里只有老母一人。

² 尹队长，即五八年冬大兴水利时的连长。对我们态度很坏。

个农场领导不满，是妄想。党是正确的，农场党组织是一贯忠实地执行了党中央的政策。即使我们有一定的责任，也只能向上检讨而不能在这里检查”。至于教训，一字不提。以后的事实也证明：一切依旧不变，而且变本加厉。这是“拒听逆耳忠言，厌闻责过之声”的典型事例。

过了几天，接原驻地拖拉机手们的报告：发现了佟霭成的尸体。他用一根裤腰带把自己吊在林边的一棵小树上。而排长盛桂林等人当天竟未“找到”。

我们这些人到云山以后，只有在冬季伐木中，被砸死过几个人，但影响不大。因为大家都能够认识到生产与战争一样，死人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像赵琪这样被活活地折磨死，以及想佟霭成这样的绝望至狂而自寻短见的死，这是第一次。而领导上的态度又是若无其事，其影响之恶劣是不难想象的。

我所说“一切如故、变本加厉”，绝非耸人听闻的夸大之词。这时，我们的定量只剩下一斤，而工作量毫未见少，每人每天的定额是挖一段长达五十公尺的小沟，共二十立方土。同时阴雨连绵，我们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几乎一直穿着湿衣服，甚至有人故意穿着湿衣服睡觉，为了第二天能穿着被体温焐干的衣服上工。在这样的情况下，领导上不让我们休息整顿，并且照样很晚才收工，烤衣服的时间都很少有。在此情况下，莫说大家精疲力乏，无能完成任务，就是有力量，也没有旺盛的士气和艰苦困难搏斗。于是，不分青红皂白，对所有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的人均斥之为“右倾保命”，对所有的病号都成为“泡将”，不准收工，不让吃饭的事经常有，打骂捆罚的现象亦不罕见。人们都知道，奥斯维辛集中营和上饶集中营的惨无人道的暴行是空前绝后的。但那是法西斯匪徒们的政绩，他们本身就是野兽，是近代化了的野兽和残忍的两腿兽。人们虽然憎恨至极，也还能够理解。而在我们打着“革命人道主义”旗帜的队伍中居然也有这种反人类的现象——虽然它是局部的，程度轻得微乎其微，我认为也是不能够沉默和谅解的。这些领导任都有着共产党员的头衔，农场的党组织是党的一支脉络。所以他们在制造这等残忍黑暗的现象时，也是代表着党，只能给予拥护而不能反对，那就是对我们党的污辱，对人民犯罪！根据这种认识，我说了我应该说的话。有一次，又开会斗争罗应洪和马竞亮（注）¹。这两个人身体不好，常常闹病。领导人和医生对他们缺乏同情与谅解，他们也就破罐破摔。我给以好言善劝，往往也遭到

¹ 罗是某部助理工程师，搞电机设备的；马是交通部的，在军队里干过。他们的特点是：吃得饱，领导人的态度好，干活时也很卖力；反之，则调皮捣蛋。马在十月间死去。

辱骂。对这种不好的地方，是可以进行斗争教育的。而对他们的病，应该给予治疗；不能干活时，应该予以体谅照顾。可是，人们不仅不谈照顾，在斗争的时候还不给饭吃。我在会议上公开反对这样做。我大声疾呼：越是不把大家当人看待，大家越不愿意干活。我要求及早改变这种做法。结果引起刘恩更加对我仇视。班长赵超群（注）¹在小结会上公开说我这是“人性论”，是“右”的立场。理由一条也说不出。

十四、我也悲观绝望过

这时候的我，已到了无拐杖既不能行动的地步。除原有的病痛之外，又增加了关节炎和胃痛等症。一双腿硬如木制，膝盖肿得又红又大。每天下午全身感到恶寒发烧，而量体温时，水银柱又不升高。医生们明明知道这是极度虚弱濒于死亡的征候，但是他们不给我打针吃药，更不让我休息。开始时，我还能挖得很多，在“擂台表”上，每一次都被评为“上等”，有几次还超过定额，上了“光荣榜”。后来，就下降为“中”等了。最后因为未坚持评选制度（注）²，否则必定是“下”。我想，如此下去，必然活不久长。我深知：为人在世，“不患不能柔，惟患不能刚”；作为一个革命者，则更应该“惟刚斯不惧，惟刚斯有为”。但是，我应该如何地“刚”下去呢？如果是大敌当前，我会像过去一样：“余生无足患”；如果是在敌人的囚审中，我也会“热血拼将流”；如果我因公残疾，躺在病榻上，我也能“壮志犹未折”；如果是党干脆把我拖出去杀头，说我是无可救药的危险分子，那我倒相信终有一天，我会“白骨复更生”。然而现在，我的遭遇是什么呢？是在自己人的手里，他们既不是明明白白地说，叫我们赶快死去；也不是像对人一样地让我们正常地劳动和生活下去。你既不能反抗和进行暴动，因为他们口口声声地说他们就是党；可也不能沉默与忍受，因为我们丝毫也看不出，接受这种考验与牺牲，对国对民有何益处。两年多来，劳动，我是尽了力的；生活，我是严肃负责的；对于正常的现象，我怀着准备糜躯碎首的心情，说了我应该说的话。但是，一切均不见效验。我悲观失望了，我的视线开始模糊缭乱了。

¹ 赵是电影局翻译。过去只是有点偷懒，为人尚好；以后变得“左”了起来，对人很坏。60年冬摘了帽子。

² 这是云山的特点之一：几乎凡事都是虎头蛇尾，不了了之。

在这种时候，我抱着这种态度：既不苟安偷闲，也不痛极求死。只要力所能及者，我还是好好地干；心余力不足时，我也想休息休息，“留得青山在”。我一方面在给陈敏凡的信中，要求她向总场领导谈谈看，是否能给我调换一下工作环境（注一）¹；另一方面，实在无力支持时，我也向刘恩要求过：给我干点轻活。遗憾的是：他一直不理，而且打击我。

有一次，班里只派我在家修理农具，²规定我两小时完成，随后就下地。第一次失败了，两小时亦已过去。怎么办？家中没有决策之人。我遂请示医生（注二）³，是否可以在家继续搞？我的意思是：这个任务是必须完成的，同时我也可以藉此在家多干两小时的轻活。他看看我确实很虚弱，走路都东倒西歪的，终于发了善心，回答说：“任务既然未完成，那就在家继续干吧。”我立即动手重新选料，把料埋在火炭中烘烤。这不是一下就能烘烤透的。我遂利用这个空隙，坐在炕上写思想小结。正当此时，刘恩和盛桂林回来了，问我为何在家。我就把经过报告一遍。盛桂林立即去找医生对证。医生这时竟然矢口不认。刘盛遂扣我无数大帽子，讹着我写书面反省，并检查我的日记本，疑为我在写“绝命书”。我简直有口难辩，只好按照他们的说法，写了一份“检讨”了事。

不久，我们开始播大豆。每天上下工，就得走卅多里路。一路上皆是泥泞或水洼子，我常常陷在淤泥中不能自拔。就这样，我还得要送饭，抬着一百几十斤重的大粥桶，通过这条道路。这对我来说，是力不胜任的。但是我强打着精神去应付。当时全队下地的有一百多人，右派只有五分之一左右。军工、青年工的身体都比我们好。他们一无精神上的痛苦，二无饥苦之忧，因为他们在定量之外，可以非法而合法地搞大豆或其它粮食吃，而我们却只能规规矩矩听天由命。可是干起活来，像这类又苦又重的差事，一律让我们去干。而我们的身体全都差劲。我不干，别人也得干。于是干了，心情是忿怨的。这时，我才体会到，墨子所以提倡的“兼爱”的主张是多么地伟大，而他所反对的“泛爱”——分等级的爱——确实使人憎恨。然而我们不能为此而有所反抗。大家经常用以相互慰勉的有这样的一句话：“谁要我们犯错误呢？”是的，谁要自己犯错误的？既然犯了错误，

¹ 以后懊悔不堪，觉得这是一种自私懦弱的心理。有意见、有要求，可以直接向农场或院机关提出，即使提错了，也是光明正大，而不该走私人路线。

² 原文为“（火育）大（金山）刀的扶手”。现代汉语词典查不到“火”字旁加“育”和“金”字旁加“山”这两个字。故用修理农具代替原文。整理者注。

³ 在北大荒，只要不是右派，任何人都可以向我们发号施令。他们自认为有权这样做。我们有时也不买账。

就应该自作自受，所以我们咬牙坚持着。迫切地希望中央有朝一日，使“春风”掠过山海关，结束这种生活。

一天，突然接到命令：文化部和新华社的人全部集中，离开云山畜牧场。大家都以为：这是回北京，仰慕之至。可是，唯独我和方约被留了下来。这等于给我打了一闷棍。我想：方约已堕落为惯窃，留下来继续改造，似乎还有几分道理；而我算个什么呢？难道就是因为我不勇于反抗农场的的不仁不义之为引起了他们的仇恨，就应该继续给我这种惩罚吗？农场领导对我如此，因为他们的水平就是这样；而新华社的领导不察下情，一味地盲信农场组织，是我永无出头辩白之日，却不能不使人失望至极。我请人带了一张条子给陈亮、陈封雄、杨遽（狄）先和梁昌荣，请他们向机关党委如实报告，不要忘记尚在痛苦中的“难友”。这件事不知怎么会让刘恩知道了。他耀武扬威而又冷嘲热讽地说：“有人想向原机关告状。这是梦想！党只有信任自己的组织，任何个人叫屈是没有用的。不管过去有过什么威风，如何地看不起我，我现在硬是有权利不让他走，叫他再吃些苦头，看他能怎么样！”

确实，我束手无策。过去我曾想到过：这种日子不会长久的，中央会很快来纠正的。但是时隔两年半，中央来的人也不能算少（注），¹农垦局和850农场也先后派人来过，人们都认为“百事顺心”，十分满意地回去了。也曾经有人向北京写过信，反映了一些情况，这些信又都被转到农场，希望研究改进，结果使得某些当权者更神乎其神，认为别人怎么告，也逃不出其手掌心。老实承认，这些现象使我失去了远见与信念。我当时认为：这些错误的领导者将会永远作威作福下去，等中央发现问题前来纠正时，恐怕很多人都已骨头打鼓了。

如果生产上搞得很有成绩，是大家觉得力气没有白费，即使死，也有价值，那么，大家也还会从这方面追求支撑的力量。可是，这里的情况有偏偏不是如此，除少数干部外，我看不出这些领导人有“以场为家”的思想和发愤图强地建设农场的劲头。到六〇年夏季播种时为止，我就没有见过有谁命令选选种。每抓起一把豆种，破皮的、两瓣的、霉黑的，约占五分之一左右。我向班排长们建议过不知多少次：“这些不合用的应该抽人选下，扔到地里太可惜了。如果选一下，避免浪费播种的人工和影响产量；第二，可以改善生活，免得糟蹋粮食。”我的意

¹ 五九年秋，文化部党委派过人来；五九年冬，中央考察团来过。

见得到多数人的拥护。但是，班排长们认为我“多管闲事”。在他们看来，领导上叫怎么干就怎么干，没叫做的就少废话，免得和领导发生分歧。我于是直接向尹队长建议。他的回答更妙：“农场从来就没有规定过：在播种的时候还有选种的工种。你叫我到哪儿去找人？”我说：“把那些扔坏豆子的人抽下来，足够用的。”他说：“那不行。现在突击播种，场部规定我们每天至少有一百人下地，要是抽出十来个人在家选种，他们是不会答应的。”我说：“你请示请示看，也许他们会同意的。”他说：“你算了吧！真是没事找事。这是领导的事，你甭管！”

我觉得，在这件事的过程中，我一无个人利益之考虑，二无自视高明的表现，三无盛气凌人的派头，可以说完全处于一片忠心。可是人们就是这样的愚佞无知，刚愎自用，视血汗之宝如粪土，奈何？！如果我再多说一句和他顶起来，他又会说“反党、反领导”了。

当时，我们还听到性质相同而情节更使人哭笑不得的事。文化部与新华社的人集中之后，不是回北京，而是到了铁路边的五分场的实验站，他们也在播大豆。有一次，他们碰到了一个水洼，如果照播不说，就是不折不扣地把粮食往水里扔。排长焦勇夫命令大家实事求是地拣见土的地方播，老焦的这种见机行事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队领导（注）¹认为他们怕困难，怕下水，是干劲不足，没有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完成质量指标。这个指标就是：每一亩地应该播下五斤到八斤豆种。而老焦这个排却把一多半的种子背了回来。队领导因而大发脾气。老焦他们说：“到处是水，扔下去也是白搭。”队长说：“那不管！不然，怎么向上交代？！”在这种时候，焦勇夫就随风转舵了。他慷慨激昂地检讨自己擅作主张，没有坚决贯彻领导的指示，是缺乏责任心，保证带领大家立即去挽回这个过失（注）²。于是他们把背回来的几袋种子又统统撒到水里，不到两个小时就“完成任务”回来了。领导十分满意，说：“这就对了。我知道你们这伙人有的是力气，就是不肯使，如果不说一说，骂一骂，你们是不会服服帖帖地完成任务的。”

在这块地方，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这批人手里！任何一个人，只要还有点良心，当他发觉自己的劳动并不能为社会创造出相应的财富，他会很痛苦的；而如果发觉他的劳动不仅不能创造出财富，而是在糟蹋或破坏已有的财富时，他就会

¹ 他们当时是在另一个生产队协助点种大豆。这里说的队领导不是实验站的领导。

² 焦勇夫原是个有见识、有本事的人。可惜他为了讨上级说个好，争取摘帽子，经常昧着良心干这种事，这是我对他严重不满的因素之一。

觉得是在犯罪而加倍地痛苦了。

我不知道我们将被引向何处去。一个人一旦觉得自己的前途黯淡，对人也无好处时，再生活下去是毫无乐趣和毫无意义的。我想早日结束这种生活。自杀，可耻；到苏联去，不可能；逃跑，不光明正大。唯一的办法：请党杀掉我。我觉得，既然党认为我是敌人，把我交给这些人受虐待，使我受“不信之耻”与“大马（打骂？）之辱”，不如把我早点杀死算了。这种绝望的几近疯狂的心理，是在这种场合下产生的。有几天，我们有很多人实在走不动了，我们没有要求休息，而是要求住到地旁边。因为那里有现成的草棚，是五八年冬天排水时，第四连的驻地。但是，刘恩不答应。我说，你不同意全体搬过来，就让我一个人留下来好了，我保证第二天天一亮，当大家从家里出发时，我就下地干。我不仅不会因为多干活而又怨艾，而且会感激领导同意原谅和关怀了我，使我每天少走卅几里路。如能让同志们带饭给我，我感激；如不带，我就把种子中的碎豆子拣出来，用小铁碗煮来充饥。我当时真是诉于衷，求于切，委曲求全的。凡有人性的领导者是不应该拒绝的。可是，很多次请求，刘恩与盛桂林均心如铁铸。他们不仅不答应，反而多方地讥讽和辱骂我。我不肯走，他们就留下罗相成“伴着”我走。我痛恨到极点，发疯似地举臂高呼：“请党来枪毙我吧！当如能早日结束我的生命，我将大笑三声，高呼万岁！”当我和小罗到家时，别人都已经吃完晚饭睡觉了。第二天，小罗将我的这些话报告给盛桂林，盛又报告给刘恩。刘恩遂找我谈话。他的本子上记满了有关我的情况，他一条一条地念给我听。我未承认，因为多数并非事实；有的是事实，但也被夸大和曲解了。他又问：“小罗汇报的这一条是不是事实？”我说：“是。”他说：“好，只这一条，就可以说明你对党已经仇恨入骨了。”我说：“不，我不是恨党，我恨党的官僚主义，恨那些混进我们党内的毫无人性的人！”他当时没把这句话记下去。以后是否补记了，我不清楚。我所以当“领导”的面也要这样说，就是要他们认为我已对党仇恨入骨，不可挽救，而杀死我。我不想再活了。

十五、苦撑待变

过了些日子，心情平静了些，想到上有老母，下有女儿，对社会也负有一定

的责任，我应该坚定地生活下去，而不应该舍生求死。虽说，“人乐死而忘其生”是一种迫不得已的绝望之念；但是作为一个还想为革命做点好事的人来说，是不应该自我原谅的。我批判了这种错误思想，对未来恢复了信念。当然谈不到积极争取，因为这里是与我们的国家制度不相协调的世界，它没有真理、没有正义、没有人道。依我的烈性和对自由、民主的酷爱来说，我应该发动“奴隶”们起来和这些“野蛮的统治者”进行格斗；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必将被污称为非正义者，而成了触犯党的和社会主义天条的罪犯。个人的得失是其一，经过斗争而给农场的事业造成的损失也将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这也仅仅是一闪之念，很快地就把它丢到一边。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待，等待中央把眼睁开来。但是，生活中的暗流恶浪又不能让大家安安静静地等下去，而要不断地进行各种各样的斗争。直到六〇年底回北京，半年的日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度过的。所以我把它叫做“苦撑待变”。

七月十五日，我们前往畜牧一队打草。当时我正在拉痢疾，挑着担子摇摇晃晃。走到稻田边时，路狭而泥淤，有人跌到水坑里去了。我估计自己绝对走不过去。稻田中没有水，有一条早被踩出来的阳关大道。我就顺着这条道绕过了那一段难走的路。我的后面还有另外几个病号，他们也跟着我走了这条路。这就给了盛桂林等人又一个把柄。他们指责我“带头走稻田，破坏生产”。我坚决不承认。这条路是四队的军工和青年工们踩出来的。虽然农场有规定：不准在走稻田，实际上，对军工和青年工们毫无约束力，只是不让我们走而已。这也是云山的“泛爱”的典型事例之一，简直有一种近乎“狗与华人不准入园”的味道。我说，如果身体好，也可以忍受这种不平等的待遇。但是，我实在无法通过那条淤陷的小道，不得已地走了一下他们的这条路，何罪之有？！盛桂林说：“别人可以走，就是不让你走。”我说：“本来我倒想检讨一下的。如果你要这样说，我不仅觉得无愧，反而认为这是光荣，因为我反抗了在我们的国家中所不能容忍的不平等的罪恶现象！”

这下，引起了盛桂林的伙伴们对我的恣意攻击。冀虎虎过去和我很好，后来因为他屡次受奖，骄傲自大，常常辱骂那些身体不好、成绩不佳的人，我对他劝告了几次，他居然反眼无情，对我以怨报德。他这一次竟捏造说我有一个小集团，成员是石铁生和罗相成。因为他们平常和我接触较多，这次又是一块走稻田大路的。此论立即被我们驳倒。

此事过后，他们又在工作中找我的岔子。我是一个老打草队队员，刀法较好，给全排起了示范与指导的作用。但是体力不继（济），工作量远不如昔了。五八、五九年，我可以日打三千方，创造过四五千方的成绩；现在，鼓足了劲，也不过两千方（三亩）左右。就这样，全排也没有人比得上我，因为他们还不够熟练。可是我仍然是班排长们攻击的对象，说我丧失了过去的干劲。我有病，不让治；医生开条子叫我休息，他们逼着我上工；我拉血拉得一塌糊涂，女医生宋大夫都为我难过，主动要我立即去密山医院求治，刘恩指导员竟叫场部供销组不给我外出粮票。我找刘恩，他叫我找供销组；到了供销组，人们又叫我找刘恩……我终于未去成。这些人是多么地残酷而阴险啊！过去在党内生活过十几年，我从未见过这种人，现在居然天天相见。我知道，他们这是故意和我这样的人为难。但是，不管我有多大的罪过，他们对我有多么深的仇恨，对我采取这等非人道的手段，总是应该受到良心与道义的谴责的！

由于过着这种非人的生活。我的抵抗力越来越减弱了。五八、五九年，我晒得油光黝黑，神清气爽。而在这最后一年的夏天中，我的皮肤被晒得破破烂烂，双肩和脊背到处血肉斑斑，黄油都露出来了。每次起床，被单都粘在背上，久久不能剥下，有时不得不请别人帮忙。就是这样，我也没有偷懒或请求休息。有一天，全场的打草人员集中在一个山坡上进行大突击，我仍然为全排的冠军，上午、下午，都上了地头的光荣榜。畜牧场陈副场长跟在我后面看了好半天，十分赞赏我的刀法和我的坚忍精神。摸摸我的伤处，以一种爱惜的口气责备道：“您这是怎么搞的，同志啊？没有好的身体，怎么坚持工作啊？！”我当时几乎流出泪来。在我的印象中，此人是比较厉害的，工作上要求极严。他力主我们吃饱，那也是为了叫我们有力气干活，而不是出于关怀体贴。所以我对他没有什么好感。没想到他也有对人的同情心（注）。¹他要我回家后一定去请医生治疗。

第二天，宋大夫边打针边责备我：“简直像一个不知好歹的孩子。这么弄到这（怎）个地步才来看？”我心里想：“谁不爱惜自己的身体，问题是处境险恶啊！”我没说出来。她给我开了继续休息两天的假条子。但是，我只休息了一天，排长盛桂林和班长孔祥志、副班长王开哲就强迫我上工了。

¹ 六一年夏天，我在西单商场附近见到了他。他已被调到辽宁彰武县做畜牧场场长。这一次是到农垦部来谈工作的。我请他吃饭，他不吃，请他冷饮，他也谢绝。我无法回报他的一惜之谊，只好拿我的购货证，给他的妻子买了一双皮鞋。

我看病的那一天，我和石铁生都收到了几个包裹。第二天，石铁生上工时，拜托我照顾一下他的东西，谁知就在我去卫生所打针的空隙间，他的点心与糖果被别人偷走了一部分，而香烟一支不少，这说明这个小偷不吸烟。是谁呢？我猜不透。因为我离开家时，冀虎虎和陈国华都还未走。而这两个人又都是不抽烟的。晚上，大家回来时，我立即如实报告情况。石铁生与我原来处的不错，因上次有人污蔑我们是“小集团”。如在正常情况下，他是会以君子态度来考虑此事的。然而在那种饥饿疾苦、人人自危的情况下，一物之得失，尤其是吃的，往往使得本有理智的也要失去理智。晚饭后全班开会追查此事时，他竟和其他人一道肯定这是我偷的，并捕风捉影，歪曲捏造地“揭露”了我的许多问题。陈国华，我为了替他说话受到了政治上的打击，现在也昧着良心说我那次是“拉拢”他。他们人多势大，我处于“墙倒众人推”的地位。我懒得和他们争辩，劝他们冷静些，前前后后地思索一下我的为人。第二天班排长们就强迫我上工了。

这件冤枉事传开后，全排哗然。人们都说：“没想到戴煌也做了这等事！”第三天晚上，另一个班的梁南（空军中的诗人）被偷走了一袋保健粉，他居然跑到我这里来检查。在北大荒，这种侵犯人权的事层出不穷，我看惯了，让他查看，他没有发现丝毫痕迹。次日晨，他突然跑来向我道歉，说这袋保健粉是他们自己班里的惯窃习白力偷的。习一偷到手就躲在帐子里吃，弄得满脸皆白（注），当场破获。他请求我原谅。我只说了两句话：“你不是个真正的诗人，因为你看不透周围人的心灵。你也不是个正人君子，因为你因一物之失，就失去理智，破坏法纪，侵犯他人。”他愧色满面。我所以对他不可原谅，主要因为他是个没有骨气的人：内心中对盛桂林极端不满，而表面上极力卖好逢迎，小恩小惠，求其庇护，并且经常向盛桂林密告对盛不满的一些人的愤言怨语，表示他对盛忠实。这种人是十分卑鄙无耻的。

不久，陈国华偷吃了我的半碗猪油，被人发觉了。大家开了他的斗争会。此人到底比较老实，把过去许多的偷窃行为都坦白出来了，包括石铁生被窃的那一次。至此，我才洗清了身子（注）。¹

前思后想，我觉得在这个混乱黯淡的圈子里，还是待不下去。我断定这种环

¹ 从此，石铁生对我有愧意。我觉得，只要事情搞明白了，既往不咎。以后他病重时，我还是尽力地照顾过他。回北京后，我曾多次设法想见到他，他也不好意思见我。当然，他也可能顾虑“小集团”之类的事。可是我认为，只要自己走得正，别人的怀疑是不足惧的。

境改造不好人。好人被气死，坏人则更坏，半好不坏的人也将被带坏。五九年冬天中央考察团来摘第一批人的帽子时，我就简略地表达了这个意思。中央选错了地方，把右派分子、坏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集中在一起的方式也值得研究。因为他们在学坏这方面可取长补短。我记得孙书明同志曾经批驳或我，说我怀疑农场党组织和不信任中央的改造政策，并责问我：“您认为应该怎么办？”我认为应该分散，把大家分散到正气占上风的地方去。又经过这半年多的观察，我觉得我的看法没有错。当然，要我自己来改变这种按（安）置是幻想。我只能向云山政治处打一份报告：要求给自己换一个环境，哪怕是回家也好。我同时向本社党委写了一封内容相似的信。

国庆节快到了。我们照例做鉴定。所有的人都讲我的坏话，其他班的人在一旁听了也觉得不顺耳；就是发言者本人，也未必都是语之于衷的。但他们鉴于班排长们对我的仇恨，不得不多说我几句坏话，力求班排长在自己的鉴定上笔下留情。一年前，我在打草队时，不论鉴定小结，我们都要经过本人同意，全班一一签字通过，对结论的一字一句都是经过一番斟酌的。自从烧炭以后，完全接受了三队和基建队带来的传统，班排长高兴怎样写就怎样写，而且无需经过本人过目，更不用问你是否同意。对这种不民主方式我就非常反感，何况批评多半又是夸大否定之词。因此我对他们的恶意攻击做了反击，对曲解之处进行了解释。我自拟的鉴定稿也拒绝交出。他们以后给我整理的鉴定如何，不难预卜。九月三十号上午，我突然接到命令：要我一个人立即离开云山，进山打窑烧炭（那里有一个排）。我不知何故，找刘恩，他支支吾吾；找派出所刘所长，他也说以后再谈。当时已经下雨，我既无雨具，身体又不好，遂去政治处找专门管我们这批人的组织助理员，要求延期。他声色俱厉地对我说：“你必须立即离开，如果下午两点还见到你，就对你不客气！”

事后我才得知：原来我已被看成危险分子，成了重大节日中被防范的对象。他们怕我发动群众进行暴动。并且，经过刘恩和盛桂林的进谗诬陷，派出所一度准备逮捕我，把我当作抗拒改造与继续阴谋反党的典型，以杀鸡惊（儆）猴。在进山的路上，我虽然也想到了这些传说的前一部分，即：可能成了被防范的对象，但是我还批判了自己的多疑的心理，而尽量向好处想，宽慰自己。比如说：这也许是我给本社党委的一封信起了作用。他们已来信要农场照顾我的健康。因为山

下的大田秋收快开始了，这是非常紧张劳累的。打窑烧炭的活路虽重，起居作息却比较正常。现在回想起来，我是个多么可笑可怜的悲剧式的人物。在那种时代，人情淡薄，世态炎凉，锦上添花无计数，而雪中送炭者有几何？还有谁会关怀我这种人的哀乐死活！！别人振臂挥刀要把我头割去，我还以为他们怕我着凉，要给我一顶皮帽子呢！天下人之心，是多么难测啊！！

十月底，我又回到盛桂林排，和基建队各排中抽出来的“最坏”的人员组成的一个排一道，被调往云山东边五十里地的一分厂。这是我到北大荒之后第一次不背行李走路，而且是占用白天的工作时间，一路上悠悠荡荡，自得其乐。有人说：“中央对我们的政策缓和了，又回到按内部矛盾处理的老路子上来了。”有人说：“不，大概看我们枯黄骨瘦，溃不成军，怕我们在路上再倒下几个去，又少了几个劳动力。”有人说：“中央哪管得了这天涯海角的小事，是好是坏，都因人因地而异。一分厂比云山好，所以人家能派车来运行李。”我持后一种看法。

一分厂确实不错。刚去时，我们在基建队工作了几天，那里也有几十个右派，气氛和云山的差不多。以后，我们这个排到了第二生产队，工作了一个多月，情况的确太不相同。这个队的干部是比较有水平的，和我们在五九年春天到云山第一生产队时的感触差不多。虽然日子过得也很苦，每天只有六两多一点的口粮（注），¹但是除了我们内部的卑鄙齷齪、残虐冷酷之外，生产队的干部和职工是把我们当做犯了错误的同志看待的。为了使大家能多吃到一点东西，队干部们想了很多办法。我们常常打夜班脱谷，干部们亲自为我们做夜餐。有一次我身体不舒服，少吃了一顿饭，炊事员都记在心里，晚上多给了我一碗稀饭（注）。²职工们常常到地里去拣剩下的玉米，有时也到场地里去“拿”，我们也跟着干，我也干过，队干部也都能够体谅，因为大家实在饿得不行了。工作时间是较短的，真正执行了劳逸结合的政策；定额虽有，但并不强求达到，完全量力而行。根据我当时的想法，至少在北大荒，像这种富有人情味的生产单位是十难有一的。我大概会在北大荒了此一生——莫说党，就是新华社的老人们也早就把我摆到脑后去了。如此我就在这儿安家落户算了。等问题解决后，把自己的母亲和孩子接得来，亦农亦读，倒也不错。因此我立即给新华社党委写了一封信，提出申请。

¹ 原粮七两。八月份，当我们还在云山时，就开始按这种定量供应了。

² 班排长们没来污蔑我打了“双份饭”，我本想拉着他们去对证。后来一想：人家对我们本很尊重，自己闹起来会惹得人家笑话，就算了。后来批评我时，我没有接受。实际上，他们偷公家的粮食比谁都多，他们常常要这种“此地无银”的手法。

十一月底，中央考察团来了，中央各部的人都集中到基建队去。听说都要回北京。我不愿意去。一方面我估计我会例外，绝不会有这种幸运。几年来，我给新华社的党组织和某些领导人写的信虽不多，但也不算少，我没有接到什么回音。这说明我已成了被驱逐出门的浪子，谁还会要我。另一方面，我对盛桂林之流仇深似海，早分手早好。如果考察团真的要我走，到时候再说。我于是利用我原来也有军籍、军衔的条件和军委各部的人留在二队。他们是要留在北大荒的，与中央考察团无关。十多天后，也就是宣布摘帽子、快要回北京的时候，考察团才发现少了我这一员“反党大将”，连忙把我追了回去。使我在基建队又过了十天的忧伤、愤懑、颓废、前途莫测的痛苦而可怕的生活。

十二月中旬，我们终于离开了北大荒。

十六、光明中的黑点

回忆起在云山的后期和快要离开一分场的那段时间的生活，是令人发指而又哀伤的。如果不是身历其境，就是帝国主义阵营中的最富有想象力的极端反动的小说家，也很难描绘得出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并且是在已经进行了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之后，会发生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黑暗而恐怖的现象。

所有的人都不愿意干活，也不能干活。除了依靠欺诈蒙骗、投机取巧赢得了领导者的信任，长时间地逃避了艰苦和劳动的盛桂林之流的少数人之外，面有血色、肌肉发达者一个没有。人人都具有在描绘敌人时所惯见的那些形象：骨瘦如柴，衣衫褴褛，神色痛苦，发长面垢，一阵大风可以把他们吹倒，一袋粮食也可以把他们压倒。饥饿，已延续一年有余，在夏天，尽管有蔬菜、豆叶、南瓜藤、向日葵饼之类的代食品，也没有吃饱过肚子，后来只有几片萝卜或咸盐了。可以说，无一人不是病号。

十月十三日，小云山突击割大豆，全天小雨连绵。在夜晚下工的路上——就是我在哪里时怕走的那条路，一百多人中就倒下了七个，领导上懒得管的，只是各班的熟人，鉴于良心上的责任和“共患难”的友谊，去把这些人一个个地抬了回来，给他们烤火，给他们按摩，有的还做了人工呼吸。医生，只是打打强心针，见无效，他就叫：“没救了，拖出去！”别人说：“他的胸口还有点热气哪！”

医生说：“心都不跳了，光有点热气有啥用啊？！”抢救的结果，还是死了四个。他们是：马竞亮，就是我已提到过的交通部的干部，在志愿军中工作过。我在小云山时，班排长们一直凌辱他，说他装病，偷吃懒做，医生也经常拒绝为他治病。唐奕骅，军委测绘学校的教员，据说他在国民党测绘机关中做过少校军官，四川人，四十多岁。刘夔生，商业部的干部。徐老头，五十岁左右，须发花白，眼睛半残废，平常喜欢喝两口，此人年老力衰，早就不行了。夏天，在畜牧一队打草时，我和他在一起相处过。有一天夜晚下工，大雷雨，我也走不动，和吴常棣——四川大学某教授之子，气象局局长涂长望的秘书——两个人再最后扶着他，他还一连摔了六七个筋头，但是领导上毫不在意，这次终于死去。

四个人死了，并不是装在棺材里，一个个地抬出去，而是堆在一辆马车上用绳子捆好，拉在（原文如此。整理者）地里去埋葬的。领导人既无检讨，也不吸取教训，照样叫大家起早摸黑地干。十月十七日，刘恩为了争取工副业队得红旗，叫我们烧炭的在夜十二时起床，一口气跑了卅多里地，参加割大豆的“突击”，一直干到天黑才让回来，到家又是十二点了。待吸取教训时，已经是“烈火熏烤，却非一日之寒”了。死亡继续发生。工作中死亡者有之；假日外出游玩，在归途中死去者有之；发现了危险的时候，立刻送进病院而死者有之；甚至在寒潮未到，躺在被窝里睡觉时，也会有人无声无息地死去。

十月底，我们到了一分场的基建队。有一天，到一生产队下面的水洼子里去积稻堆，回来约卅多里。我们班的罗相成，当时肿得很厉害，走路都走不动，领导上不得不准予休息。可是稍有转色，盛桂林就追着他上工。这一天，小罗也奉命下地了。他走得很慢，手里著者（拄着？）拐棍，用一条被单围着脖子，肩上挂着一双胶靴（防备下水）。沿途可能又到收割完了的玉米地里去拣了一些漏掉的小玉米，边走边啃。因此，等他快到水洼时，已经下（午）一点过后，我们完成任务往回返了。原来预计任务完成得不会这样早，所以午饭还是送到地里来的。小罗几乎和送饭的马车同时到达。排长盛桂林大怒，责骂之外，决定不给他饭吃。小罗说：“你可怜可怜我这个快要死的人吧，这大冷天，又下雪，你给我一口，也许我还能撑回去。”盛桂林一脸凶相地说：“你他妈的还有脸要饭吃？！没在地里干活的人，回家去吃！”别人拿到饭，边吃边走光了。小罗就下地找我，说是班排长要我陪着他回去。我由于多背了两趟，力衰腿慢，所以走在全排的最后。

小罗碰到我，把盛桂林骂他的话向我说了一遍，我仇恨交集。虽然，小罗过去在很多事情上对我不起，比如说，我和他原来处得不错，常谈些知心话，他却去报告刘恩和盛桂林。有一次，他下了沟爬不上来，我拉他一把，同时叹了口气，他在国庆节前的鉴定会上，竟说我这是“拉拢”，而且说我善于利用别人的困境，以极微小的动作与极简单的表情，表达了极为深刻的政治意义。也就是说，我的拉他和叹了一口气，是想向他说明：“在这样的环境里，如果我们不相互关怀，还有谁关心我们的死活呢！”……虽然如此，我觉得现在不应该计较过去，而是应该全力地帮助他。这时风紧雪大，气冷水寒。我搀着他出了水洼地（约二三里长），到了一个大豆堆旁边。留给我的两个小窝窝头包在一块笼布里，我和他分吃了。吃完后，就扶着他往家里走；走不动，就架着他；还是走不动，就背着他。可是我也岌岌可危，虚汗不止。他在我的背上说：“老戴，你走吧，把我扔下吧！”我看他面色不正，嘴唇发乌，我也是在驮不动了，遂把他藏在另一个大豆堆里，用麻袋盖好，立即向一队跑去。

这里离一队还有五六里地，跑到一队，就向管理员要马车。不管我如何地连说带吵，他们就是见死不救。我又向场部党委打电话，也向基建队打电话，基建队答应立即派车来。我随后向一队打了一张借条，要了两份饭，连忙赶回地里。快到豆堆时，才发现有两个人在架着小罗迎面走来。这两个人就是原云山基建队各排中抽出来的人员所组成的那个排的。他们现在在一队，方约就在这个排。小罗此时已神志不清了。他光是喃喃地叫着：“老戴，你在哪里？老戴，你在哪里？”我把窝窝头给他，他也不知道吃；我把窝窝头掰开，塞到他的嘴里，他也咽不下去。等马车来到时，他已少有知觉了（盛桂林跟着马车来的）。

到了场部门诊所，经抢救，他才恢复了知觉。他说谢谢我，过去很对不起我。他原来想要我在医院里伴着他。盛桂林也是这样答应了的。可是屁股一转，盛又叫他的心腹——副班长王开哲来照顾他。两天后，我们已转到二队了，听说小罗安然无恙，二队还派了马车去接他。可是马车到了那里，病势复趋恶化。第三天，他就死去了。

通过这个悲剧的细节的研究，不难得出结论：死亡的现象应该由农场负责，盛桂林之流的班排长们更要负责。他们为了表示自己“坚决靠拢党”，企图混掉帽子，竟不惜要别人付出生命的代价。通过这个事件以及其它许许多多的事件，

也不难看出：谁的灵魂高贵，心地善良，而谁的卑贱与丑恶。但是，我们全排，偏偏只有盛桂林一个人被摘了帽子，真是老天爷不睁眼，人间善恶不分，暗无天日了！到一分场之后，我和另一个原是党内的同志王克勤——海军政治部宣传部的助理员——曾向一分场政治处控告过盛桂林，一分场说毫无办法，云山已把他烙上红印了。小罗死后，盛桂林也曾多次地威胁过我，叫我不要“胡说八道”。他说：“你不要以为已经离开了云山，就可以翘起尾巴来。告诉你，天下只有一个党，这里的组织只有信任那里的组织已经信任的人。我也是搞政治斗争的，你不要搬起石头来砸自己的脚。”我把这些话又告诉了王克勤同志。他又向一分场投了个“状子”，仍然不见效。摘帽子是在云山决定的。中央考察团在云山研究名单时，有些人曾指控盛桂林有罪，而刘恩却坚决为盛桂林打包票，终于摘掉了。

经粗略统计，我们一共死了三十多人（可能不够精确）。最后快要离开时，还死了好几个。我的朋友郭冠军——对外文委的俄文翻译——在公布摘掉他的帽子的当天夜里，睡在被窝里死去了。白天他还接受大家的祝贺，神智非常清醒，只是肿得很厉害。留在一分场二队的原海军中尉小杜，突然肚子疼，没有两天就死了。有一个叫张宣传（？）的，更死在正在奔向北京的列车中……这一切情况说明：农场把我们“改造”到了什么程度？！如果再晚回来一年，孤儿寡妇就更多了！

集中在一分场基建队准备回北京的那些日子里，我们简直成了一群乞怜求食的流浪汉。职工和军官家属们可以半公开地拿公家的大豆，而我们吃饭时要排队，以班为集体，一个挨一个地捧着又大又黑又脏的大碗、瓷缸、罐头盒、洗脸盆，到窗口去要一勺稀粥。事务长和炊事班长们把守在窗口，如狼似虎地监视着每一个人，怕有人打双份饭，吵骂打人的事每顿饭都有。那些男女炊事员故意给我们浮上（原文如此。整理者）撇稀汤，而且不打足量。六七两粮食已是少得可怜了，而经过这样的克扣剥削，到我们口中的更寥寥无几。打鱼队打到的泥鳅和哈什蟆本是应该改善伙食的，可是队长们和管理人员却利用我们的饥不择食，不惜以斗金换粒米的心理，高价出售，五角钱一盘，里面只有五六条泥鳅或三四个哈什蟆；后来看到大家抢着买，就变成两条泥鳅加三四片萝卜。他们毫不掩饰地扬言：从粮食到金钱，都要在我们身上“捞一把”，以便在我们走后，“改善”他们的生活。而根据我的观察，那些家伙很可能是贪污作弊的小集团，一个个既流气又凶

残，非常不正派。我曾多次和那个年轻的炊事班长吵架。他阴险地说：“好哇，就是你骨头硬，敢出来说话？！”我说：“怎么样？你们能把我怎么样？你不像共产党员（我知道他是党代表），而是假党员！”他说：“你想带头暴动么？”我说：“你们如果再这样剥削大家，闹一闹也未尝不可！”有好几次，双方都出来很多人一起吵，吵得小屋子都要炸了。

我目睹这幅情景，对云山来的传言也就毫不为奇了。在我们离开云山后，那里也死过好几个人。每次死了人，都有很多活人自保奋勇地争着去护守，为的是争取那二两粮食的夜餐。这是一种什么气氛啊！难道就是因为饥饿，人们的道德观念和心理状态就会发生如此之变化么？就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尼古拉皇帝流放到西伯利亚十年后所写成的《死屋手记》中，也没有提到过这种精神堕落的景象。“改造”人的人们是这样地缺乏人性，被他们“改造”出来的人也就“如法炮制”了。心理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形式不同而已。

我到临走的那天早上，发觉四天的干粮全部被偷。如果我不想办法，就要饿着自己不能再饿的肚子，在漫天大雪中步行一百多里。我硬着头皮向场、队领导要求多少照顾一点。前后数次，没有人理。我只好去找一分场的许书记。他正在和开党代会的几十个人在小馆子里吃早饭，他们八人一桌，桌上鱼肉成盆，饼干成堆，上等的大米稀饭随便喝。我历数我的难处和身上的病痛，他们无动于衷，而且官腔十足地把我说了一顿：“现在的粮食问题就是严重的政治问题，每人有每人的定量，谁丢了谁负责，党管不了！”我二话没说就退了出来。我想：这种草木之人，会积极热情地关怀人，努力革命么？就是在地主资本家的世界里，穷苦落难之人也会讨到一点残羹剩饭、取得一些人的同情的。可是，在我们的社会里，在这些共产党员们的面前，却连一粒米也要不到（注）。¹他们竟忍心看着一个犯了错误的同志，拖着危在旦夕的身子，在风雪中忍饥挨饿地长途跋涉。这些人所领导的农场，成年地发不下工资，是不足为怪的。我空着肚子走了一整天，在五分场车站上等车时，有粮票有钱也买不到吃的，又饿了两两天两夜。到牡丹江转车时，我连天桥也上不去，幸亏有北影演员管仲祥和中央乐团的同志（阎启明）把我抬进了准备开往北京的列车。（未完待续）

¹ 实际上我们也并不是要，而是拿钱买。

【资 料】

2014年《记忆》总目录

说明：2014年《记忆》杂志共出刊18期，其中常刊12期，增刊6期，序号为总第106期至123期。为方便读者查阅，本次汇编在按文章类型分类后，又按主题进行了细分。各专辑中的“编读往来”因不是该专题中的文章，均已分别归入“编读往来”栏目的不同小类中。

一、 研究论文

(一) 北京文革

胡宗式 北京文革两派斗争简史（一）（107期，2014年1月31日）

—— 导言

1. 1966年北京文化大革命概况

2. 吴传启其人

胡宗式 北京文革两派斗争简史（二）（109期，2014年2月28日）

3. 卢正义的叛徒问题是分歧的导火索

4. 陶铸问题

5. 统战部“1·15事件”，造成统战民委系统的大分裂

6. 民族学院的武斗，表态的单位显示师大派的存在

7. 夺权斗争及“高教部事件”

8. 反击“二月逆流”，多个系统分裂

9. 民族宫“4·8事件”，两大派正式亮相

胡宗式 北京文革两派斗争简史（二）（113期，2014年5月15日增刊）

10. 炮打谢富治

11. 对潘梓年、吴传启宣战 4月10日江青接见聂元梓

胡宗式 北京文革两派斗争简史（三）（115期，2004年6月30日）

12. “5.16”的出现

13. 中学及军事机关

14. 陈伯达 6.5 讲话 天派地派名称的出现

胡宗式 北京文革两派斗争简史（四）（117 期，2014 年 7 月 31 日）

19. 市革委会对聂元梓的批判

20. 杨余傅事件

21. 7·27 工、军宣队进入高校，两大派的历史结束

（二）上海文革

李 逊 工人武装的尝试——文革中的上海民兵指挥部（107 期，2014 年 1 月 31 日）

李 逊 革命名分的诱惑——上海文革史稿导言（109 期，2014 年 2 月 28 日）

李 逊 上海文革中的另类思潮——来自边缘的思索（118 期，2014 年 8 月 31 日）

（三）卞案与师大女附中文革研究

刘 进 我与王友琴两年前的一次对话——关于《文革受难者》卞仲耘篇（112 期女附中文革专辑六，2014 年 4 月 30 日）

叶维丽 活在今天的历史——48 年后看女附中“八五事件”（一）（112 期女附中文革专辑六，2014 年 4 月 30 日）

叶维丽 活在今天的历史——48 年后看女附中“八五事件”（二）（第 113 期，2014 年 5 月 15 日增刊）

启 之 追凶与包庇——女附中“八五事件”浅析（第 113 期，2014 年 5 月 15 日增刊）

印红标、宋彬彬对《南方周末》相关文章的更正（112 期女附中文革专辑六，2014 年 4 月 30 日）

启 之 宋彬彬道歉之后——五种声音，一个背景（112 期女附中文革专辑六，2014 年 4 月 30 日）

李红云 关于女附中红卫兵的袖章和公章（112 期女附中文革专辑六，2014 年 4 月 30 日）

华新民 “卞仲耘命案”争论拾遗——对刘进、宋彬彬解释的质疑（122 期，2014

年11月30日)

刘进 我为什么要退出女附中的文革筹委会——简复华新民先生(122期, 2014年11月30日)

宋彬彬 “八一八”之后, 我的选择——答华新民先生(122期, 2014年11月30日)

(四) 林彪研究

蒋健 破解《“571”工程纪要》遗留之谜(113期, 2014年5月15日增刊)

舒云 《“571工程”纪要》发现之辨析——兼驳蒋健先生(117期, 2014年7月31日)

蒋健 林彪集团北京黑据点是何时被查封的?(117期, 2014年7月31日)

三尺晴天 谁留下了“571”? (119期, 2014年9月30日)

曾林辉 关于江腾蛟的两个问题(119期, 2014年9月30日)

蒋健 “九一三事件”前后林彪北京黑据点发生的一些事辨析(119期, 2014年9月30日)

蒋健 历史不忍细究——揭开“九一三事件”中的黑匣子之谜(119期, 2014年9月30日)

米家农 我的检查与交待(附录: 向红为《我与9·13》一书写推荐语)(119期, 2014年9月30日)

(五) 教育专题

刘小萌 文革前的“阶级路线”问题——以学校教育为中心的考察(110期教育专辑一, 2014年3月31日)

潘祛病 从左向左: 十七年教育指导思想浅论——以中学政治课的调整为例(110期教育专辑一, 2014年3月31日)

叶维丽 马笑冬 从“公主”头上的纸冠到红卫兵手中的皮鞭——中学的阶级路线与“革命化运动”(110期教育专辑一, 2014年3月31日)

季烨 文革之初北京师大二附中的“红色暴力”——姜培良之死与“仇恨教育”(121期教育专辑二, 2014年11月15日)

唐 燕 关于北京女十中教师孙迪之死——给王友琴纠错（121期教育专辑二，2014年11月15日）

王逸伦编辑 合肥市第六中学校史——关于文革中的记忆（121期教育专辑二，2014年11月15日）

（六）北大文革

舒 声 北京大学文革研究的意义与现状（114期北京大学文革专辑一，2014年5月31日）

郑 实 北大武斗期间死亡事件真相探究——兼对胡宗式提出几点质疑（第120期北京大学文革专辑二，2014年10月31日）

章 铎 季羨林参加北大井冈山的前前后后——再读《牛棚杂忆》兼与舒声先生商榷（第120期北京大学文革专辑二，2014年10月31日）

（七）文革研究

张业赏 文革初期山东高校的“大辩论”及其影响（第113期，2014年5月15日增刊）

印红标 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政治冲突和社会矛盾（114期北京大学文革专辑一，2014年5月31日）

老 田 毛时代的中国社会分层以及文革所揭示的官民矛盾——与李逊商榷（115期，2004年6月30日）

启 之 “文革思维”在今天——目的与手段（118期，2014年8月31日）

启 之 “文革思维”在今天——泛政治化（119期，2014年9月30日）

（八）国史研究

阎长贵 《毛泽东年谱1949—1976》文革部分的若干问题

附录：《林彪确实主持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批判邓小平》等六篇（109期，2014年2月28日）

崔龙浩 1957年“上海工潮”原因的再探讨——以纺织工人为例的考察（第113期，2014年5月15日增刊）

郭罗基 周扬奉命按名单抓右派（118期，2014年8月31日）

余汝信 北京西兴盛胡同七号——有关钱壮飞后人的一些故事和疑问（122期，2014年11月30日）

马昌海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下编）所遗漏的历史事件（122期，2014年11月30日）

二、 会议记述：

（一）“八五·记忆·反思”座谈会（106期，师大女附中专辑四，2014年1月15日增刊一）

【编者的话】

李红云 反思文革 拒绝遗忘——老三届同代人座谈会纪实

【主持人语】

罗 治 关于“八五·记忆·反思”座谈会

【八五真相】

冯敬兰 校长是怎样死的 ——原北京师大女附中文革初期“八五事件”综述

叶维丽 从“八五”说起

李红云 我对“八五”的研究

【我们的反思】

刘 进 “八五”反思

宋彬彬 我的反思

罗 治 为卞仲耘校长捐款塑像的经过和我的感悟

吴迪（启之） 十七年教育与学生暴力

【反思与对话】

陈小鲁 我的想法与建议

印红标 社会需要真相与反思

卜伟华 把史实搞清楚是最重要的

丁 东 澄清真相 分清主流

邢小群 民间的推动 细节的力量

顾 媛的发言

郝新平的发言

【会议总结】

叶维丽 在真实的基础上反思——老三届的责任

(二)师大女附中“老三届校友与老师见面会”(108期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五))

2014年2月15日增刊二)

【见面会综述】

韦 陀 师大女附中“老三届校友与老师见面会”综述

【见面会发言】

1. 罗 治(67届高中)开场白
2. 刘 进(66届高中)
3. 宋彬彬(66届高中)
4. 叶维丽(66届初中)
5. 高 宁(65届高中)
6. 王本中老师(女附中前校长)
7. 储瑞年老师
8. 丁东红(女附中校友、胡志涛副校长的长女)
9. 丁德泗老师
10. 张春条老师
11. 王思梅(中五实验班)
12. 郭平英(65届高中)
13. 艾立川老师
14. 金 元老师
15. 朱学西老师
16. 韩 彪(80届高中)
17. 张力力(80届高中)
18. 郭北临(中五实验班)
19. 罗 治的总结

【见面会书面发言】

张静芬 悼念卞仲耘校长及其它

【见面会说明】

罗 治 关于邀请文革受害的师长亲属参加“见面会”的情况说明

【见面会回访】

罗 治 李红云 2014年1月26日再与老师见面会记录

（附录）2014年1月14日王本中老师电话内容

三、回忆与述往

（一）师大女附中记忆

朱晓茵、刘进等 刘秀莹老师访谈选录（2006—2009）（108期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五，2014年2月15日增刊二）

叶维丽、刘进等 梅树民老师访谈（2006—4—22）（108期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五，2014年2月15日增刊二）

戴为伟整理 刘秀莹老师访谈（112期女附中文革专辑六，2014年4月30日）

罗 治 风风雨雨话当年——师大女附中的“反动学生”（117期，2014年7月31日）

（二）郑州文革访谈

袁庾华口述 李素立采写并整理 郑州文革武斗和“文攻武卫”口号（一）——原河南二七公社“火指”负责人袁庾华专访（118期，2014年8月31日）

袁庾华口述 李素立采写并整理 郑州文革武斗和“文攻武卫”口号（二）——原河南二七公社“火指”负责人袁庾华专访（119期，2014年9月30日）

袁庾华口述 李素立采写并整理 郑州文革武斗和“文攻武卫”口号（三）——原河南二七公社“火指”负责人袁庾华专访（122期，2014年11月30日）

（三）北大文革记忆

舒 声 文革中的周培源与季羨林——他们为什么参加“井冈山兵团”？（114期北京大学文革专辑一，2014年5月31日）

胡宗式 文革期间北大的殷文杰同学被刺致死事件（114期北京大学文革专辑一，2014年5月31日）

李 樟 一个普通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1—4）（114期北京大学文革专辑一，2014年5月31日）

郭青苔（张从整理） 一段不愿回忆的经历（114期北京大学文革专辑一，2014年5月31日）

戴为伟整理 郑仲兵口述——北大文革片段（第120期，北京大学文革专辑二，2014年10月31日）

郝 斌 流水何曾洗是非——北大牛棚一角：楔子、“阴阳头”旋风（第120期北京大学文革专辑二，2014年10月31日）

李 樟 一个普通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5—6）（第120期北京大学文革专辑二，2014年10月31日）

（四）蓦然回首

黄东汉 怒海鸳鸯——海上纤夫的爱歌（107期，2014年1月31日）

于向真 听妈妈讲越南的故事——春节撞见不速客（外一篇）（109期，2014年2月28日）

曾国一 《末代贵族浮沉录》选登（109期，2014年2月28日）

津 平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怀念赵昭彦（113期，2014年5月15日增刊）

刘秀莹 我的母校师大女附中（115期，2004年6月30日）

孙丹年 我的父亲母亲——一个右派女儿的回忆（115期，2004年6月30日）

津 平 夫妻年年盼鹊桥——忆我的同事康翊和傅风华（115期，2004年6月30日）

朱 特 插队的那些事（一）——从大槐树下出发（115期，2004年6月30日）

朱 特 插队的那些事（二）——老高三里没“顽主”（117期，2014年7月31日）

朱 特 插队的那些事（三）——男生女生（118期，2014年8月31日）

朱 特 插队的那些事（四）——房东九和（119期，2014年9月30日）

朱 特 插队的那些事（五）——第一次回家（122期，2014年11月30日）

安希孟 安希孟回忆录（一）——少年时代（117期，2014年7月31日）

安希孟 安希孟回忆录（二）——困难时期（118期，2014年8月31日）

安希孟 安希孟回忆录（三）——我的中学生活（119期，2014年9月30日）

安希孟 安希孟回忆录（四）——我的大学（122期，2014年11月30日）

禾川 是否值得经历的生活——李黎黎之死（118期，2014年8月31日）

刘海鸥 书声朗朗——培元小学拾英（121期教育专辑二，2014年11月15日）

刘海鸥 日记告诉我们（1958年3月——1959年7月）（121期教育专辑二，2014年11月15日）

〔瑞典〕拉斯伍拉·伯格利 文/克奴特·维特贝 图/沈迈克 译：1967年春天的北京——瑞典人的记录（122期，2014年11月30日）

四、文革资料

（一）师大女附中史料

108期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五），2014年2月15日增刊二

1. 学生代表会主席刘进的三点意见（1966年6月20日）
2. 女附中工作组组长张世栋讲话（1966年6月20日）
3. 张世栋在第一次“揭批卞仲耘大会”前的动员报告（1966年6月21日）
4. 西城区工作组组长胡启立在第一次“揭批卞仲耘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6月21日)
5. 张世栋在第一次“揭批卞仲耘大会”后的总结（1966年6月21日）
6. 张世栋在第二次“揭批卞仲耘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6月22日）
7. 张世栋讲话（1966年6月23日）
8. 张世栋讲话（1966年6月25日）
9. 女附中工作组副组长刘阳春讲话（1966年6月27日）
10. 刘阳春讲话（1966年6月29日）

112期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六）2014年4月30日

1. 工作组组长张世栋同志的讲话（1966年6月3日） 戴为伟整理 刘秀莹老师访谈
2. 工作组组长张世栋同志的讲话（1966年6月4日）
3. 西城区工作队队长胡启立讲话（1966年6月4日）
4. 胡志涛传达市委召集中学领导、师生代表的会议（1966年6月4日）

5. 张世栋传达胡克实同志的报告（1966年6月6日）
 6. 班代表传达工作组指示（1966年6月8--10日）
 7. 《5日发生两起打死人事件》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每日快报》62期
 8. （1966年8月6日）（附）印红标 关于《每日快报》62期来历的说明
 9. 胡耀邦批转彭小蒙的一封信
 10. 中央政治局会议文件【1984】2号，附：孔丹、董志雄同志给陈云的信
- 115期，2004年6月30日**

1. 胡启立在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报告（1966年6月8日）
 2. 胡启立在北京师大女附中的讲话（1966年6月19日）
- 117期，2014年7月31日**
1. 张世栋 对师大女附中运动估计和下一步运动的意见（1966年6月13日）
 2. 张世栋 在师大女附中的讲话（1966年6月17日）

（二）文革教育资料

110期教育专辑一，2014年3月31日

1. 高等学校必须向工农开门 ——上海科技大学工人班的调查报告
2. 选好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苗子是搞好教育革命的第一关
——和驻崇部队干部的座谈纪要
3. 与崇明县、金山县部分贫下中农座谈纪要
4. 金山县吕巷中学部分教师对高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5. 关于旧的高考招生制度调查报告
——和格致中学毕业班部分师生及参加招生工作人员座谈纪要
6. 济南军区有关招生问题的座谈纪要
7. 关于招生问题走访国家计委
8. 同济大学招生方案（讨论稿）
9. 触目惊心的复辟

121期教育专辑二，2014年11月15日

1. 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教学批判》编辑组 本刊评论员

是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还是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

——评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2. 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教改组 景山学校调查组

资本主义复辟的黑据点 修正主义教育的实验田

——北京景山学校调查报告

3. 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教改组 国际政治系 60 级 11 名毕业生

怵目惊心的和平演变

4.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革命联络站

触目惊心的复辟

5. 青海大学畜牧兽医学院革命委员会斗批改办公室 五、七战斗团

《高教六十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保护伞

6. 青海大学畜牧兽医学院革命委员会斗批改办公室

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职业教育情况介绍

（三）红卫兵报刊资料

第 111 期，2014 年 4 月 15 日增刊红卫兵报刊类过眼录（上）胡庄子编著
写在前面

1. 老红卫兵的怀旧刊物——《首都红卫兵》
2. 著名的造反派刊物——《文化革命通讯》
3. 最早的红卫兵刊物——《红后代》
4. 《风雷激》的“《出身论》有关材料”
5. 话说《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专辑
6. 《春雷》批判“联动”思潮专刊
7. 造反青年，《激扬文字》
8. 《点火》，点造反之火
9. 《科技造反报》与《群丑图》
10. 大批判文章的集大成者——《革命参考文献》
11. 为什么《大喊大叫》？
12. 太阳门，《天安门》
13. 红卫兵的《狂人日记》
14. 清华井冈山兵团的《井冈山》

15. “地派”刊物《北京红卫兵》
16. “四三派”刊物《中学红卫兵》
17. 内蒙古大学的两本刊物
18. 《文史哲批判》，批判“反动权威”
19. 《红岩战报》涉及一段《红岩》往事
20. 人民大学“三红”的《工农兵》
21. 《毛泽东思想战斗文艺》，战斗中的文艺
22. 陈伯达与北航红旗的两本刊物
23. “纪念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一周年”特刊
24. 陈伯达与《教育革命》
25. 从《政法批判》上考证“砸烂公检法”口号
26. 军队造反派“红联总”的《四海翻腾》
27. 人民日报社的《北京公社》
28. 《美术风雷》与红卫兵美术
29. 上海画院红旗的《大字报选》
30. 美术批判的集大刊物——《美术批判资料》
31. 黑雨花，红雨花
32. 内蒙“东纵”的《批乌战报》
33. 从《文艺批判》到《文化批判》
34. 《斗批改》，逗、劈、改
35. 红卫兵运动中的彭真及《批彭战报》
36. 《批翦战报》中的翦伯赞
37. 《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简介
38. 从《风雷》开始，寻找“东方红出版社”
39. 《园林革命》推动“园林革命化”
40. 七机部新九一五的《飞鸣镝》
41. 从《文革风云》看对陈毅的批判
42. 红卫兵的方型杂志
43. 国家博物馆存有这本刊物吗？

44. “反动组织”的刊物《井冈山》
45. 被中央文革勒令停刊的《北京》
46. 《延安怒火》“批判516兵团专刊”
47. 罕见的《准备》
48. 天津大学“八一三”的几本刊物
49. 周总理问：“八二五”是什么日子？
50. 中国音乐学院北京公社的《东方红》

第116期 2014年7月15日增刊红卫兵报刊过眼录（下）胡庄子编著

胡庄子：写在前面

51. 《批毒画·年画专辑之一》
52. 打倒黑×，《红遍全球》
53. 从红卫兵报刊看“中缅外交冲突”
54. 中英俄文印刷的《外语教育革命》
55. “旧”电影废墟上的《新北影》
56. 武汉“三钢”的刊物
57. 由《红旗文艺》想到红卫兵歌舞剧
58. 顺便说说《首都红小兵》
59. 上海作协“革命派”的两本刊物
60. 《新美术》横扫“旧美术”
61. 红卫兵画刊展示“文革红”
62. 郑州大学的《教育革命红旗》
63. 《战地黄花》与野战军第一枪
64. 令人惊奇的《新科学》
65. 名震辽宁的“辽大八三一”
66. 《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塑像交流审稿特刊》
67. 农民造反刊物《红色宣传兵》
68. 红卫兵文艺的代表刊物——《红卫兵文艺》
69. 《新浙师》停刊
70. 工宣队、军宣队刊物《力争上游》

71. 【附录一】红卫兵造反派刊物目录简编

72. 【附录二】《革命参考文献》（1——18集）目录

（四）其他史料：

1. 俞小平 文革书简——在北大文革中写给父母的信（1966年6月9日—8月4日）（114期北京大学文革专辑一，2014年5月31日）
2. 俞小平 文革书简——在北大文革中写给父母的信（1966年8月26日——12月21日）（第120期北京大学文革专辑二，2014年10月31日）
3. 北京大学1966年大事记（114期北京大学文革专辑一，2014年5月31日）
4. 北京大学1967年大事记（第120期北京大学文革专辑二，2014年10月31日）
5. 关于右派分子戴煌的材料（一）（118期，2014年8月31日）
6. 关于右派分子戴煌的材料——1962年戴煌的十万言书（二）（119期，2014年9月30日）
7. 关于右派分子戴煌的材料——1962年戴煌的十万言书（三）（122期，2014年11月30日）

五、史林一叶：

- 胡庄子 红卫兵运动中的“十大金曲”（109期，2014年2月28日）
- 郝奇志 如果我是红卫兵（112期女附中文革专辑六，2014年4月30日）
- 子 愚 宋彬彬道歉的启示（112期女附中文革专辑六，2014年4月30日）
- 张 从 文革中北大两派的派歌（114期北京大学文革专辑一，2014年5月31日）
- 朱晓茵 去伪存真——王友琴关于刘秀莹老师的不实之词（115期，2014年6月30日）
- 津 平 年龄最大的右派——从叶恭绰到冒广生（118期，2014年8月31日）

六、书评、影评与序跋

- 谢 韬 苦难磨人，心存高贵——《末代贵族的浮沉录》序一（107期，2014年1月31日）

史宗伟 历史人物曾国一 ——《末代贵族浮沉录》序二（107期，2014年1月31日）

韦陀 曾国一先生撰写的《末代贵族浮沉录》在台出版（107期，2014年1月31日）

萧冬连 《罗瑞卿案》代序：追寻历史的真相（113期，2014年5月15日增刊）

阿秋 理想的陷阱——读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115期，2004年6月30日）

阿秋 革命万岁，革命死了——评《八九点钟的太阳》（118期，2014年8月31日）

七、学术简讯

梁幼志 《罗瑞卿案》在香港问世（113期，2014年5月15日增刊）

阿陀 香港中大召开“编写《广州文革史》座谈会”（122期，2014年11月30日）

八、编读往来：

（一）纠错擂台

中华论坛：谭厚兰被迫害惨死第113期2014年5月15日增刊

曹佐燕 “谭厚兰被迫害惨死”之说的八处错误115期2004年6月30日

（二）读者感想

秋山枫叶读“党国体制”的看法（107期，2014年1月31日）

李新宇谈党国体制（107期，2014年1月31日）

张晓良谈感想（107期，2014年1月31日）

庄菁瑞谈“宽恕与和解”（108期，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五，2014年2月15日增刊二）

郝奇志谈“八五事件”的责任（同上）

周元龄谈感想（同上）

于向真谈叶维丽的观点（同上）

丁凯文谈“卞案”中袁淑娥所扮演的角色（同上）

何芬奇谈十七年的教育（同上）

“一卷阅罢头飞雪”谈“党国体制”（109期2014年2月28日）

花开花落谈刘进、宋彬彬和女附中团队的未尽之责（第113期2014年5月15日增刊）

赵京生谈《红卫兵十大金曲》的两个问题（第116期2014年7月15日增刊）

田武雄谈蒋健的《破解〈“571工程”纪要〉遗留之谜》（同上）

九思、国庆谈目的与手段（119期，2014年9月30日）

郑君慧谈阿秋的评论文章（同上）

李平凡谈《八九点钟的太阳》（同上）

戴光华谈阿秋之文及卡玛《八九点钟的太阳》（同上）

杨新敏谈戴煌的十万言书（同上）

马悲鸣谈郭罗基文章中的江青的话（同上）

郭予庆订正《“文革思维”在今天》之失（同上）

《记忆》回复郭予庆先生（同上）

百家的感想（同上）

吴大印谈北大文革专辑（第120期北京大学文革专辑二，2014年10月31日）

杨新敏谈戴煌十万言书（同上）

赵超谈郑仲兵访谈（122期，2014年11月30日）

胡宗式、章铎谈郑仲兵访谈（同上）

陆水林谈郑仲兵访谈（同上）

杨耀健谈红卫兵（同上）

小庄谈唐燕之作（同上）

（三）问答与讨论

余敏玲对秋山枫叶的回复（107期，2014年1月31日）

张晓良谈《听妈妈讲越南的故事》一文提到的岛屿问题（110期教育专辑一，2014年3月31日）

苗苗等北京老三届谈朱学勤之文，《记忆》简报联系结果（112期女附中文革专

辑（六），2014年4月30日）

冯永光谈文革研究者应放弃小是小非之争。印红标、启之回复（同上）

樊建政先生与金光耀教授商榷（114期北京大学文革专辑一，2014年5月31日）

金光耀教授答樊建政先生（同上）

童良谈老田的学风和文风（117期，2014年7月31日）

《记忆》答童良来信（同上）

润之溪、秋山枫叶、东方倦客等谈121期教育专辑的刊头设计（122期，2014年11月30日）

（四）纠错与补遗

编辑部补遗：106期应为“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四”（108期，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五，2014年2月15日增刊二）

蒋健、郭予庆、郭世杰为《红刊过眼录》（上）纠错（第113期2014年5月15日增刊）

印红标的更正（同上）

刘进的更正与纠错（同上）

樊建政纠正114期来信之误（115期2004年6月30日）

章铎谈《北京大学大事记》的出处及114期的两处误植（同上）

后皇嘉树勘《记忆》第二期程明远生平之误（117期2014年7月31日）

顾训中纠错（122期2014年11月30日）

120期的其它误植（122期2014年11月30日）

6. 张晓良为121期纠错（122期2014年11月30日）

关于戴煌所写材料的一点更正（119期2014年9月30日）

（五）编者的话：

编辑部延迟发刊说明（114期北京大学文革专辑一，2014年5月31日）

【读者来信】

1. 冯翔谈华新民之问与宋彬彬之答

112期有意思，尤其是卞仲耘案，华新民问得尖锐，宋彬彬回得硬朗。

2. 秋山枫叶赞余汝信的《钱壮飞》之文

本期钱壮飞后人故事这篇太吸引我了，故纸堆里扒拉出来的精彩。钱壮飞的故事，以及那个时期围绕他身边的那些人物和历史事件，我都很熟悉。没想到他的后人这般倒霉。要是他在天上看得见这一幕，不知该作何感想。至于他孙女夫妇为台湾效力，我并不觉得多难理解，也没觉得有什么值得谴责之处。如果钱壮飞能有先知，预先看到后人经历的种种，他所走的路也许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我相信她孙女的选择不是心血来潮或被人忽悠。只是因此牵连母亲和家人，这个事做得不是太明智而已。

3. 汪春劼谈感想

122期《记忆》已收到，宋彬彬对自己的辩护让我对八五的多重面相有了更清晰认知，在时代的狂潮面前，个人是多么的渺小。令尊大人交待材料非常珍贵，能留传下来不容易，里面浸透着贱民为脱帽而进行的挣扎与扭曲。熊大姐讲得好，历史是一道光，没有它我们看不清未来，祈求着文革50周年时，能有一批优良的文革研究成果问世！

版 权 声 明

《记忆》创刊于 2008 年 9 月 13 日，是一份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的电子刊物。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举报邮箱：dw66778899@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